

炎黄春秋



1986年10月聂荣臻与张震在与陈怀武尉发射阵地

"文革"中胡愈之等
痛切晋言前后

张云逸大将的廉政风范

张爱萍单枪匹马闯路东

光耀太平洋两岸的
史迪威将军

聂荣臻元帅和他的
两位老秘书

青年刘少奇

为"恶毒攻击"罪
冤死者李九莲昭雪



张爱萍 1927

2
96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丁洪章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 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龙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基建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 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 徐 孔

副秘书长: 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天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170955

定 价: 4.00 元

目 录

专 稿

② “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

..... 周彦瑜 楚泽涵 吴美潮

春秋笔

③ 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 刘明钢

⑤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功与过 姚松蛟

⑦ 为“恶毒攻击”罪冤死者李九莲昭雪 戴 煌

英杰谱

⑭ 张翼挥单枪匹马闯路东 胡士弘

⑲ 张云逸大将的廉政风范 张广华

④⑩ 《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原型是谁? 刘秉荣

⑳ 上将杨至成的五次坎坷婚恋 窦孝鹏

殒星篇

⑰ 石井自戕

..... 音乐家任光血洒皖南 周乃光 严文欣

③⑥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 靳树鹏

⑤ 青年刘少奇 黄 诤

时代风

⑥ 聂荣臻元帅和他的两位老秘书 马京生

④③ 胡耀邦胞兄探亲记 余振魁

同心结

⑩ 三位南沙老人说南沙 杨肇林

⑥④ 夙缘与我 夏其言

他山石

⑤④ 光耀太平洋两岸的史迪威将军 张文苑 张星星

人海浪

⑥①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舒 芜

遗闻录

④⑥ 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 丁人卜

赤子心

④④ 霍英东是怎样从底层搏出来的? 纪 流

古镜台

⑦④ 人祖伏羲考略 段向群

古今谈

⑦⑧ 华夏文明和龙凤文化 谢世俊

神州光

⑦⑦ 中国制造金属管形火器始于何时? 朱润轩

文荟园

⑥⑧ 姓名趣谈 史文贵

“文革”中胡愈之等 痛切晋言前后

● 周彦瑜 楚泽涵 吴美潮

198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楚图南纪念胡愈之的文章,其中提到:“……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和周世钊同志上书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这一段文字也使读者产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时候胡愈之等三人向毛主席派的什么人谈了那些内容?这次“晋言”是如何引起的?其效果如何?

事情的由来

1972年夏季,离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还不到一年。这位被中共“九大”党章规定为接班人的如此下场,使不少干部、知识分

子都从“文革”初期的政治狂热转为冷静沉思。知识界的一些勤于思考的代表人物则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虽然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尽快结束“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希望则是向“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本人申述意见。这种申述需要有机缘和合适的人选。

为后来晋言创造条件的关键人物是周世钊。周世钊,字悼元,1897年生于湖南省宁乡。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解放后曾一度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因早年与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与能者”,是“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毛泽东1961年所作的名篇《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就是周世钊。

1972年7月5日,周世钊因王季范先生在北京病重而由长沙进京。王季范是毛主席的姨表兄,王海蓉的祖父,也是周世钊的老师和挚友。7月11日,王季范先生在北

京病故。7月13日举行追悼会,郭沫若主持,出席的有周恩来、徐向前、华国锋等党、政、军领导人,有胡愈之、季方、谢扶民、杨东莼、黎锦熙、张国基、熊瑾玎、李淑一等知识界代表。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民主人士”这一称谓,致悼词的周世钊身份是近8年没有开过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虽然王季范与毛主席有特殊的关系,但这总是“文革”以来第一次为一位非党的老知识分子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会,而且又有相当一批老知识分子在追悼会上露面,这给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线希望。

周世钊在参加了王季范的追悼会后留居北京,频繁地看望一些老朋友,其中有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李文宜等,大家在一起议论国事,很为国家的前途忧虑。1972年7月16日,周世钊在胡愈之的寓所与胡愈之、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人谈了一晚,更形成了要向毛泽东主席上书言事的共识,并委托周世钊通过王海蓉联系。

晋言的内容 及酝酿

周世钊在通过王海蓉进行联系的同时，将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过的内容形成文字。8月4日王海蓉电话询问周世钊：要她转呈毛泽东主席的信写好没有；8月5日周世钊写完信的初稿，并认真地进行了修改。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一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主席的信件（全文见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信中概括了他与胡愈之等人多次议论的主要内容，信中提到的问题包括8个方面：

将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处以死刑；

落实干部政策；

解放知识分子；

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

青年教育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

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还要恢复文科大学；

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

受理群众申诉，健全法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不仅范围广，而且提得相当尖锐。周世钊在与胡愈之等人议论这些问题时，还有一些值得记述的故事。

例如，讨论中曾提过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问题。当时中美关系的僵局虽已打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早已恢复，但是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常常是“以我划线”，强加于人，以致失掉了许多老朋友。多年从事人民外交工作的楚图南对此特别痛心，在讨论中讲了很多意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对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的批评。大家考虑到领导外交部的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忍辱负重，处境已十分艰难，为不给某些人以为难周总理的口实，一致商定，上书中不提这一条。

在讨论教育和大学恢复招生问题时，提到年初以来，周培源在周总理授意下为理工科大学教育改革发表的一些意见，大家为之振奋，感到有了希望。但同时对在此前后毛泽东在“最新指示”中说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很不理解。一辈子从事文科教育的周世钊，在讨论中多次提及不仅要恢复理工科大学，也要恢复文科大学。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中甚至提出：“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

比较有基础的入学”。

这里是明确主张要恢复研究生的招考了。而且周世钊还提出：希望学有基础的青年“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文史名著”。他说：“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他进而感慨说：“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从中不难看出，周世钊在这里是以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对“文革”中的焚书，大规模地批判知识分子的不正常作法提出忠告了。

对当时文艺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大家十分忧虑。胡愈之、楚图南、沈兹九等还回忆起建国前一起在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时的情景。当时虽然物质条件较

天破石可補
人傑地自靈
戊辰年秋
楚圖南

差,但精神及文化生活却很充实。在迎接1949年新年的聚餐会上,毛泽东主席轮流向在座的朋友们敬酒,并不时讲些故事和笑话;齐燕铭在联欢会上即席清唱昆曲《夜奔》,把一位英雄在受迫害后有国难报、有家难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联想到齐燕铭此时正身陷囹圄,大家不免感叹。在座的杨东莼是当时已没有任何活动的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多才多艺,与不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厚友谊的摩尔根名著《古代社会》的中文译者,见如此情景,即席忘情地也清唱了一段《夜奔》,唱完后无限感慨地说了一句:“此调不弹久矣!”接着,大家提及中国的京戏及地方戏能给老百姓以历史知识的教育及伦理道德的教育,联想到全国只有8个“样板戏”的假繁荣局面,大家都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但在讨论上书晋言时,顾及到“样板戏”是江青的“领域”,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不提出这一条,而只提出开放书禁,先从出版图书做起。

在这些讨论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胡愈之。胡愈之早年主编过《东方杂志》,后来又为《世界知识》的出版进行过组织工作,对国际政治问题有深湛的研究。1948年夏天胡愈之从香港到大连后,向中共旅大区负责人李一氓说过,毛泽东同志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在他看来,胜利时间不要两年。在李一氓问及理由时,胡愈之说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人心向背问题。李一氓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便将他的意见报告了旅大区党委。后来专程护送胡愈之往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并提醒他到平山县后一定要把上述看法告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后来国内形势的发展果如胡愈之所料,并传为历史佳话。

胡愈之不仅学问渊博,阅历丰富,胆识过人,勇于任事,即使在同

辈人中,人望亦极高,同志们、朋友们有事都愿找他商量请教。胡愈之认为向毛泽东上书言事,不能把问题提得太多,而且不能含有个人好恶及情绪的成分。因此,胡愈之认为上书言事的内容应归纳为三方面:广开言路,发扬民主;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在取得共识后,并商定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分别就上述问题进行准备,一旦有机会就向毛泽东主席或毛泽东指派的人晋言。而且胡愈之慧眼独具地认为中国当时最要紧的问题是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胡愈之认为可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说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人心向背问题,也要通过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取得大众的支持和理解。对舆论只有一种声音,只有几个班子写文章的局面,认为并不正常。对当时实际上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状况应该使之改变,具体办法是请求恢复由原来民主党派办的报纸,例如恢复《光明日报》,或另外办个刊物,使之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应该实行毛泽东主席早年提倡的群言堂。后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胡愈之积极倡导群言堂,使《群言》杂志得以问世。但这些主张早在1972年就在酝酿了。这广开言路,发扬民主一条可以把周世钊在信中所提到的内容都概括在内了。

晋言的经过 及余波

由于王海蓉的联络,毛泽东知道周世钊暂居北京,还知道周世钊有话想对他讲。1972年9月4日,毛泽东托人送来清人梁绍壬的笔记体杂记《两般秋雨盦随笔》,并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供俸元兄消遣。

1972年10月2日晚王海蓉陪

同周世钊赴中南海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位多年的老友、对故乡湖南还是关切的,毛泽东问周世钊:湖南的情况怎么样?周告知实情。于是毛泽东叫汪东兴入内,并对汪东兴说,他(指周世钊)是来反映问题的,你也听一听。在听完周世钊对湖南情况的讲述后,毛泽东嘱咐周世钊与华国锋一起回长沙,参加对湖南问题的处理,并叮咛周世钊要十分注意安全。

在谈到林彪问题时,毛泽东和周世钊都极为愤慨。毛泽东改了两首古诗斥责林彪。其中一首是杜甫的七律,咏怀古迹(青冢)的。毛泽东将原诗的八句只保留前四句: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将第二句中的“明妃”二字改为“林彪”。

周世钊向毛泽东递交了他在8月5日写好的信件,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并转达了胡愈之等同志希望见面晋言的要求。毛泽东当时表示可以给这些“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并指定汪东兴去听取这些“民主人士”的意见。

汪东兴在次日,即10月3日下午至10月5日下午,用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听取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的晋言,其间华国锋也来听了一个半天,晋言的全部内容当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李金德记录。

胡愈之在晋言中痛切地陈述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搞群言堂的必要性,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其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表示如有可能,他愿意出来筹划办一份报纸或是杂志。认为这对疏导舆论,团结知识分子都有积极作用。

周世钊谈的是教育问题。周世钊认为不仅理工科大学应恢复招

生,文科大学也应有条件的恢复,还谈到当时的中小学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一些流传几百年上千年,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古文没有了,科学知识的传授减弱了,教师中问题颇多。周世钊在致毛泽东的信及对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要求恢复共青团、少先队,而并无一句提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红卫兵及红小兵。在头天晚上,在毛泽东处,由于更多的是聆听毛泽东的讲话以及讨论湖南问题,很多话言犹未尽,此时周世钊恳切陈词:教育问题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当前教育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可能影响两代人(一说是几代人)。

杨东莼接过周世钊的话题,谈到青年问题,说到目前青少年在学校里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中学结束后又大批“上山下乡”,在这种形势下家长不放心,有的青年以各种名目留在城市或倒流回城市,又都成了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杨东莼说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但目前青年人当中普遍地对前途感到迷惑,在生活、就业、婚姻问题上都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又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实在堪忧。

谈话结束时,汪东兴表示,他是受命来听取意见,对各位的意见,他将如实上报。

古人曰:“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苏洵:《鸡鸣偶记》)。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等人(等人者,参与其事者,不只胡、周、杨三人,对此事持相同或相近看法者更不乏其人)真正是以这种畏友的心情,怀着对毛泽东主席的尊敬,衷心希望毛泽东能以林彪事件为鉴戒,恢复被“文革”破坏了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这些话,直接给毛泽东提这么严肃而尖锐的意见,是要有勇气的,也还需要讲究方法和策略。胡愈之等人的上书言事表现了

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胆略。但是,非常可惜,这些意见没有得到回音。“文革”的混乱还在持续,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又在灾难中忍受了4年……

周世钊在1972年秋离开北京返回湖南省长沙。一年半后,1974年春再次到北京时,曾希望再度晋见毛泽东,此后也曾致书,但毛泽东未再回信,也未再安排见面。不久,周世钊返回湖南。在此之前,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曾“奉命”向周世钊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没有理由认为周荣鑫会不同情周世钊等人的观点,但当时确是由他转达了毛泽东对其畏友的忠告)。毛泽东没有再约见周世钊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或工作繁剧,有的说是对周世钊1972年8月的信及10月的晋言有不同的看法……周世钊于1976年4月初在湖南病重,在“天安门事件”的忧愤中病情加剧。此时毛泽东念及故人不多,惟恐周士钊再有不测,曾指派两名北京医院的大夫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诊治。但两位大夫未赶上为周世钊诊病,4月20日周世钊在湖南长沙辞世,享年80岁。

杨东莼于1975年继续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继续担任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的中央文史馆馆长,1979年9月逝世。

胡愈之在1977年民盟恢复活动后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工作,并于1983年祖国中兴的日子里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胡愈之的倡导下,1985年民盟中央主办的杂志在北京创刊,并根据胡愈之的建议,杂志定名为《群言》。这位为救国多次出良筹,见义轻风浪的老一辈出版和文化事业的先驱于1986年1月逝世。

晋言的另一位参与者,胡愈之的革命伴侣沈兹九一直协助胡愈

之工作,在“文革”结束后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重建作了大量工作,于1989年12月逝世。

虽未直接参加晋言,但始终参与此事的楚图南直到1978年才由于胡耀邦的过问,和夏衍、曹湊等一批老同志一起,分配了工作,重新回到人民外交的工作岗位上。1986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4年4月逝世。逝世前五天,老人对守护在身边的子女说过,胡愈之等人在“文革”期间的晋言是重要事件。他除了对子女讲述其中的重要情节外,还叫子女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晋言的当事人:“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听取晋言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华国锋(半天),记录李金德;晋言的内容:胡: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周:教育;杨:青年;这就是楚图南最后的日记。

后 记

晋言一事已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当今情况与“文革”时期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年知识界几位老人痛陈的关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应该说仍是领导者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本文的初稿曾在胡愈之在世时十分关注的两家报刊受到冷遇,使笔者认识到,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被领导者,还是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舆论界,对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作为当事者的后代,基于上述认识,记下我们间接了解的史实,记下先辈的谏言,并以此寄托我们对先辈们不逝的怀念。

(本文作者周彦瑜高级工程师是周世钊的女儿,吴美潮高级工程师是周世钊的女婿,楚泽涵教授是楚图南的儿子)

(责任编辑:洛 松)

聂荣臻元帅 和他的两位老秘书

● 马京生



范秘书

范秘书名叫范济生。今年73岁，已经离休在家。到了他这个年龄，也许最爱回忆往事。他拿出影集指着相片，给我讲述着当年的故事：“我从1945年跟随聂帅，一直到1967年。那时我年轻力壮，跟聂帅学了不少东西。”

聂帅不爱多讲话，讲一句是一句。

那还是战争年代，范秘书才24岁，聪敏机灵。聂荣臻只要一喊：“范秘书！”他边答应着边脚不点地的往聂荣臻跟前跑。这时聂荣臻已经开始交代任务了，等到范济生跑到跟前，他的话已经说完了。刚开始

范济生听不大懂聂荣臻的四川话，听不明白也不敢问，也不敢走，站在那一动不动，于是聂荣臻就把任务再复述一遍。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到达阜平县城南庄。聂荣臻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下榻处，他搬到隔壁一间较小的房子里。

为了安全起见，那天傍晚城南庄戒严。老百姓不懂戒严的含义，越是不让他们出门，他们越是好奇，纷纷爬到自己的屋顶上朝路上张望。山路边的平房顶上就像是北京天安门前的观礼台，挤满了翘首以望的老百姓。

自从毛泽东住进了这座小院，当时患有气管炎的聂荣臻，早晨再也听不到他大声咳嗽了。

聂荣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慎之又慎。可是毛泽东向来不在乎那些，到城南庄的第二天，他出去散步，在田边碰到一位老农民就聊开了。结果当地的老百姓迅速传开了这一新闻。毛泽东几次去几里外的温塘洗澡，总有许多人围着看，警卫员要把人们挡开，毛泽东还总是不让。

有一天清晨，敌机突然轰炸了城南庄。

当时范济生跟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住在一间房子。吃早饭时，范济生接到晋察冀军区电话报告，说有6架国民党的飞机沿阜平西大庄大道飞往阜平上空，现拐向史家寨。范济生接完电话马上报告了聂荣臻。

“范秘书，你要保持与晋察冀军区的联系。”聂荣臻命令道。

范济生刚跑回房间，就接到晋察冀军区电告：“6架飞机转向南飞。”范济生再次向聂荣臻报告。时间不长，就听见天空上传来刺耳的飞机轰鸣俯冲的声音。一架野马式战斗机已经飞临城南庄上空，对着城南庄到易家庄几个驴驮子扫射。

聂荣臻随即跑到院中观察，“范秘书，注意，飞机已向我们驻地上空飞来了。”聂荣臻说完就去动员毛泽东进防空洞。

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刚脱了衣服上床休息。

“就一架飞机，怕么事哟！”毛泽东依然躺在床上说。

聂荣臻急得满脸通红，站在毛泽东面前就是不走。

飞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开始对村西驴驮子扫射。

聂荣臻当即命令道：“范秘书，毛主席不走，咱们就把他抬走！”

范济生扛来行军床，聂荣臻指挥范济生、李银桥等几个秘书和警卫员要一起把毛泽东抬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见聂荣臻果真急了，连忙起身下来，说：“我自己走，自己走。”

这时先来的那架战斗机飞走了，又飞来一架B-25轻型轰炸机。

聂荣臻等人陪同毛泽东刚出了院子北门到防空洞口，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把老百姓的猪给炸死了。

聂荣臻和赵尔陆堵在防空洞口，用身体挡着毛泽东，毛泽东要

看外面动静，只好从他们俩之间向外张望。

第二枚炸弹落在营门前没有爆炸，哑巴了。

第三枚炸弹丢在场地上，飞扬起漫天尘土。

第四枚炸弹扔在院子里，屋内的暖水瓶炸裂，直往外流热水。窗台上放了一篮子鸡蛋，满屋子飞的都是斑斑点点的鸡蛋黄。

确认敌机飞走后，聂荣臻才请毛泽东回房休息。

饭后，毛泽东和江青出去散步，见到那枚未爆的炸弹躺在营门前，就蹲在旁边观看。

聂荣臻在院中见此情景，急忙跑过去，他瞪了江青一眼，拉起毛泽东就走，边走边说：“不能在这里看！”

毛泽东一时没回过味来，莫名其妙地瞧着聂荣臻急成那个样子，一声不吭就随聂荣臻离开了那颗未爆的炸弹。

随即聂荣臻让范济生再次催促工兵立刻把炸弹拆走。

事后查明，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是个特务，他向敌人告密，引起了这次轰炸。轰炸未达到目的，刘从文受到应得的惩处。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有意追问聂帅：1948年敌机轰炸城南庄，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就出在你



1981年夏，聂荣臻与邓小平在北戴河亲切交谈

的司令部，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聂帅干脆地回答：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你去问毛主席好了。

1958年，我国导弹研究工作步履艰难地起动了，苏联援助的导弹样品放在国防部五院，严格保密。

当时，聂帅的老部下6个将军听说后，一起来找范济生，他们说：“我们都想看看导弹是什么样的。聂帅管这事，还信不过我们吗？”

范济生向聂帅报告了此事。

聂帅说：“我相信老同志，但中央有规定不能去看，你给他们说说，此事要严格按照规定办。等我们自己研制出导弹来，我会请他们来提意见的。”

范济生把聂帅的话转告了将军们。

聂荣臻的工作极为繁忙，没有上下班之分，中午从不回家，和衣在办公室的床上歇一会儿，又继续工作。他经常夜间去政治局或毛主席、周总理那里开会，因为毛主席



核导弹升空，聂帅为之鼓掌，左为钱学森

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所以会议常安排在晚上。有一天晚上，天气非常闷热，聂荣臻刚刚坐进澡盆，正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电话铃响了，毛主席叫他去开会。他二话不说，从澡盆里跳出来，穿上衣服，直奔毛主席的住处。聂荣臻去开会往往直到早上天亮时才能回来。这时正好范济生一觉醒来，看到聂荣臻开会回来，随便吃几口饭打个盹，8点钟又准时上班了。有时一连好几天夜里开会，只能早上回家稍微休息一会儿。这种“连轴转”的事是经常的，有时几天不能睡觉。有些老干部知道聂荣臻很忙，就专门在早晨打电话请示工作。为了让聂荣臻能多休息一会儿，范济生想出了一个主意，在聂荣臻的电话上接一个并联分机，如不是万分紧急的事，就不去打搅他宝贵的休息时间。

周秘书

周秘书名叫周均伦，他给聂帅当秘书之前是国防科工委秘书长

安东的秘书。

范济生给周均伦传授经验：“聂帅是四川人，你要是听不懂他的话，你就站在那别走，也别吭声。”

1961年6月8日，周均伦到聂帅办公室报了到。

聂帅第一次给周均伦交代任务，就把周均伦给难住了。

“通知五院(Wàn)到我这来开会。”聂帅一边看文件一边说。

“五万”是什么呀？周均伦怎么也琢磨不明白聂帅的四川话是什么意思。他就站在那不走。

聂帅抬起头看他站在那，就说：“五院(Wàn)的领导有钱学森、王秉璋等几个人，让他们到我这来开会。”

这样，周均伦就弄明白了聂帅的意思。

有一天傍晚，周均伦陪聂帅在院子里散步，聂帅问他，“西边烧了没有？”周均伦惊愣了半天，去问老秘书，这才知道，聂帅在战争年代养成了一个看天候的习惯，在晋察冀时，每天傍晚他总是要站在田埂

上看西边晚霞色彩。用聂帅的话说：“西边烧了，明天就是好天。西边不烧，明天就要变天。俗话讲，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嘛。”以后周均伦摸到了聂帅这个特点，晚饭后总是到院子外边去看看西边烧了没有。

聂帅主管科技工作，为了使中国能尽快有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他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

讲话一传开，许多知识分子给聂帅写信反映问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大学生给聂帅写信说，她是学核物理专业的，毕业后将要分到二机部去，但她不想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她认为核武器是毁灭人类的魔鬼。她要求分到上海去教书。

聂帅看了这封信，对周均伦说：“可以照顾她的愿望，让她到上海去教学。但是，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就不可能抵抗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核威胁、核讹诈，也不可能巩固的国防。你要把我的意见告诉她。”

当时，有些科学家反映：五院把几千名大学生抽出来，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去西藏参加平叛等等。第二天，聂帅让安东去向五院党委传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迅速纠正。当时，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充分受到老师的信任，他们丢掉包袱，开动机器，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国防科研任务中。

1960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军队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积极搞起创“四好”、争“五好”。广大知识分子对此有意见。

聂帅听到这个情况后，把总政

治部领导找来,对他们说:把知识分子按士兵一样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自觉性,不能光靠开会,搞得精疲力尽,那样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

聂帅一直主张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当时,大学毕业生第一年实习期满,工资为每月46元。他认为知识分子待遇太低。于是,聂帅就这个问题和三个秘书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聂帅主张给刚毕业的大学生订为100元工资。三个秘书认为这样幅度太大,工资翻一番还多。当时秘书刘长明是上校,每月一百余元,甘子玉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又是工程师,每月刚一百出头,周均伦是大尉,每月90多元。一个8级老工人才一百多元工资。三个秘书认为,大学生一毕业工资就那么高,容易脱离工农,应该是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

聂帅说:“我们国家富强要靠知识分子,我知道你们都是老资格了,应该照顾。但是,我们还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于是聂帅给国务院写了报告,要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份报告。

1966年10月,我国决定在本土进行“两弹”结合试验,就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

这一天,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空线关闭,新疆、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发射场附近数以万计的居民疏散隐蔽。而此时,聂帅却在发射现场观察着吊装、对接、瞄准、校零和临射前各项测试。

10月25日,发射那天戈壁滩风很大,黄沙飞舞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人们的身上。

聂帅打电话给周总理,“发射场区出现强劲的西风。”

周总理说:“能否发射,由你现场决定。”

聂帅在发射架和控制室里详细听了专家们的汇报,当即拍板决定,试验仍按程序进行。

聂帅坐在一把椅子上,亲自监督着导弹与原子弹的电气设备对接,老帅镇静地坐在旁边,充满信心的目光注视着年轻的操作手。站在旁边的秘书和警卫参谋可真替聂帅的安全紧张得手里攥出了汗!

导弹按预定轨道准确飞向落点。

1967年6月,中国将要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

6月16日,聂帅带病来到戈壁滩的核试验基地。

茫茫戈壁孤零零地立着一座非常简陋的小屋,屋外是一片死亡地带的景色。屋内却热气腾腾,聂帅在听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那地方荒无人烟,蚊子却特别多,闻到人味一轰而上,赶都赶不走,聂帅安之若素,信心十足,要大家完全彻底打一个漂亮仗。

第二天,聂帅和担任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飞机驾驶员谈话,要他胆大心细,遇事不慌。8时整飞机到达爆心上空,按指令在预定部位空投氢弹,由于意料不到的原因,氢弹未能投下。

飞行员向元帅要求再投一次。多么勇敢的年轻人!元帅信任地点点头。

飞机再一次飞行一周后,8时30分将氢弹投下,一个特制的降落伞吊着的氢弹徐徐下降,骤然间,随着氢弹的爆炸,碧蓝的天空立刻翻腾起一团烈焰熊熊的大火球,只听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一朵色彩鲜艳的蘑菇云蔚为壮观。

周均伦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穿上防护服,到试验场区里去看效应物的情况。远离氢弹爆炸的

几十公里外,一座2层楼轻而易举让冲击波掀飞了,火车头翻了好几个滚,沙漠结成了黄金块,那些小动物都为试验而永远献身……

1992年,聂帅已经知道自己病情严重,将不久于人世。

聂帅深情地对周均伦等几位老秘书说:“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然而,“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我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

聂帅从未见过老秘书们掉眼泪,此时此刻他安慰老秘书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的心力衰竭,很难抢救,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

1992年5月14日,聂帅走完了他93年的辉煌生命旅程,安详地离去了。

聂帅去世之后,周均伦依然如故,每天去办公室,兢兢业业坐在办公桌前,和同志们一起整理编辑出版了《聂荣臻军事文选》、《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悼念聂荣臻元帅文集》、《聂荣臻传》……如今周均伦已经是64岁的人了,忙了一辈子,该喘口气安度晚年了。可是他像过去一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悄悄收起他的将军服,穿着普普通通的便衣,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办公室整理聂帅遗留下来的文稿。

(责任编辑:刘文)

三位南沙老人说南沙

● 杨肇林



林 遵

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收回。”

有3位老人告诉我“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收回”南沙的史实。

林 遵

——进驻南沙

曾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在南京起义的林遵，是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由他率中国海军“前进”舰队收复了南沙、西沙群岛的。

1977年，林遵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我在东海前线再次采访他。他向我谈及当年进驻南沙群

岛的经过。

林遵出身于海军世家。父亲林朝曦是清朝水师的鱼雷艇长。他的叔祖林则徐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他一心想像乃祖一样，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1924年，林遵18岁，考入烟台海军学校，1926年转入福州海军学校，1929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格林维基海军大学中尉班和波斯麦斯通信、鱼雷、航海、枪炮专科学校高级班毕业。战前还曾去德国、美国、日本海军考察。他梦寐以求的是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1945年1月，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中国海军的70名军官、近千名水兵，远涉重洋去美国接收8艘小型军舰。二战后，法国殖民者重新回到越南，继续觊觎中国南海诸岛。中国政府于1946年7月决定组织“前进”舰队协同内政部、广东省政府进驻南沙、西沙群岛。

“前进”舰队由“太平”号护航驱逐舰、“永兴”号驱逐舰和“中业”号、“中建”号登陆舰（各4000吨）组成。11月2日，开进虎门。

望着虎门古炮台，林遵感慨万千。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没有打完的官司，没有打完的仗。1933年7月，法国殖民者曾悍然宣布占领南沙9个岛礁，激起全中国上下反对。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严正交涉而没有结果。抗日战争爆发，法国人又趁机宣布，将一度强占的西沙群岛并入安南（当时

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后来,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这两个群岛。日本投降后,这些岛礁都为中国收回。此次进驻,“前进”舰队担负着这一历史重任。

军舰接载了广州行辕代表张嶧,广东省政府代表萧次尹、麦蕴瑜等人,立即出航。进驻西沙群岛后,林遵亲自率领“太平”号、“中业”号进驻南沙群岛。

南沙群岛航程远,风浪大。第一次出航,遇到大风大浪,中途折返。第二次出航,又是大风大浪,再次中途折返。林遵和水兵心急如焚。林遵和下属商量后,决定改变航线,避开风浪,尽快进驻南沙。

一片浅绿海水,一线白色珊瑚沙,托起一片绿岛。测定为北纬 $10^{\circ}22'50''$ 东经 $114^{\circ}22'0''$,这就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黄山马峙。

礁盘边缘隆起,岛上灌木丛生,郁郁葱葱,海鸟云集,更有椰树耸天而立。林遵下令在礁盘外面抛锚,放下舢板,派遣陆战分队、水兵分队涉礁登岛。

登陆分队上岛以后,发回信号,林遵便带领官兵和广东省政府人员一起登岛。

岛的西南侧防波堤尽头,有一座日本侵略者修的纪念碑,十分刺目。林遵一挥手表说:“立即摧毁!”

岛上重新树起中国主权碑石。

林遵、麦蕴瑜主持,以海军隆重礼仪,升旗鸣炮,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南沙群岛正式回到中国怀抱!为纪念这历史性的航行,以“太平”号舰名给黄山马峙重新命名。

12月15日起,林遵率领“太平”舰巡视了铁峙、南钥岛、双岛等,用“中业”号舰名重新给铁峙命名。

“前进”舰队凯旋广州。1947年元旦,在“太平”号军舰举行记者招待会,军舰后甲板,上盖天遮,两舷用帆布围成一个别致的会场,

中外记者云集采访,各方人士赶来致意。林遵站在甲板中央,向记者、来宾介绍了进驻南沙、西沙群岛的经过,报纸、电台广为传播,鼓舞了举国上下的保卫南海诸岛的热情。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机构和军队一直驻守“太平岛”。1950年,中国台湾当局曾一度将驻军撤离。1956年6月5日,派“太和”、“太仓”号军舰和陆战队重新进驻太平岛。

麦蕴瑜 ——署理南沙

麦蕴瑜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他曾任南沙群岛专员,还是曾经留学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我在广州拜访他时,他已经是92岁的老寿星了。

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麦蕴瑜老人清晰地告诉我当时的情形。

“1946年11月,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向我说,法国人重返安南,有染指南沙、西沙群岛的迹象,中国政府决定派舰队进驻、收复这两个群岛,广东省政府委派专员去接收。经再三考虑,决定派你当专员,派你去……”

老人娓娓而谈。

南沙群岛,当时叫团沙群岛,向为航海者视若畏途。宋《会要》里描述说:“其洋或深或浅,水急滩多,舟覆溺者十七

八。”元人在《岛夷志略》中说:“中匿石塘,熟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

面对凶险,麦蕴瑜没有退缩,率领测量、农业、水产、气象、医务人员和石匠、木工,携带水泥、钢筋、石碑等随“中业”号登岛。

上岛后,在简陋的房屋墙壁上,有日本侵略者留下的遗言。侵占南沙的日本人直到1945年8月27日才知道日本战败投降,他们身处孤岛,悲观绝望,自杀身亡。日本军队于1938年侵占南沙群岛,建了码头、栈桥,设立了“南洋公司”,掠夺岛上资源,仅鸟粪就盗走6万7千多吨。

迅速清除了日本侵略遗迹,重新树立中国主权碑石。麦蕴瑜又带领技术人员对南沙群岛进行了考察、勘测,绘制成图。

1947年,在广州市举办了中国收复南沙、西沙群岛展览会,民众以爱国热情踊跃参观,也引起了



麦蕴瑜

世界各国注意。

1947年12月1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内政部根据实地考察,正式公布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滩的名称。

1955年,在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麦蕴瑜慷慨陈词:“南沙群岛是我们中国神圣领土,要努力开发!”为了促使各方面重视,他和友人卓振雄合写了《祖国的南疆——南沙群岛》一书,送给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

1979年4月,麦蕴瑜把几十年间收集、整理的南沙群岛资料,全部献给国家。

麦蕴瑜老人带我到书房看了政府授给他的感谢状,又兴奋地向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现代马可·波罗的故事吧。”

二十世纪中期,有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传播意大利和欧洲文明。此时,中国已不再是强盛的元帝国,而是备受列强的宰割和侵略了。这位牧师不知是什么原因,关注起法国人、日本人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收集了中国境

内、境外各方面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资料,汇集成册。

五十年代,这位牧师老了,将要离开中国,他找到麦蕴瑜,把资料交给他,说:“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些资料也属于中国!”

这些资料,现在收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里。

麦蕴瑜感慨说:“这一位当代马可·波罗出于人类良知,尊重历史,使人们相近、相知。”

老人十分关心守卫南沙的海军战士,说道:“南沙风浪大,太阳毒,距离大陆远,战士们要克服多少困难啊!”

我把从南沙带回的照片,请老人看,他看到礁盘上的高脚屋,不再是简陋的竹架茅寮,而是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建筑。看到永暑礁上居然建起了楼房,海洋观测站还向全世界发布海洋资料,他连声说:“好,很好!”

李景森

——巡航南沙

李景森是广州航海学会副会

长,广东省政协委员。乍见,你会当他是一个中年,实际是,早在1947年他25岁时,便已经是中国海军“永兴”号驱潜舰副舰长了。在中国海军进驻南沙群岛之后,他曾经经常在那片海域巡航。他向我讲述起各个岛礁的历史和风采。

太平岛的礁盘伸出约一千多米,礁盘边缘,波翻浪卷,水花四溅。礁盘泛着夕阳,绿莹莹的,环岛珊瑚沙,雪白如银。满岛覆盖着密密的抗风桐灌木丛,令人惊异的是居然有椰子树高高耸立,这真出乎意外。西太平洋的台风,经常在这一带肆虐,风过后一切生物荡然无存,这高入云天的椰子树,是中国渔民的几代人不懈努力的伟绩。灌木丛中开垦出小片土地,生长着香蕉、木瓜,在显示着我们祖先劳作的功绩。

令人格外惊喜的是岛上的水井,井里是淡水。

在南沙群岛的中部,岛礁散处,时隐时现,水流变化,极难掌握,历来被称作危险海区。“永兴”号小心而勇敢地航行。



1946年12月,中国政府官员及海军官兵接收南沙群岛在太平岛上留影

安波沙洲，这名字寄托着人们希望这里波澜不惊。沙洲却实在是太美了，像是一块绿玉，悬浮在凝重的、黛色的海水中。军舰靠近时，一大群白色海鸟飞起，在岛的上空盘旋，久久才落在羊角树丛的绿荫上。岛上有很厚的鸟粪层。渔民在这里捕鱼、捞参。一问，全是海南岛来的，他们搭架了简易寮棚，长年来这里居住、作业。

曾母暗沙是南沙群岛的边缘，一大片适淹礁隐伏在水下。来到这里，才真正到了天涯海角，祖国最南端的土地。

李准滩，是一个绵延近3海里的狭长的礁滩。它是以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名字命名的。宣统元年，1909年，李准率领“琛航”、“广金”等3艘军舰巡航登岛立碑，升旗鸣炮，郑重昭告天下，重申中国主权。长期以来，法国殖民者一直觊觎南中国海上的中国领土，但由于李准的这次巡航，法国总理白里安在1921年8月不得不承认，鉴于中国人在1909年重申了自己的主权，“我们目前对这些岛屿提出要求是不可能的”。

郑和群礁，景宏岛，费信岛，马欢岛，尹庆群礁，这些以郑和及其助手名字命名的岛礁，令人想起郑和宝船七下“西洋”的壮举。康泰



李景森和本文作者（左）

礁、朱应礁，记载着公元226年三国时吴国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的史实。扶南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出使途中，考察了南沙群岛，指出这是在熄灭了的火山盘石上长出珊瑚形成的珊瑚洲。

双子群礁、中业岛更留给人以深刻印象。

双子群礁四周是浅水环礁，十分美丽，水产丰富。中业岛是南沙群岛中露出水面的第二大岛。岛上有淡水井，有棕榈树丛，灌木、杂草覆盖，一片皆绿。海南岛的渔民常年在这里捕鱼、捉龟、捞参。他们有的长住岛上，从海南岛运来粮

食、淡水，再把晒干的海龟肉、海参运回海南岛。他们过着艰辛劳作、物质菲薄的生活，经年遭受着台风、海浪、大潮的吹打、冲击，但他们仍然坚忍不拔地开发、拓殖这片珍贵的土地和海洋。

李景森说：“我们巡航南沙群岛，看到的只是中国渔民，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这里属于中国！”

李景森还感慨地说：“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懂得，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的国土，960万平方公里，还要加上近4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责任编辑：刘文）

邮购启事

近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4.00元，订阅补购一期、一个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另本刊1995年合订本（总34—45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套47.00元，一律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晰，以免误递。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170955 联系人：杜 习



张爱萍 1938 年摄于亳州

张爱萍 单枪匹马 闯路东

● 胡士弘

1938 年深秋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鹿邑县刘大庄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

此人二十七八岁年纪，身材挺拔，手里拎了只小提箱。正吃午饭的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闻声急忙迎出来：

“啊呀，爱萍！总算把你盼来啦！”

此人便是几天前彭雪枫一再致电向周恩来硬要来的八路军青年将领张爱萍。

张爱萍与彭雪枫，当年同在红三军团彭德怀麾下，长征过草地，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老战友敌后重逢，自有说不尽的欢悦。

“我在确山干得好好的，你要

我来干啥子嘛！”就着剩菜饭，张爱萍边吃边说。

当时张爱萍作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参，受周恩来指派，正在豫南确山游说一支地主武装参加抗日。工作做得很艰苦，这支以宗族斗争为目标的武装终于接受了收编。张爱萍还为这支部队取得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番号。

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张爱萍自然是不好离开的。河南省委书记陈少敏大姐也一再挽留：“我们希望你担任省委军事部长。你就不要走了，我给周恩来同志发个电报。”

然而，周恩来回电是催张爱萍尽快东行。

对张爱萍的问话，彭雪枫回答得很俏皮：

“我听说你在确山日子过的很艰难，住的是破庙，吃饭也要自己

烧。我不放心，所以嘛，我便请求恩来同志把你要我这儿来啦！”

“您的日子就好过么？不见得吧。”张爱萍笑着说。

的确，彭雪枫的日子更难过。

一个月前，彭雪枫奉命率部从竹沟东进。出发时部队是 373 人，现已发展到 1400 余人，还将扩大到 3000 余人。队伍迅速壮大，要吃要穿，眼看隆冬将至，部队棉衣还没有着落。吃饭连霉红薯面也吃了，彭雪枫竟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坐骑……司令部驻地属鹿邑县，县长魏凤楼曾在西北军当过军长。此人有正义感，爱国心，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无奈我们派去做工作的同志嫌人家落后，同魏的关系搞得很难，便不辞而别，原指定魏给部队筹粮筹款，现在砸锅了！可部队嗷嗷待哺呵，要解决这火烧眉毛的事，彭雪枫决定十万火急派张爱萍

来做魏凤楼的工作！

张爱萍做“游说之士”，已久负盛名，同李宗仁、黄绍竑等国民党政要打交道，颇有建树，他原本想在豫南铸造一个天地，眼下盛情难却，暂且再做一次“说客”吧。

张爱萍果然出手不凡。

魏凤楼很快被张爱萍的气度与才具折服了。他视张爱萍为“知己”，委以整训他的部队与指挥作战的全权，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张爱萍干得很出色。于是，魏凤楼在张爱萍的“游说”下慷慨解囊。两千多套里外三新的棉衣，三千元白花花的钢洋，就在1939年的春节前夕，送到了彭雪枫的部队，在部队最艰难的时刻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二

1939年春，从延安到竹沟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对豫东主要干部的工作分工提出：“建议”彭雪枫作为豫东党政军委员会主席，仍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所兼政委一职由张爱萍担任。

对于政委一职，张爱萍婉拒了。他认为：彭雪枫完全有能力继续一身兼二任。于是，经中原局刘少奇批准，张爱萍改任省委书记。

在张爱萍看来，党的六中全会开过了，王明那些捆绑手脚的绳索已经解除，现在是响应党的号召，放开手脚，到敌后去发展壮大自己是最好的时机。张爱萍觉得，这里面对日寇，背靠顽军，地区狭小，处境艰危，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他主张越过津浦路，进入路东，进而挺进苏北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

“向东发展，也是个办法，可是那里情况我们不熟悉。再说中央军委要我们回伏牛山，一旦敌人占领平汉线，我们可以配合正面战场

打游击。”彭雪枫提出了自己的考虑。

张爱萍很理解彭雪枫的想法，可现在武汉失守了，正面战场打通平汉路已十分困难，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以伏牛山作根据地，其战略意义不大了。如能驰骋江淮河汉，逐鹿中原这盘棋便活了！

这时，路东派人来了。来者名叫刘子吾，是中共安徽宿县县委派来的。

刘子吾向张爱萍作了详细的介绍：日军由于兵力匮乏，在路东只在沿路沿线以及一些重要城镇设了据点，在广大农村，以至于整个洪泽湖地区，都还在中国人手上。国民党在路东的只有桂系廖磊收编的一些民团。新近从六安派来的国民党安徽省第六专员盛子瑾，手下也只有千余人。此人是中央系的，他在桂系一统天下的安徽怕被人吃掉，很想同我方合作，希望游击队派人去。

张爱萍越听越兴奋。假若情况真如刘子吾所言，那么路东便是几方力量尚未控制的难得的空隙地带，便是我党我军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舞台。

当张爱萍提出他的设想时说：“我先带支小部队去侦察侦察，摸摸情况，给你打个前站。”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大概彭雪枫以为，即使去路东侦察情况，也用不着由张爱萍这样的省委书记去冒险呀！

“不，”张爱萍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

在张爱萍看来，当前没有比真实地掌握路东的情况更为重要更迫

切的了。他亲自去跑一趟，冒一点风险，是完全值得的。再说，对于重大的事，志在必得的事，张爱萍从来没有仅凭二手情况就拍拍脑袋决策的习惯。

“你去当然好。”彭雪枫说，“不过，你的行动要报告中原局，我个人决定不了。”

彭雪枫很了解老战友执著的脾气，不得不默许了。不过，他不同意张爱萍带部队去。

“那就带一个人，再带一部电台，以便一旦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你报告，免得徒劳往返。”

“带电台去容易暴露，反而不安全。”

张爱萍志在必去，再大的艰险也阻挡不住他了。

最后，彭雪枫还是答应张爱萍带一个干部去。

临出发时，彭雪枫关切地打量了一下张爱萍的穿着。

“黄秘书，你到供给处，要他们替爱萍同志赶做一双新鞋子来。”彭雪枫说。

在那个艰难岁月，能穿上一双



彭雪枫

新鞋实在是莫大的“幸事”。不过张爱萍的穿着确实也够寒碜了。特别是他脚上的那双鞋，已经破得“漏洞百出”。尽管当时都那样，但张爱萍毕竟是要离开大部队远行哪。

鞋子做得很快，也很合脚，还颇“时髦”。那鞋尽管是布面布底，但头尾都缀着牛皮，堪称是一双“抗日牌”的“皮鞋”吧！

登着这双特制的鞋，张爱萍开始了新的征程。

三

这确实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冒险行动。

他们出发时只有3个人：张爱萍，游击支队民运科长刘作孚，带路的刘子吾。

一天深夜，他们一行终于越过津浦路封锁线，次日中午时分，来到了皖东北中心的泗县地区。

走进一个庄子，在一座宅院门口见到一块牌匾：泗县县政府。

张爱萍在这里受到了热情接待。交谈中，获知县长黎纯一也是四川人。黎纯一设便宴招待。

趁着饭局，张爱萍从黎纯一口中掏出了国民党在皖东北各派的军事实力，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等等重要情况。

正当推杯换盏谈兴正酣之际，屋外骤然传来了枪声。

“日本鬼子出动了！”有人慌慌张张地来报告。

刚才还是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的县太爷，此时再也顾不得友党友军的贵客，便带着几个人偷偷溜走了。

张爱萍站在天井里侧耳细听了一阵枪声，便问刘子吾：“这一带

有国民党正规部队吗？”

“没有听说过有正规部队过来。”

“这就奇了，这枪打得有章法呀！走，跟我来！”

张爱萍竟迈开大步急速地循着枪声向北奔去。

走了约莫20多分钟，迎面看见一座土山，枪声便是从这土山上传来的。

在山脚下，他遇到了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回答竟出乎张爱萍意外：“我们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二大队。”

张爱萍只知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南下到了鲁西南地区，没有估计到会过陇海路来。张爱萍喜出望外：“你们大队长是谁？”

“梁兴初。”

那是老熟人。

在山上见着了梁兴初。梁兴初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张爱萍。梁兴初告诉他，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于去年秋冬由晋西进入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战略侦察，后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改称八路军苏鲁皖支队。这次南下，便是为向敌后挺进作战略侦察。

“你们支队领导都有些什么人？”张爱萍问。

“都是熟人，你都是认识的。”梁兴初道。

“支队司令是彭明治，政委你就更熟啦……”

“是谁？”

“吴法宪。”

“吴法宪？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连名字也第一次听到，我怎么会认识呢？”

梁兴初笑道：“此人你不但认得，而且是您的老部下，他就是当

年少共训练班里的吴文玉嘛！”

“噢！原来是他呀！”张爱萍也笑了。

时近黄昏，枪声稀疏了。战斗渐渐平息下来。我八路军战士给鬼子以大量杀伤，但自己伤亡也不小。

“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办？”张爱萍问梁兴初。

“今晚就准备撤回去。”

“既然来了，还要撤回去干什么？”

但梁兴初坚持要撤回鲁南，张爱萍沉思片刻道：“这样吧，我给彭明治、吴法宪写一封信。同你们约一个时间：你们什么时候再到路东来，就发个电报到彭雪枫的游击支队。”

半个月后，吴法宪来了。他带了两个大队（团），护送张爱萍周游了皖东北各县镇。

吴法宪对张爱萍很尊重，他派王东保大队护送张爱萍，自己也一直陪同张爱萍到灵壁。

到了灵壁，张爱萍对吴法宪说：

“咱们该分手了。你执行你们的任务，我们继续东进。”

于是，他换上了便衣，把军装留给了吴法宪。

这次到路东，张爱萍探访了皖东北各界头面人物，寻访了散布在角角落落里的游击队，还造访了国民党皖东北的“顶尖人物”盛子瑾。

张爱萍周游路东之后，便在路东扎下了根。他从山东分局请来金明，一起在洪泽湖边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团结了各路“诸侯”，在这块斗争纷繁的战略要地上，建成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责任编辑：刘 文）

石井音魂

——音乐家任光血洒皖南

● 周乃光 严文欣

石井坑，是安徽泾县茂林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在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誉为“民族的号手”的革命音乐家任光，牺牲于此。

任光，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城里一户工匠之家。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学会拉二胡、吹铜号、弹风琴，并赢得了“小音乐家”的绰号。1917年夏天，任光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不久进入里昂大学学音乐，从一位老教授那里学得了一手高超的钢琴调音、演奏技巧和修理技术。1924年，他被推荐去越南河内亚佛琴行任工程师兼经理。1928年任光回到上海，被法商百代唱片公司聘为音乐部主任，负责音乐节目的选定和录制工作。任光很快结识了聂耳、吕骥、张曙等进步音乐工作者，发起并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不久又参加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多次掩护地下党员脱险，对聂耳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开始，聂耳在合唱团吹小号，任光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介绍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成为自己

的助手。聂耳一直叹服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称任光为“我们的导师”。

任光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了十个年头，这期间他为我国新兴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两大历史性的贡献。一是他利用在“百代”工作之便，先后录制了冼星海等左翼音乐家的歌曲唱片四五十首，其中有聂耳作曲和亲自演唱的《打砖歌》、《开矿歌》、《码头工》等，还举办唱片试音会等多种活动，为左翼音乐通向人民开通了渠道。“九·一八”事变后，任光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亲自动手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激励斗志的歌曲。任光创作的领唱齐唱曲《十九路军》，歌颂了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的业绩，是我国最早的爱国抗日歌曲之一。接着他又连续创作了《少年进行曲》、《和平歌》（又名《反侵略战歌》）等反帝反侵略歌曲。1936年5月，任光以“前发”为笔名，发表了队列歌曲《打回老家去》。这是一首以“一呼百应”的表现形式谱成的口号歌曲，强烈地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誓死收复失地的钢铁意志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

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汇合一起，成为当时群众最受欢迎的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而载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册。任光的另一历史性贡献，就是他积极参与了我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创作。1933年，任光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一起当选为刚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他先后完成了12部电影音乐的创作。为了写好影片《渔光曲》的主题歌和插曲《渔村之歌》，任光不辞辛劳，专门到崇明岛等地，住在渔村体验生活，跑到船上搜集创作素材，终于创作出轻柔委婉、如诉似泣的《渔村之歌》（后来人们把它称为《渔光曲》）。1934年4月14日，《渔光曲》在上海公映，酷暑季节连映84天，出现了我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轰动，《渔光曲》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曲。聂耳说：“其轰动的影响甚至形成了后来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1935年，《渔光曲》被送往苏联参加莫斯科电影节，获第9名荣誉奖，是我国影片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奖。

由于任光把《打回老家去》等许多抗日歌曲灌制成唱片，使这些



任光

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人民响亮的怒吼，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惶恐不安。1937年7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挖空心思查明，创作《打回老家去》并灌制大量抗日歌曲唱片的，原来就是法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于是向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指责法国的唱片公司不该制作“敌视日本国”的唱片。8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禁唱《打回老家去》。任光面临着被日本侵略者暗杀的危险，法国经理动员任光去河内的百代唱片公司任经理，任光谢绝说：“我是中国人，抗日是义不容辞的，我决不当逃兵！”

1937年冬天，任光应罗曼·罗兰之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有42个国家代表出席的反法西斯

侵略大会。任光率领着他的华侨合唱团，在会上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任光亲自担任指挥，随着他银亮的指挥棒，雄浑豪壮的歌声响彻全场，不同肤色的人们听着这东方大国的呐喊，挥舞着帽子，拍着手，击出战歌中的强拍，由衷地感慨：“啊，中国现代歌声蕴藏着中国的无限希望！”在巴黎，任光带领华侨合唱团为中国抗战难民募捐义演，为西班牙儿童募捐，任光又创作了《中国进行曲》，亲自担任钢琴伴奏。演出后，法国报纸赞誉说：“中国人民作曲家任光先生所作的《中国进行曲》，能充分反映出他对祖国人民抗战之同情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决心”，是“这次节目最成功者”。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把任光造就成“民族的号手”。1938年10月，任光与陶行之等回国，在武汉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他兴奋地创作了《高粱红了》，不久随郭沫若赴重庆，由于国民党执行反共方针，任光转赴新加坡，在那里致力于抗日救亡歌咏活动。1940年，任光再次到重庆，他又创作了《不害怕进行曲》，鼓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任光多次要求去抗日前线，拿起枪杆子同敌人战争。这年秋天，当他听说叶挺将军从皖南抗日前线来到重庆，便去找叶挺提出参加新四军的要求。叶挺为他的抗日热情而深深感动，在他返回皖南前线时，便把任光带到部队，安排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处，负责全军的音乐工作。叶挺希望他能谱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任光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1941年1月10日，任光和他的妻子徐韧，经过急行军后，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忙乱中徐韧掉进一个水塘，好不容易拉扯上来，便与军部失散了。几个战士找了好一阵，才把他们接到石井坑。

石井坑方圆五六里，只有十来户人家。叶挺决定在这里与前来包围的国民党军血战到底。

任光和徐韧，还有军部的秘书、记者，文化处的干部，十几个人躲在一个只有矮杂树掩挡着的小山沟里。为了行动方便，他们早已将棉袄里的棉絮抽掉，单衣薄裳耐不住凌晨的严寒，不时有人站起来搓手跺脚，有人提议：“唱个歌吧？”

“对，唱一个？”正好叶挺巡视过来，他招呼说：“任光同志，请你来指挥。”

疲惫的人们站了起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穿着完整而干净的军装，没有一张脸上不染上被战火灼伤的印记，和那一双双燃烧着复仇

火焰的眼睛。

任光从背包上抽出小提琴，正了正弦，悲壮激愤的旋律从琴弦上流淌出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这是最后的斗争……

歌声是低沉的、昂扬的，歌唱者是疲惫的、振奋的。叶挺也亮开歌喉加入了和声。

这时，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匆匆赶来，向叶挺将军报到。叶挺将军命令他：“由你主事，立即成立一个征粮委员会，就地筹集粮秣！我们已经弹尽粮绝，要在这里作最后的牺牲，懂吗？”

“是？”张元培向军长敬了个礼，转身就去找人。

“张副处长？”任光追了上去要求道，“带上我！我要求参加筹粮。”

“王老五，你就别去吧？”张元培连连摇头。

去年，任光刚到新四军，在军俱乐部的联欢会上演唱了自己创作的电影歌曲《王老五》，这首具有民歌风味的歌曲，非常幽默风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以后，同志们都亲昵地称他“王老五”。

任光见张副处长不肯收他，转过身来向叶挺将军要求：“军长，让我去吧！”

叶挺没有说话。在他心目中，任光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进步音乐家，为了投身抗日，他放弃了高位、高薪，丢掉了洋房、小车，主动要求来到抗日第一线。叶挺非常爱才，就在这次事变之前，叶挺再三劝他们夫妇先行撤出皖南，可任光说：“新四军需要音乐，我的音乐也离不开新四军。”就在新四军离开云岭前，他还谱写了《新四军东征歌》。为了他们夫妇的安全，这次撤离时，叶挺把他们编入军部直属队，因战争倥偬，已经把他累苦，怎

么能再劳累他？任光又一次向叶挺提出请求，叶挺只好点点头。

任光拉上徐韧，一拐一拐地去追张元培。张元培带着任光、徐韧和几位政工干部调查了各处的储粮，又挨家挨户上门说明购粮的理由，当地民众都愿意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活命粮送给新四军，有几户还坚决不肯收钱。任光虽然脚痛，还是起劲地帮着背粮。

从1月11日开始，守在石井坑外围铜山的新四军二纵队，一天之内打退了国民党军的25次冲锋。

12日上午10时，任光刚想去找叶挺打听一下火线上的情况，突然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国民党军以10倍的兵力向石井坑发起总攻。任光急忙伏在地上，山炮不断地向坑内打来，咣的一声巨响，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地打中了叶挺原来住的地方，幸喜他已于昨夜搬家。任光赶紧爬到徐韧身边，为了壮胆，他们轻轻地哼起《新四军东进歌》：“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唱着唱着，任光突然不唱了，徐韧转过头，只见任光昂着头，远望着战斗激烈的东流山，聆听着枪声、炮声、喊杀声。徐韧知道，任光正在捕捉灵感，捕捉中国《马赛曲》的旋律，他曾发过誓，要通过参加战斗的亲身经验，谱写好这支曲子。徐韧相信，这支未来的乐曲将是一支最威武、最雄壮的战歌，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位音乐家会在如此激烈的炮火中捕捉过旋律。

东流山的枪炮声震得人们耳膜隐隐作痛，任光依然全神贯注地沉醉在他的乐思之中。

12日傍晚，东流山守卫战进入白热化状态。守在山上的新四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牙咬；国民党军逼近了，就拉响手榴弹与其同归于尽。重伤员也不下火线，咬紧牙关站起来，抱着敌人滚下深

谷。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毁灭之神终于逼近石井坑。下午3时，因寡不敌众，东流山失守，国民党军直奔石井坑而来。石井坑上空，火光纷飞，曳光弹交错，子弹“嗤嗤”地从前边的山坡如蝗虫般飞来，军部的小院成了集中射击的目标。叶挺下令让仅有的人员分别撤出，这时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已从对面山坡冲下来，开始进入石井坑。

“任光同志挂彩了！”一位满身是泥的新四军战士飞也似地奔来向叶挺报告：任光同志原来伏在军部后面，看到子弹过密，刚想后退，一站起来腹部就中了一弹，不能动弹了。

叶挺的脸色变得异常沉重，乘流弹稍疏，在卫士的保护下，很快赶到任光身边，只见任光脸色苍白，呼吸微弱，痛苦不堪。

徐韧一把抱住叶挺的双腿，呼天抢地地叫了起来：“军长，救救任光——”

“军医！军医！”叶挺连叫了几声，无人答应。叶挺又叫道：“快抬走？”几个战士急忙抬起任光。

走了半里地，国民党军已经冲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国民党士兵，他以为抓住了个新四军的大官，端着枪大步赶上来，气势汹汹地朝任光喝问：“你是什么人？”

任光微微抬起来，吃力地回答：“我、我，《渔光曲》作者，任、任光！”不料那士兵一听，怔了怔，突然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朝任光鞠了一个躬，转身走了。

任光终于因流血过多，永远地合上了眼睛，躺在石井坑这块被新四军的英雄儿女用热血染红的土地上。这一年，他41岁，正是音乐家最成熟的年龄。

（责任编辑：刘家驹）

张云逸大将的廉政风范

● 张广华

1956年3月,我从河内中国军事顾问团回到北京不久,总参谋部干部局决定调我给张云逸大当秘书。

6月中旬,我拿着军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到南池子18号向张云逸报到。

张云逸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年龄、家庭、工作经历、文化程度等情况后说:“我年龄大了,已不担任多少实际工作,是半工作半养老了,欢迎你来帮助我做点事情。”“我这里还有管理员、副官、公务员、司机等七八个工作人员。”说到这里,张云逸若有所思地说:“组织上安排这么多同志来帮助我工作,照顾我的生活,还有一个警卫班,我几次提出减些人,这么多人给国家增加多少开支啊!我心里很是不安……我们还有个党支部,我与韩碧(张云逸夫人)同志都在支部过组织生活。”

由张云逸办公室出来后,老秘书王益特地叮嘱我说:“党支部开生活会一定要通知他,有次见他正在午休,我们没通知他参加,为这事,他对我们进行过严厉批评。”

“让子孙自己去奋斗”

1954年秋天,张云逸由青岛来北京安家后,工作人员劝张老让他小儿子光东到条件较好的“八一”小学去读书,说那里教学、伙食等条件比较好。

张云逸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么多干部子女集在一起,有好处也有坏处;满清的八旗子弟,许多人只知吃喝玩乐,什么事也不能干,我们干部子女要自己去奋斗,可不能变为八旗子弟啊!”

他越说越激动:“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让光东多交一些劳动人民子弟的朋友,增加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对他成长大有好处嘛!”

说到这里,张云逸还把光东叫到身边交代说:“你到北池子小学读书填表时,只填你妈妈的名字,不要填我的名字了。”

光东为难地说:“如果人家问我爸爸是谁,在哪里工作呢?”

“那好办嘛!你就说我爸爸失



1955年,张云逸与夫人在南池子大院

踪了……”张云逸幽默地说。

1959年秋天，光东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第四中学，后来又考取哈军工。

张云逸二孙子小强，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张云逸高兴地说：“我们家里又有了一个农民，很好，我也是农家子弟嘛！我的孙子当了农民，还是劳动人民嘛！”

尊重宾客 平等待人

1958年夏的一天，警卫人员报告说，有一位客人来看望张老。张问警卫认识不认识这位来客，请人家进来没有？警卫说，还在大门外等着。

张云逸批评说：“这样做不好，不管谁来，那是人家看得起我们，都应先请进大门里来，热情相待，把人家堵在门外多不礼貌。”

一天，有一个农民突然推开张云逸家的大门走了进来。警卫看到，一把将那个农民推了出去。当时张云逸正在院子里散步，就严肃批评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也是从农村来的。他走错了，你们应该热情帮助，不能那样一下子猛推出去，这样做很不好嘛！”还继续说，“不要看我是一个领导干部，我也是从农村来的。我们干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和过上幸福的生活。”

有一次张云逸要外出，要他大孙子告诉司机王宝禄叔叔准备出车。他的孙子走出门外大声喊道：“王宝禄，王宝禄，我爷爷要出去，快准备出车！”

张云逸听到喊声，大步跨出门外，抓住孙子的小手大声斥责说：“让你请王叔叔出车，你为什么大声喊叫王叔叔的名字，王叔叔同你爸爸妈妈是一代人呀。今天你要去向王叔叔道歉，陪不是。”

他的孙子只有六七岁，经他这样大声批评，吓得哭了起来。工作人员拉着他到王宝禄面前道了歉，才算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你们为什么 总是不从国家 利益考虑呀？”

南池子18号，原是清朝一个太监的住宅，西侧紧挨护城河，与劳动人民文化宫隔河相望。在院内有一株特大柳树，掩映着几间普通平房，由于年久失修，呈现出一派破旧景象。一天在大柳树下纳凉时，我趁机向张

老建议：“张老，房子破旧成这个样子，也该请营房部门来维修一下了。”

“你这个意见早有人提出了，破旧一点有什么关系，比工人、农民兄弟住的条件好多啦！为什么花公家许多钱去维修呢？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嘛！”

我见修房子他不同意，便指着门窗说：“门窗有的已坏了，油漆也光了，也该让人来整修一下吧！还有那沙发，不但破旧得厉害，沙发套子也坏得不成样子，该换换吧！”

他立即拒绝说：“门窗还可以使用，沙发也可使用，窗帘、沙发套子破了，我们可以自己买布换一下，为什么你们总是不从国家利益去考虑问题呢？”

他的衣服多是缝补过的旧服装，只是在外出时才穿上比较好的衣服。他使用的一个公文包，还是抗日战争中的战利品。他每餐是两菜一汤，且多是素菜。一个新调来的警卫班战士看到后，惊奇地对我说：“首长吃的怎么这样简单呀！”

张云逸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此勤俭，对战友、对身边工作人



1937年，张云逸在延安

员却很慷慨。过年过节，总要把身边工作人员请来聚餐。有些烈士子女生活困难，一次就寄去二三百元；工作人员家属来北京，他都要请到家里吃一顿饭，临走时还要送钱、送东西。

根据当时国家有关制度规定，张云逸外出可乘“公务车”，就是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车厢里有办公桌、床铺，设备条件较好。可是他外出工作时，总是不让我们要这种“公务车”，说“就我们几个人，坐了一节车太浪费”。有一次警卫人员说：“坐公务车是国家规定的，对首长来说也比较安全。”他一听很不高兴地说：“买一个软席包厢不是很好嘛，与群众在一起有什么不安全的啊！”

“我不是来游山 玩水的啊！”

张云逸晚年，仍担任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平时的工作活动还

是十分频繁。

他时常是抱病出席会议，曾多次对我说：“有许多政策法规，政务院、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就执行，通过时又必须有足够的法定人数，我是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应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身体有点病是小事，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耽误呢？”

有次开完会回来，他发烧咳嗽，血压升得更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

张云逸不顾年老体弱，每年都要到各地检查和视察工作。广西、山东是他常去的地方；广东、安徽、上海以及北京，他也去视察过工作。

一次，张云逸到达济南。当天下午，省委统战部马保三部长陪同他到大明湖游玩，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景色未能引起他多大的情趣，在返回住地的路上，马保三说：“明天，我们去千佛山、趵突泉看看，早饭后我就来接。”

张云逸一听连连摆手：“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

他在济南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听取汇报，视察医院、食品公司以及郊区的农业合作社。每到一处都要召开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人大常委会给他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写信人是解放军某部一名连队干部，来信反映他的家乡山东文登小屯村一位村干部，因为土地改革时的一些问题，对他的父亲于同海进行打击报复，要求人大常委会调查处理。张云逸由济南来到青岛。视察工作结束后，对青岛市委书记滕景禄说：“我还要到文登县小屯村去一趟，调查了解一下一个军人家属被打击报复的问题。”

滕书记劝阻说：“现在气候很冷，您就别去了，让张秘书去调查处理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些工作要

向您汇报呢？”

张云逸勉强同意了。

我到文登县后，于县长、范副县长讲了此事的前后经过和准备处理的意见。我觉得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返回青岛向张云逸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问我：“你到小屯村去看过于同海老人吗？”

“没有。小屯村离县城还有30里左右，我看县里已准备解决了，就没到村里去。”

“这个工作没有做到家嘛！这样吧！我再去一次，看看文登县的情况，也看望一下于同海老人。”

12月下旬，我怀着负疚的心情随张云逸来到文登县小屯村。

在大雪纷飞中，他和围上来的群众一一握手寒暄后，亲切地询问于同海家中的情况，有一位青年农民抢着说：“于同海是我们村的军属，贫农家庭，可是现在生活还是很困难哩！”

“你们谁带我到于同海老人家看看去？”张云逸说后，农民发出一阵掌声，大伙一起领着张云逸来到于同海家里。

于同海得到张云逸专诚来这里了解处理他受打击报复的问题，感动得泪流满面，就要叩头致谢。张云逸连忙拦住说：“我受人民政府的委托，作为人民代表，到这里来了解与解决你的问题，是我应尽的责任，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党和人民政府吧！”

与此同时，莱阳地委的同志找了那位村干部谈话，指出他打击报复于同海老人是不能容许的，应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在经济上赔偿于同海的损失。

在村里召开的群众座谈会上，张云逸在听取群众对政府工作和地方干部的批评意见后，强调指出：“我们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好事，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而决不

能以权压人，从私利出发；对群众打击报复更是党纪国法不能允许的。”他的话引起了群众的热烈掌声。那位犯错误的干部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给予应有的处分。

傍晚，张云逸又赶到文登县向县里负责同志讲了调查了解的情况，并提出认真处理的意见。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1957年夏天，有位老李同志由安徽省来北京看望张云逸。他曾是新四军淮南地区一支游击队的队长，多次配合新四军二师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在一次攻打定远城战斗中受伤致残。

两位老人见面后十分激动，热烈畅叙过去淮南地区的战斗历程和革命情谊。晚饭后，老李要返回招待所，张云逸说：“不要回去了，就住在我这里。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能看到新中国的建立、祖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实在不容易啊！让张秘书陪你好好看看北京。”

按照张云逸意见，我陪老李到故宫、颐和园、北海、天坛等名胜地方游览了3天。

老李要回安徽，张云逸让管理员买了不少食品、日用品相赠，并给他150元钱。老李热泪盈眶地说：“首长，我这个老兵只有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了。”

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云逸来到南宁，他要到东兰去给韦拔群烈士扫墓。

清明节那天，张云逸来到韦拔群墓前，和各界代表一起献花默哀。然后他深情地讲起与韦拔群相处的情形：“那是1930年11月，红七军即将北上，韦拔群奉命回东兰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我送

他20多里，他又回送我10多里，情深难别啊！”

“当时我已预料到，在红七军北上之后，敌人会对右江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我们边走边说，互相有许多话要说呀！可是部队马上要出发了，不得不分手。谁知这竟是我们的诀别啊！”说到这里，张云逸和听的同志都流下了热泪。

“您还是学农好”

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有位先后得到省、部级6项科技成果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名叫汪定淮，他是我内弟。他本来与张云逸素不相识，可是他的成长，却与张云逸有密切关系。

那是1956年冬的一天，我在院内散步沉思，张云逸见到连忙问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的内弟汪定淮从武汉来信说，想到北京来复习考大学，可是来北京住的问题不好解决啊！”我噘着嘴说。

张云逸笑呵呵地说：“这有什么为难的，来北京就住在我这里，你不用犯愁。”

汪定淮很快来北京，和警卫班战士住在了一起。

张云逸见到汪定淮认真复习、勤奋好学，心中非常喜悦。有一天，张云逸问汪定淮：“小伙子，你准备报考什么科啊？”

“初步想考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器构造。您说我学什么好？”

张云逸却先向汪定淮问道：“你对航空工业兴趣大吗？还对什么有兴趣？”

“很难说对什么兴趣特大，学习理工科其他方面知识都可以。”

“你懂得种田吗？”

“我自幼在县城长大，不懂种田，不过我可以学。”

听了这些回答后，张云逸诚恳



张云逸（中）在韦拔群墓前

地说：“要我说，你还是学农好。我们国家工业落后，农业也落后，但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方面更需要人才，农业发展了，不但可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也可推动工业发展嘛！”

听了之后，汪定淮认真思考一下说：“张老，我听您的话，决定第一志愿就报考北京农业大学。”

在张云逸的支持鼓励下，汪定淮1957年夏天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在上大学的4年时间里，汪定淮时常到南池子来，向张云逸汇报学习及下乡情况，两人成了忘年之交。

汪定淮为张云逸找来葡萄优良品种栽在院内。张云逸见到一串串又圆又大的葡萄，脸上挂满了欣喜的笑容。

去年春节，我对汪定淮开玩笑说：“想不到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成长为国内外有了名气的专家了。”

汪定淮说：“还得感谢张老当年的指路啊！”

“真是走错了门，认错了人”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内乱中，不是处在党和政府工作第一线的张云逸，也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冲击，经受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磨难。中央监委的某些造反派组织头头，勒令他“交代”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几十个人冲进大院，又喊口号，又贴大字报。

面对造反派头头的胡言乱语，张云逸被激怒了，他义正辞严地讲了当年与邓小平共同领导百色、创建红七军，讲了和刘少奇在新四军共同指挥作战的历历往事，然后掷地有声地说：“这就是我与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的关系，也就是我与他们无法划清的界限！”

那些人溜走之后，张云逸愤慨地说：“让我趁人之危，往少奇、小平身上泼脏水，真是走错了门，认错了人！”

居住在南河沿的袁任远，被造反派抄了家，还把袁老带走了。袁

任远家人给张云逸写了一封求援信，从门缝中投了进来，张云逸看了信沉重地说：“真不像话，袁任远了解，他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抓去？简直乱套了嘛！”

他拨通了中央监委书记、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电话：“董副主席，袁任远被造反派抓去了，家人向我求援，我只好向你报告了，请你赶快向周总理说说，他现在说话还有用啊！”

在张云逸多方努力下，袁任远很快放回来了。

有一天，他问起工作人员：“王兴纲很长时间没有来，不知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说：“王副主任被打成叛徒，正在锅炉房劳动改造呢？”张云逸连连用手中的拐杖击地：“我了解王兴纲，早年在国民党商震部队做地下工作，后来在新四年任联络科长，专门做敌军工作的，为人正派坦率，工作积极负责，历史上没有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叛徒问题嘛！”

他犹有感触地继续说：“大革命时期，我也做过地下工作，在张发奎部队当过参谋处长、师参谋长，那是党组织让我干的，难道我也是叛徒吗？”

他要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去看王兴纲。工作人员劝阻说：“组织上已经宣布他有历史问题，我们就不要再去了吧！去了有些事就更讲不清楚了。”在几个工作人员劝阻下，他看望王兴纲的意愿一直未能实现。

战备疏散 难回北京了

中苏两国政府商定：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中央政治局在10月中旬开会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工作，以防患于未然。

10月16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到张云逸家中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战备的决定，并请张云逸尽快做好准备，和朱德、董必武等老同志一起疏散到广东去。

1970年8月，张云逸按照中央通知于8月初到庐山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张云逸对王良恩说：“到广东快一年了，现在中苏之间的斗争形势比去

年有所缓和，看来战争一时不可能打起来，我的胆结石病时有发作，血压也难稳定，准备回北京去检查治疗一下，你看如何？”

王良恩说：“张老，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向黄总长（黄永胜）说说，然后再报告你吧！”

过了两天，一直没有得到王良恩的回音。张云逸对秘书说：“没有回答就是回答了，那我们还是回广东去吧！”这位一生以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为天职的老共产党员，怀着不悦的心绪返回广东从化了。

1974年11月19日下午，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张老在301医院已病危”，并要我尽快到医院去。我立即由军事科学院赶到301医院，几位专家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救，我见状止不住泪水直流。

当晚6时，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与世长辞了。11月26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张云逸追悼会。病中的毛泽东送了花圈，叶剑英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责任编辑：刘文）



在张云逸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



青年刘少奇

● 黄 诤

十九世纪末叶，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的炭子冲。在刘少奇出世之前5年，毛泽东诞生于同炭子冲仅一岭之隔的另一个“冲”——韶山冲。多年后，他俩相识相知后，各自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

刘少奇是家中最小的伢子，深受族人钟爱，父母也着意要培养他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正当刘少奇在炭子冲私塾读书的期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给少年刘少奇带来了强烈的震荡。沉闷的私塾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他那躁动的心怀。从此，他像一只冲出笼子的小鸟，飞向外面的世界……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刘少奇等人登上黄浦江的一艘轮船。他的同行伙伴中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个青年。开始了一次不平凡的远行。

到莫斯科已是初夏6月。这一段行程，路上走了将近3个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礼堂里，掌声阵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主席台上，端坐着共产国际的领袖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坐在主席台上。他是这次大会的名誉主席，并向大会作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中国青年幸运地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有关部门将他们安排在会议

代表住的招待所里。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张太雷，还专门到他们住的房间看望。会议期间，刘少奇等人成了大会的编外人员，帮助做些会务工作。每逢开大会听报告，他们就领了入场券进去旁听。

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从6月22日开始，7月12日结束。大会闭幕后，刘少奇被分配到新近建立起来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就在东方大学即将开学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到了1921年的冬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终于延伸到东方大学，开始在中国班发展成员。学员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都已经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便首先由团员转为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

1922年春天，因国内斗争的需要，刘少奇奉调回国，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所谓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总工会书记处，这时共产主义书籍刚传到中国不久，给翻译出了不少难题，许多新名词不晓得翻译成什么好，于是把工会译成了劳动组合。

正好这时中共中央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便也参与一些中共二大的会务

工作。中共二大刚开完，陈独秀就找到刘少奇谈话，在介绍了有关的情况之后，他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派刘少奇去湖南工作，指定他参加湖南地区的党委。临走时，陈独秀又把中共二大刚刚通过的一些文件交给刘少奇，要他带给湖南的党组织。

中共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叫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是1922年5月成立的，书记是毛泽东。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所以毛泽东还兼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当时在湖南的共产党人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夏明翰、李六如等。

湖南省长沙市小吴门外，有一大片绿茵茵的菜园和草地。菜地的旁边，是一口面积不大但水质清爽的池塘，几株轻轻摇摆的垂柳文静地伫立塘边，显得宁静而又幽雅。这便是清水塘。在池塘的一侧，有一座普通的青砖小平房，就是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委会机关就设在这里，区委书记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

刘少奇从上海来到长沙，顾不上别的，首先找湘区委接头。

就在长沙清水塘这座小房子里，毛泽东、刘少奇会面了。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两位革命者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

合作……

会见中，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共二大的召开情况，转交了临行前陈独秀给的文件。毛泽东也介绍了湖南的形势和组织情况。

刘少奇向中共湘区委和毛泽东报到之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当时湘区委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向军阀赵恒惕政府开展合法斗争的统一战线组织，决定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刘少奇参与了发起工作。

9月初，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酝酿罢工，情势紧急。湘区委已经派郭亮在岳阳发动，这时再派刘少奇到长沙沿线组织配合。9月9日，粤汉铁路长沙段2400多工人全线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6条经济政治要求。岳阳也是紧张万分，郭亮在那里率领工人卧轨拦车。粤汉铁路顿时全线瘫痪，斗争进入高潮。

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要他立即赶往安源，指导那里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拥有矿工12000多人，铁路工人始就把它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1921年冬，毛泽东到安源考察，随即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1922年五一节，安源正式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初，安源工人为争取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和路矿当局形成对峙，一场大工潮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1922年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李立三会合。情势已经十分急迫，工人中到处弥漫着激动不安的气氛。

李立三、刘少奇召开了中共安源党组织的紧急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工

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呜——呜——呜——，安源车站爆发出响彻云霄的笛声，划破黑暗的长空，在向人们庄严宣告：安源路矿130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

工人们潮水般涌出矿井，奔出车间，冲出工棚，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斧头、岩尖，大声高呼：“罢工了！罢工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罢工进行到第三天。9月16日中午，路矿当局派人送来一封信，请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

设在矿局办公大楼内的戒严司令部，警卫森严，门口台阶两旁，架上了两挺机关枪，进门楼梯的两边，站着背盒子枪的卫兵，走廊里也站着上了刺刀的卫兵，一个营长挎着手枪来回巡逻。

穿过道道岗哨，刘少奇走到谈判室，从容地在戒严司令和矿长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戒严司令李鸿程瞪眼望着这个24岁的年轻人，想给他个下马威，便抬高嗓门蛮横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无惧色，反问道：“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我？如果今天不是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希望。”说着又理直气壮地申述了罢工的理由。

双方僵持了一阵，李鸿程气急地拍着桌子嚷：“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李鸿程又凶狠地喊。

刘少奇马上愤然回击：“就请你下令制裁去！”

这时，戒严司令部外面，黑压压地站满了闻讯赶来的数千工人。工人们高声喊叫：“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

9月17日，与路矿当局终于达成13条协议，在路局机务处正式签字生效。工人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坚持5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大罢工的胜利首先引起了一班工头的嫉恨。这帮人原先横行安源，威风十足，现在工人地位提高了，他们神气不起来了，便心生坏意，伺机捣乱。他们一方面故意不负责任，不认真签点上工人数，造成生产混乱，反过来又把问题推到工人和俱乐部头上；另一方面，他们联络一些亲信和被俱乐部屏退的工人，策划成立所谓“游乐部”以同工人俱乐部抗衡。

刘少奇获悉情况，立即组织反击斗争。他指挥工人们将几个为首破坏的工头抓起来，送到矿司法课查办，同时严加追查工头们秘密开会的阴谋活动。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俱乐部不光层层建立了组织，选出了代表，还开办了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各方面的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时光进入1923年。正当安源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大批工人被捕被杀，罢工惨遭失败。

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工人运动面临严峻考验。在大气候变坏的情况下坚持，实在不容易。刘少奇带领工人俱乐部一班人，忙里忙外，既要整顿内部，又要对付资本家、军阀势力的破坏，煞是辛苦。

幸好，这时刘少奇的个人生活遇上了喜事：1923年4月，他同聪

明伶俐的湖南姑娘何葆贞喜结良缘。

何葆贞是道县城关镇人，原在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后来来到长沙，经毛泽东、杨开慧介绍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将她分配到安源，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何葆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安源工人都很尊敬她、喜欢他。在共同的奋斗中，她和刘少奇相爱了。

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何葆贞的婚礼在工人俱乐部举行。朴实的安源工人纷纷来为他们的主任贺喜。婚礼办得简单又热闹，一改当时的种种旧风俗，不办酒席，不收礼物，不拜天地，只开了个欢快的茶话会。

1925年12月，辗转回上海组织工人运动的刘少奇刚回长沙不久，16日中午，几个便衣突然闯进长沙文化书社，二话不说将刘少奇抓走，带到长沙戒严司令部关了起来。

这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

恒惕干的事。五卅运动在湖南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学生运动，至今余波未息，赵恒惕为此伤透了脑筋。正在这个当口，他得到工运领袖刘少奇潜来长沙的密报，十分恐惧，马上下令军法处逮捕刘少奇。

第二天，长沙《大会报》报道了刘少奇被捕的消息，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立即释放刘少奇。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等借机向共产党表示好感，也发电报要赵恒惕释放刘少奇。正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说：“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胁迫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是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以逮捕，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

赵恒惕没有料到，抓了一个刘

少奇，竟使自己陷入内外受责、四面挨骂的境地。为避免惹更大的麻烦，他便借叶开鑫等头面人物出来担保的由头，顺水推舟同意释放刘少奇，并要求他5天内离开湖南。

1926年1月16日，刘少奇终于获释。处境尴尬的赵恒惕为了借梯子下楼，在刘少奇临走前派人送赠一册《四书》。赵恒惕这一举动，被当时报纸嘲讽为“最滑稽”的一件事。

刘少奇的被捕，着实把他的母亲吓得不清。老人家一辈子老实本分，突然遭此打击，几乎难以承受。后来听到获释的消息，她连忙从宁乡乡下赶到长沙，流着泪跪在刘少奇面前，要儿子不要再干这种身家性命都不顾的危险工作。刘少奇自小非常爱他的母亲，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要求断不能从命。他急忙扶起母亲，说：“别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事实不能依您。”望着慈母惊恐不安的面容。他只有再三劝慰老人家放心回去。第二天，他就急匆匆离开长沙又赴上海。

(责任编辑：仲文)



1964年，刘少奇接见当年参加安源大罢工的老工人袁品高，左为王光美

上将杨至成的五次坎坷婚恋

● 窦孝鹏

惊闻婚变

1937年初，担任军委总兵站站长的杨至成，在延安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是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的一位女红军钱家华。

1933年，不到16岁的钱家华，由于受当红军的两个哥哥的影响，在红军部队里当了宣传队员，她唱家乡的山歌和民歌，响亮得能传出很远。

后来，钱家华又担负起了看护员的工作，给打仗负伤的同志换药，端屎端尿，有时还要抬担架。红军长征时，一连过了三次草地，她都咬牙挺过来了。部队来到陕北进行工作总结时，钱家华被评上了先进分子。

一天，杨至成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部长和兵站站长，与总卫生部长贺诚及叶季壮等领导，一同来医院看望工作人员与伤病员，并接见评上先进分子的同志。

钱家华胸前戴着大红花，和被评上先进分子的同志站成一排，等着首长们接见。她已是19岁的大姑娘了，长得比一般四川女同志高出半头；长征完后，经过一个月的调养，脸色变得红润而俏丽，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杨至成握着她的手，不由多看了两眼。

这事被跟在后边的贺诚瞧见



杨至成

了，往回走的路上，贺诚拍着杨至成的肩膀：“怎么样呵杨部长，我们卫生战线人才济济呀！你是不是对那位大个子姑娘有点意思了，要不要我给你当红娘？”

在瑞金时，他俩一个是总供给部长，一个是总卫生部长，两人在一起总是逗乐子。

杨至成脸红红地说：“再了解一下人家女方的情况嘛……”

在旁边的叶季壮打趣地说：“都老大不小了，还羞羞答答干什么，痛快点嘛！”

钱家华没有想到，在暗中她已被人“私订终身”。过年不久，院领导便找她谈话，说要给她介绍一位领导同志作丈夫。

钱家华没有思想准备，心里有点慌，她去向本院的一位老大姐请教，看应该怎么办。老大姐告诉她：“这事要由你本人拿主意。”钱家华说：“其他倒没有啥，就是他的年龄有点大，已经30多岁了！”

最终她还是同意了。

于是，在1937年初春的一天，杨至成和钱家华把各自的行李搬在一起，度过了洞房花烛之夜。那时生活艰苦，想奢侈一点也没条件。

两人都是经历过长征的同志，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婚后杨至成十分珍惜自己新组成的家庭，尽管工作繁忙，只要有空，他总是陪同自己的妻子在油灯下教她认字。钱家华在家时没上过什么学，杨至成决心帮她补上这一课。

1938年2月，钱家华生下一个女孩，杨至成高兴得抱着孩子又看又亲，说：“像我！像我！”他们给女儿起名叫玉明，愿她像一块玉那样纯洁明净。

4个月后，杨至成因身体状况不好，中共中央派他去苏联疗养并学习。

杨至成安慰自己的妻子说：“我会很快回来的。虽然组织上没有定要去多长时间，但我想快则半年，慢则一年多，不会太长的。”

他没有想到，到苏联以后，苏联人民开始了紧张的卫国战争，他们一行在回国途中滞留在外蒙等地，根本无法与家人通信。在国外的两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杨至成时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着延安，怀念着国内的妻儿。

1946年，当杨至成在东北民

主联军总部见到后勤部长叶季壮时，叶告诉他：“由于你一去毫无音讯，后来又听说你从新疆回国途中被敌人杀害了……所以家华同志便带着孩子改嫁了，我们也劝过她，但终未能扭转过来……”

如五雷轰顶，杨至成感到眼前发黑。

叶季壮劝他想开一些，告诉他：“孩子的继父也是部队一位搞军工生产的老同志，对孩子是不错的。”

杨至成呆呆地坐在那里，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

……家庭又一次破裂了……4次了……

被枪声击破的家庭

杨至成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在贵州三穗县老家完成的，那时他还不满18岁，母亲为了拴住他的心，替他包办了下来，女方比他大一岁，叫陈春兰。

这桩婚姻随着杨至成的离家出走，就宣告死亡了。

杨至成的第二次婚姻，是1928年秋在井冈山上完成的。这年的1月底，杨至成随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的部队，在湖南的宜章县举行了湘南起义，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杨至成在师部当副官长。

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不久便燃遍了附近的郴州和耒阳等县，各地群众纷纷起来闹革命。几个县相继建立了工农政府，广大男女青年纷纷要求参加革命军。当时耒阳县有一批先后从衡阳市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学生伍若兰、伍道清等，也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伍若兰和伍道清既是同校同学，又是同村同宗的好友，一起在革命队伍里搞宣传工作。

不久，伍若兰和朱德师长结了婚。作为师部副官长的杨至成参与

操办了他们的婚事，同时也就认识了伍若兰的好友伍道清。

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与毛泽东会师，同时来到井冈山的还有宜章、郴州、耒阳等地起义的农军。伍道清也上了井冈山，她比伍若兰小两三岁，显得小巧玲珑，活泼泼辣。有时她们随着部队行动，一手提石灰桶，一手拿大排笔，在墙壁上刷标语，在广场演节目；有时她们跟着工作组到农村去，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分田分粮，建立基层政权，连毛泽东、朱德都夸她们是一伙厉害的湖南妹子。

杨至成在井冈山担任留守处主任时，与伍道清接触更多了，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

9月的一天，在朱德、伍若兰夫妇的关怀下，24岁的杨至成与19岁的伍道清结为夫妻，一间简陋的茅草屋成了他们的洞房，伍若兰领着宣传队的姐妹还来闹了一阵新房呢！

年底，湘赣两省的敌人开始发起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前委决定：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留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保卫根据地。

留守井冈山的还有后方医院、工厂、红军家属及伤病员等一大批同志。按前委设想：只要把敌人引开，粉碎他们的第三次“会剿”后，红四军主力会很快打回来的。

杨至成也是用这个话来安慰眼泪汪汪的妻子：“我们不会分离很久的，你没看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吗！”

谁知红四军这次下山却出师不利。第一仗在大余县遭敌袭击，杨至成就负了伤。

接下去几仗，也连连失利，以致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负伤被俘，惨遭敌人杀害，献出了她年仅23岁的生命。红军只好向西发展，越过

赣闽边界。直到1929年4月,当红四军和红五军在江西瑞金会师后,杨至成才了解到:

当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敌人即以近3万人的兵力向井冈山开始了进攻。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实际上只有七八百人,他们率领山上军民奋起反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3天3夜,1月20日,八面山、桐木岭等几大哨口相继失守,敌人截断了红军的退路。

彭德怀、滕代远集合剩下的500多人,加上能行走的轻伤员和红军家属及留守的后方人员,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敌人对俘虏的红军家属,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小井医院的130名红军伤员,被他们赶到一块稻田里,架起机枪扫射,没剩一个……

红军第二次占领井冈山后,杨至成曾托人打听伍道清的下落,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杨至成担任了军委总供给部部长,他工作繁忙,需要人照顾,于是,经人介绍,与纺织厂一位19岁的女工叫彭慧媛的结了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彭慧媛漂亮、贤惠,两人感情笃厚。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对带家属中央有严格规定:除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外,其他人不准带家属。因工作需要随军的女同志,需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当时董必武的爱人陈碧英因体重差一斤,也被刷了下来。那时,杨至成刚被“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撤职不久,成了一般干部,就更无权带家属了。于是,他只好和彭慧媛挥泪告别。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随军的女同志只有30人,而被留下的却有成百上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告别即意味着婚姻的结束,不少人从此便再未相见。杨至成和彭慧媛的婚姻也是属于这种情况。于是,他才有了在延安的再

次结婚。

再结良缘

1946年7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的杨至成,奉命陪同副总司令萧劲光去内蒙古的满洲里,接收苏军交给我们的一批战败国日军的军用品。路途远,时间长,又值炎夏季节,所以卫生部长贺诚便从医院挑了一名护士,随同萧劲光、杨至成一起出发,负责他们的保健工作。

这位女护士名叫唐慧文,19岁年纪,白皙的脸庞上长着一对明亮和善的眼睛,一身单军装罩着她适中的身材,脑后垂着一对粗粗的黑辫子。一说话就带笑,嘴里吐出的是特点很突出的东北音调。

她“首长首长长短”地关照着萧劲光、杨至成要防感冒、防中暑,要注意休息。她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可亲,手脚勤快,忙完工作就低头读书。

唐慧文的这股劲引起了杨至成的注意,就随口问她:“小唐,哪里人呀?”

“抚顺市。”

“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呀?”

“去年年底!”

“我看你的医疗技术很熟练,不像新兵嘛!”

“我当兵前就是护士了,在抚顺市一家医院工作。”

“噢,是老资格了!”

“不敢说老,我15岁初中毕业后,考入护士学校,两年后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两三年了!”

“难得!难得!”

杨至成还了解到小唐参军是贺诚夫人周越华动员来的。

完成任务回到驻地后,贺诚笑眯眯地问杨至成:“老杨,给你们派的保健护士怎么样?”

“不错,不错!这姑娘工作真棒,我看应该给她记一功!”

贺诚诡谲地一笑,说:“这么说,你看上她了!”

杨至成红着脸说:“看你这个老贺,人家姑娘那么年轻……”

贺诚说:“年轻还不好?有个外国的诗人说过,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你四十多了,不能再拖了!”

“最好……最好找个年龄相差不多的……”

“你想得好!现在哪有40岁的老姑娘等着嫁你!”贺诚一下把杨至成顶了回去,“告诉你,帮你成家不但是对你们这些老战友的关心,也是总部领导关照过的事,你应该感激才是!”

“可是……”

“小唐那里你不用管了,由周越华去做工作,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周越华是一位老红军,唐慧文对她十分尊重。当她把红线的另一头牵给唐慧文时,姑娘有点不知所措,说:“杨政委……是首长,我怕不行……”

“首长,更需要有人照顾嘛!”周越华开导她。

“再说,我年龄还小,杨政委年龄大……”

“唉,你不知道,杨政委在家庭问题上遭到过许多不幸,不能怪他呀……”周越华把杨至成过去家庭的不幸,简单地向唐慧文介绍了一遍,还没说完,唐慧文就深深被感动了,答应好好想一想。

1946年10月中旬,杨至成和唐慧文在佳木斯组成了自己的新家。结婚以后,杨至成告诉唐慧文:“我过去在延安时有个孩子,算起来也有八九岁了,现在随她母亲住在继父家,我们一直还没有相认和见面呢!”

唐慧文很理解丈夫的心情,就说:“我们把孩子接来吧,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会给她以父爱和母爱的!”

不久，杨至成便去大连接来自己的女儿杨玉明。

如今，在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纪检委工作的杨玉明已年近花甲，有了自己的第三代。她谈起父亲的对自己的慈爱，心中仍充满着激动的感情，深深地怀念着他。

又起微波

1954年8月，时任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杨至成，因身体不好，正携带妻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这时，他们已有了两儿两女。8月2日，秘书连艺君突然来报告说，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伍道清的女同志要找他。

“伍道清！”杨至成心里一震，这不是他在井冈山失散25年之久的妻子吗？她还活着！

霎时间，他血压升高。

杨至成心中的苦楚难用语言表达，他指示连秘书：找个招待所安置她住下，问问她在井冈山分别后的经历，这次来有什么要求。

伍道清在招待所住下后，要求直接见面杨至成。连秘书告诉她：“杨副参谋长的心脏病很重，不能激动，你们猛一见面怕发生问题，我是他的秘书，你有什么话，先给我说，我再转告他。”

面目憔悴、身体虚弱的伍道清，这才谈了她别后的苦情——

1929年1月，井冈山被敌人攻占后，她在随部队突围途中，负重伤被捕。当时敌人杀红了眼，不少红军伤员及家属惨遭杀害。长岗坪七岭村有个40多岁的农民，叫张飞怀，孤身无子，见她是个孕妇，便通过反动的挨户团团长想要她。因挨户团长与张飞怀有点亲戚关系，便把她许给了张飞怀为妻。她到张家几个月后，生下一子，取名冬芽。从此她便在张家一面抚养孩子，一面苦熬。她也多方打听杨至成的下

落，但终无消息。

1936年，庄稼欠收，张飞怀便把已经8岁的冬芽留下，把她赶出了门。她只好讨饭回湖南娘家。回娘家不久，被坏人告密，坐牢几个月后，经胞弟出钱保释出狱。遂于1943年经人介绍，与一个名叫黄南华的人结婚。黄家非常贫穷，再加之黄的脾气暴躁，两人合不来，她仍常住娘家。

全国解放后，她在村里做了一个时期的妇女工作，后来因身体多病，难以支撑，只好在家休息了。

今天春天，在北京工作的伍云甫回家乡探亲，碰见了她，才知道她还在人世；同时告诉她杨至成也还健在，现在在中南军区工作。

伍道清提到的伍云甫，与她是同村同宗，1928年与她一同参加过湘南暴动，曾在红军中搞无线电通信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全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他是九十年代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的父亲。

伍道清谈了她来此的目的：一，倾诉别后25年苦衷；二，商量寻找他们的儿子冬芽的事；三，请杨至成证明她参加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四，解决一下个人生活方面的困难；五，想与杨至成见面，以解思念之情。

第三天，杨至成和伍道清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夫人唐慧文及医生的陪护下见了面。这对在井冈山艰苦时期在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天的夫妻，这对经过了生离死别如今已成陌路之人的革命伴侣，相见之下，只有失声痛哭。此情此景，真可谓欲说无语，滴滴泪珠藏隐痛，谁看了都感到伤心。

医生看到杨至成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怕他发生危险，急忙把他搀走了。

杨至成看到伍道清身体不好，生活困难，叫秘书买了些药品和衣物送给了她。对此，伍道清都写了收条，40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当年杨至成的秘书保存的一个笔记本中发现伍道清写的两张收条时，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伍道清的收条是用钢笔在一张小纸上竖写而成的，字迹非常娟秀。其中一张收条原文如下：

今收到

胶鞋一双，币叁万玖千叁百元

学生蓝布，一丈二尺，币伍万叁千玖百元

男卡机布，一丈三尺八寸，币捌万玖千捌百元

白卡机布，一丈二尺八寸，币伍万伍千捌百元

袜子一双，币伍千玖百元。合计人民币贰拾肆万柒千捌百元

1954年8月4日伍道清条

名字下面盖着她篆字体的红印章。另外在条子上凡有数目字的地方（如尺寸数、钱数）也都盖上了她的名章，足见她是很认真的。

需要说明的是，条子上的钱数是旧币，即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一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一角钱，一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

伍道清走后，杨至成成为寻找他们的儿子冬芽，写信给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方志纯（他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委托他派人到遂川县等地代为寻访，但二十几年了，沧桑变化，加上这里曾经敌人多次清剿，当年的张飞怀已不知去向，孩子始终没有下落。

以后，杨至成又让秘书督促有关部门，使这些问题逐步得以落实。

1955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历任军科院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国防委员等职。1967年病故。

（责任编辑：刘家驹）

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

● 刘明钢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

关于西路军的惨败,中共党史上有许多说法: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注释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命令擅自过河,致使两万红军失败。许多党史专著也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退却主义与取消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但又说:“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的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他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西路军最高军政首脑陈昌浩身上。

随着对西路军研究的深入,现在越来越清楚,西路军败于马家封建军阀,其原因固然不止一条,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任务变幻不定,导致部队在河西走廊滞留过长,因而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西路军转一个圈,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但已耗去了半个月的宝贵时间

1936年10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机关从甘肃靖远县西渡黄河时,并未称西路军,其任务也不是西进河西走廊,而是北取定远营,配合河东红军攻取宁夏。但因河东红军未能遏制胡宗南部的尾追攻击,致使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现。因此,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1月3日提出一个新的战略设想。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河西部队西进,

占领永登、古浪一线;黄河渡口地区可留少量兵力扼守,便于机动。”

陈昌浩、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调整部署,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为了实施新的战略任务,中央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便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国际路线为任务,并责令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

11月9日,两万余名万里征战尚未得到休整的英雄健儿,包括上千的伤病员、1400多名女战士,毫不犹豫地走向那块陌生而又充满危机的土地。咆哮的黄河渐渐地远离了,部队在空旷的原野上急进,惊沙扑面,呵气成冰,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沿途不时同追堵的马家军发生激战,环境尽管严酷,斗志却很昂扬。

西路军西进之初,党中央曾于11月11日电问:单独西进,消灭二马,接通新疆,是否有把握,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

西进与东返,事关西路军战略进退,陈昌浩拿不定主意,遂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谨言慎行的徐向前,经过深思熟虑力主西进新疆。军政委员们赞成总指挥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难易自明。于是,陈昌浩拍了板,决心西进,并向中央军委表态:“我们有把握消灭二马。”

但出师不利,在古浪,红九军遭受重创,使整个战局笼罩上阴云。西路军本靠三十军和九军两支主力支撑,九军摧折,西路军犹如壮士断臂,挥洒不能自如,进退受人掣肘。

11月19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战略决定。永昌、凉州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戈壁大沙漠,南靠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在这

段一百多公里的“狭巷”里，最宽处不过40公里。稀若晨星的村落，回汉杂处，又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红军初来乍到，短时间很难打破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的隔阂，马家军又穷追不舍，红军日夜鏖战，哪儿有时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陈昌浩却满有把握，下决心要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则对中央军委停止西进意图百思不得其解。两位主将为此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最后，徐向前建议，“用我的名义，将军队的实情报告中央，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方针。”电文如下：“敌情：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能继续与我拼战。乙、敌战术以骑兵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垒，我方败即无生还。丙、这带区域狭小不便迂回抄袭。我情：我军每守一堡垒须一营以上兵力，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11月25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接电令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立即调整部署，号召全军指战员战胜一切困难，为执行中央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奋斗。从11月22日至12月上旬，西路军仅半个多月时间，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匪以沉重打击。西路军将士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连敌酋马步芳都不得不感叹：“红军是铁军。”但由于没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西路军始终没能摆脱被动状态。正如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所说的那样：“这样打仗，真受不了，马家匪军像条狼，你走十里，他就跟十里；你一停下，他就围着你打，你出击，他就溜了，他抓住我们

就咬下一块肉；我们打他就像割韭菜，割了又长。”

正当西路军同马匪血战不已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马匪军也因事变暂时停止了进攻，这段时间很短，最多只有六七天。如果抓住这个机会，乘虚西进，西路军有可能打出一条血路到新疆。但中央军委考虑的首先是西安事变后黄河以东军事变化的大局，因而电示西路军“在现地区加紧休息”，使西路军又一次丧失摆脱厄运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局势处

在瞬息万变的动荡之中。12月24日，中央军委电致徐、陈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利……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西路军呢，此时如东移，要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千里跋涉，而且还须带着2000余名伤病员行军、作战，因此，从军事角度上考虑，是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陈昌浩从大局着眼，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的部署和命令，徐向前也积极派人侦察敌情准备行动。不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各派力量的努力，西安事变于12月25日获得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依据形势的变化，再次电令西路军仍然执行西进任务。

这样，西路军的任务几经改变，划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耗去了半个多月的宝贵时



陈昌浩

间。

对于西路军任务的不断变化，徐向前是很有意见的。在与陈昌浩第一次争执中，他就明确表示，“如果一鼓作气朝西打，只怕早已过了玉门关了。现在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不东不西，不进不退，等着挨打。”但陈昌浩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在长征途中，他是“国焘路线”的支持者，违背中央北上的决议，率部南下，导致红四方面军的巨大损失。他因此得出的教训是，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

已杀出重围，
因东进有违中央意
图，陈昌浩又提出
返回倪家营子

此次西进初期，尚顺利，先后

攻占临泽、高台。这一带粮食较多，西路军打算在那儿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如果稍稍休整一下即迅速西进，当不会有大的损失。然而，这时黄河以东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到南京便扣留了张学良，调重兵逼迫西安，内战危在眉睫。

1937年1月5日、7日、8日、9日，中央军委接连发电报命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此时西路军只剩下1.5万人左右，长期征战，弹药粮食匮乏，要对付弹药、粮食、兵源均供给充足的马匪军显然力不从心，创造根据地就更不可能了。陈昌浩、徐向前身处此境，深感危险，电请中央调原属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来援，未被军委采纳，反倒招致张国焘不切实际的批评。他在1月8日发给西路军的电报中说：“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张国焘既然话已说到这种程度，此时此刻，西路军的领导者们只能坚决执行命令。

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要建立根据地，这是马匪决不能容忍的，于是从1月12日起，马军先集中兵力费时8天攻陷高台。红五军3千名指战员孤军奋战，终因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1月24日，马匪又攻陷临泽，迫使西路军余部集结在临泽城东南的倪家营子地区。敌人集中36个步骑兵旅及大量的反动民团，共7.3万多人，把倪家营子团团围住。连伤病员在内只有近万名红军战士在内线日复一日地战斗着。

在这段时间，中央军委根据局

势，出于战略考虑，指示西路军东返，1月25日军委电示徐向前、陈昌浩：“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但河西走廊的军事格局，对西路军东返非常不利。马步芳、马步青发现西路军收缩兵力，意向东进，便火速集结兵力，倾巢进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大血战。

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匪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计划。陈昌浩立即找来徐向前等人就中央来电进行磋商，再次提出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否则难于完成西进任务，并提出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中央书记处复示指出，主力红军不能派兵增援，也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尖锐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接到这个电报，陈昌浩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在讨论西路军行动方针的军政委员会上，徐向前分析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提出中央不能派兵来援，只能自救东返的主张。徐的主张符合当时的西路军实际，获得军政委员们的支持，但因为与中央指示相左，陈昌浩心事重重，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下决心向东突围。

2月21日，山穷水尽的西路军终于突出重围，经过3天急行军到达甘肃西南的西洞堡一带。马步芳骑兵旅和宪兵团尾追不舍，被三十军杀了一个“回马枪”，溃骑兵旅，

全歼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及一批军用物资。这一胜仗使部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如果利用这一胜利造成的有利条件，继续东进，西路军也许不会全军覆没。

部队东向，有违中央命令，对此陈昌浩心存顾虑。他见三十军打了个胜仗很受鼓舞，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压住火问道：“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死路吗？”陈昌浩自有苦衷，听不进徐的意见。但无可否认，他在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让全军西返的决定，终于招致全军覆没的惨剧，陈昌浩确是难辞其咎的。他在军政委员会上，大唱其“形势大好”，“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的高调，他的意见居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关于这件事，程世才回忆说：

“各连战士们怀着胜利的愉快心情匆忙地编织着草鞋，每人要打一两双准备继续东进，到陕北去和中央红军老大哥会合。但却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我纳闷，……原来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扩大会议争论呢。”

“这次会议原先也让我参加的。我去迟了，一进总部驻的院子，就听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敌人主力，准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我们要……’

“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泼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军政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的第二天，马匪的围攻就开始了。又是一场遮天蔽日的血战……3月12日，军政委员会向

中央军委发出西路军危急的电报。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至此归于失败。

3月14日，军政委员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参加会议的师团干部只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大败仗，大家的心情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徐向前表示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死在一块，要活活在一起！”

听了总指挥沉重而饱含深情的话语，大家都心酸地低下了头。但为了全军的再起着想，大家还是恳切地劝徐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去。陈昌浩最后一次拍了板：“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再次恳切地提出留下来，陈昌浩很激动，西路军失败的重荷压着他，另一个思路困扰着他：“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也是有看法的。但徐一向沉默寡言。长期以来，谈起这件事不是沉默、回避，就是说按中央的说法吧。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选集》 第二版关于西路军

失败的注释作了重大的修改

1962年5月，是武汉地区最美好的季节，在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安排下，陈昌浩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重新聚会。在座谈会上，陈昌浩站在讲台上，抱拳到额，并弯腰向小礼堂的每一个角落拱手注目：“同志们，我陈昌浩在这儿向你们敬礼，首先向你们作检讨，在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工作中，我犯了不少错误，这是由于自己常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弄得自己飘飘然而犯了许多错误，使党的工作受了损失。由于我的错误，也让你们受苦了。由于我在路线上的错误，给许多同志添了许多麻烦，我对不起死者，也对不起大家。”说着，声音啞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然后他又强忍悲哀，打起精神说：“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才让我们再次相见，让我们在下半辈子为人民做更多的好事吧！我一定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一些老将军们感动了，许多人曾经身临绝境，苦战河西，他们难过得哭了：总政委把过错全包揽了，可你也吃了大亏呀！你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度过了那难忘的150天吗？

汉阳县委请他作报告，他无法拒绝，这毕竟是他阔别35年的家乡，梦牵魂绕的故土。在县委大礼堂，面对全县区委以上的干部，他讲了“红军飞兵战黄安”、“苏家埠活捉厉式鼎”、“红军漫川关遇险”、“过秦岭横扫双枪兵”。他没有讲长征途中的路线斗争，没有讲河西走廊，最后他诚挚地向听众说：“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早已没有我陈昌浩了。”

陈昌浩曾经是最大一支红军的政委，建国后，他的部下任部长级干部，成为将军的能开出长长的一个名单，而他仅是中共中央编

译局的副局长。对此，他曾对友人讲过一番肺腑之言。“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到中央编译局，这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回顾西路军全军覆没的历史，陈昌浩有一种“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他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那些流散在茫茫戈壁、祁连山下的男女战士，犹如万箭穿心。”

陈昌浩，这位从汉阳踏上革命征途的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虽然经历过鄂豫皖反“围剿”，经历过喋血大漠，经历过延安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声讨，经历过客居异国的孤独和寂寞，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但他却没有抗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他死于1967年7月30日，终年61岁。

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陈昌浩的老战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中共中央的悼词说：“陈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选》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注释作了较大的修改。注释写道：“（1936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责任编辑 仲文）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

● 靳树鹏

新世界游艺场 惊人的一幕

1919年5月4日,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把个北京卷得天翻地覆。紧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100多个大小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等人惶惶然不可终日,不得不把被捕的1000多名学生全部释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免职,风潮才稍有所安定,这时,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可以喘口气了。可他这

口气还没喘匀一天,就接到报呈的两张同样的传单,名曰:《北京市民宣言》,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是英文。现将中文部分照录如下: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

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吴炳湘看完《北京市民宣言》后怒气冲冲地说:“这简直是妖言惑众!”他即下令各警署,严拿散发宣言者,并查出此等传单在何处印刷及主谋之人。

在北京前门外珠市口西有个著名的游艺场叫新世界,1919年6月11日下午,有5位不寻常的客人来到游艺场附近的四川菜馆浣花春。为首者40左右,中等身材,白帽西装,笔笔挺挺。他就是陈独秀。同来的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都是北大教授,还有一位



1918年,陈独秀(前排右2)、蔡元培(前排中)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典礼

一石激起千层浪

6月13日,即陈独秀被捕第三天,《晨报》、《北京日报》等首都各报披露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社会各界、各团体、各知名人士立即纷纷群起营救,南北函电交驰,各报刊鼓动评说。

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校友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安徽同乡会、安徽协会,还有以北大教授刘师培领衔的39名各大学教授教师(其中著名的有马裕藻、马叙伦、沈士远、程演生、王星拱等)和以民国大学校长应以善领衔的各大学29名教授教师(其中有马寅初),此外尚有安徽省省长吕调元、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田桐、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岑春煊,社会知名人士章太炎、章士钊等等,纷纷上书致电总统、代总理、警察总监、警备司令部、教育部或通电全国,吁请保释和营救陈独秀。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保释陈独秀的信函中有“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等语,对警察厅施加压力。营救陈独秀的人中,虽然主要是新派人物,然而也有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派人物,如田桐、刘师培、章士钊以及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姚永概等,其中以章士钊致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的信最为辛辣有趣。他写道:“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

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罢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且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又焉忍遽而残之!”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异常关注,他在上海见到参加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许世英时气愤地说:“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各报刊也积极参与。《民国日报》说:“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时报》说:“陈独秀,一文学新思想之人也,岂政府藉以为泄愤耶?”《申报》说:“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陈为提倡新思想之首领,旧派衍之已久,今兹被捕,尤可注意,毋怪社会惶然……”《民国日报》还以《陈独秀惨受拷掠》为题报道说:“陈君被捕后,小徐及曹、章、陆受全国学生之气,愤无可泄,集怨于陈一身,几欲置之死地后快。”在陈独秀被拘禁之际,毛泽东和李达也各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李达在文章中称陈独秀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

邓初是陈独秀的同乡,留日同学,是北京政府内务部金事。他们的衣兜里都揣着两天前陈独秀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吃罢了饭,王星拱、程演生去了城南游艺园,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就进了新世界游艺场。

陈独秀等3人在新世界楼上楼下走了好几趟,戏场、书场、台球场上人头攒动,电灯太亮,无法散发传单。直等到晚上9点钟左右,陈独秀和高一涵才走上了屋顶花园,拿出传单向看电影的人群撒去。这时从阴暗角落走出一人对陈独秀说:“给我一张看看。”陈独秀顺手就给了他一张。此人一看传单当即大喊:“就是这个!”突然从各个角落冒出八九个人来,一齐上前将陈独秀扭住。高一涵乘机跑进戏院,脱去长衫,丢掉草帽,混在看戏的人群中。他突然看到邓初还在对面的台球场上的一张一张地往茶桌上放传单,就赶紧走过去。

“独秀已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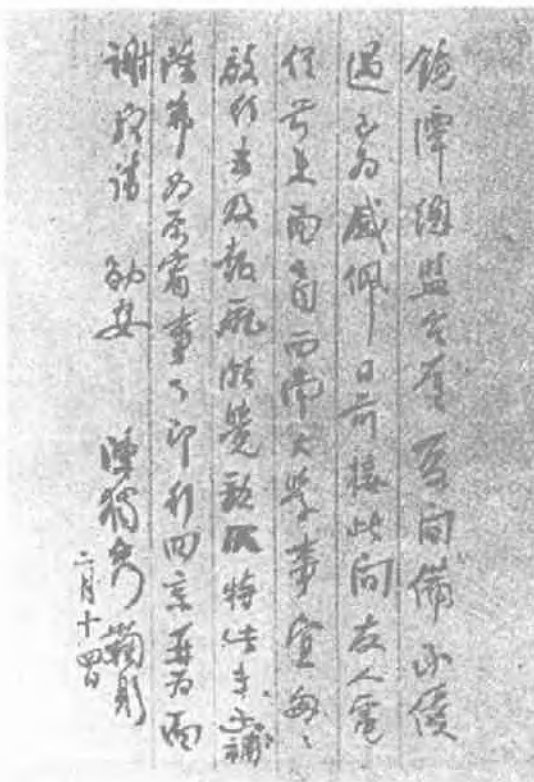
“你别开玩笑!”

他们正说话间,楼梯处,军警、密探十多人正押着陈独秀从楼上下来。陈独秀故意大喊大叫:“我叫陈独秀,你们简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在新世界大门口,警察厅的人和警备司令部的人争执起来,都坚持要把陈独秀押走。新世界游艺场属外右五区警察署管辖,署长高尔禄今天接到有人要在新世界抛掷炸弹的报告,特加派了几十名警察在新世界监视。因警察方面人多势众,陈独秀才被押解到外右五区警察署。两年多后,陈独秀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大家曾问起他这次被捕情况。他说:“幸亏被警察抓去,如果被警备司令部的人抓去,非杀了我不可,宣言中不是提出驱逐段芝贵出京吗?”他说完哈哈大笑。



陈独秀被捕的新世界游艺场



陈独秀给警察总监的便条

没有学位的陈独秀 入长北大文科

陈独秀没有教授、博士头衔，他怎么能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共有中国文学、哲学、史学、英语、德语、法语、俄语7个系）院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呢？

袁世凯一命呜呼后，蔡元培从法国归来，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他就去前门外一家旅馆拜访来京办事的陈独秀。

蔡元培长陈独秀11岁，这一年48岁。从他第一次到旅馆拜访陈独秀之后，几乎每天都来，有时来得很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不让茶房叫醒陈独秀，找个凳子，就坐在房门口等候，真有点三顾茅庐的味道。蔡元培就是来敦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以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为由加以婉谢，蔡答说《新青年》杂志可一同

迁来北大，陈独秀才答应下来。虽然有汤尔和、沈尹默等人举荐，但陈独秀能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关键是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早在12年前（即1904年秋），陈独秀即与蔡元培相识。那时陈独秀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得章士钊函邀去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常与蔡元培一起研究炸药和聚谈。该暗杀团的宗旨是从暗杀入手，谋刺清廷首要，以袁世凯为最大目标。蔡元培对陈独秀12年前办《安

徽俗话报》时艰苦卓绝的精神至为赞赏，对今天办《新青年》杂志大刀阔斧向封建主义宣战的勇气更为叹服。他1917年1月4日正式到北京大学视事，1月13日就发布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任命。教师中的守旧派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元培马上站出来反驳道：“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能说没有真才实学。”蔡元培确实认为陈独秀是国内学者中最出类拔萃的。当时北大教师梁漱溟后来说：“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当时北大学生罗章龙说：“在引进新式人物上，蔡先生是很有胆识的。其中最著名者为引进陈独秀。”

《新青年》随陈独秀迁来北京后，阵容扩大，除陈独秀主要负责外，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

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轮流编辑。陈独秀冲锋陷阵，一班好朋友鼓吹呐喊，推波助澜。《每周评论》上，陈独秀还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的文章，对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大加讨伐。陈独秀说：“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他进而提出一个口号：“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当然成了安福系和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北京政府众生相

1919年6月11日晚上十点多钟，陈独秀被押到外右五区警察署。京师警察厅和步兵统领衙门当即派出军警几十人去箭杆胡同9号，查封陈独秀的家，同时开始审讯陈独秀。

陈独秀亲自起草又亲自去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当时各种宣言、传单、通电、告全国同胞书等等不计其数，但这是五四运动中最激烈最坚决的宣言，贯穿着陈独秀提出的“强力拥护真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在当时难能可贵的是指导了整个运动的胜利发展。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的震慑下，在各地商团、商会的恳求下，在山东请愿团不屈不挠、如诉如泣的抗争下，在带着卧具的学生们的强逼下，大总统徐世昌才不得不下令免去曹、章、陆的官职，不得不电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争得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北京市民宣言》不过是一张小小的传单，但北京政府的要员们却深知它的分量。这个政府从1912年成立至1928年垮台，16年间更换了32届总理，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短的一届代理总理只有3天。五四前后正是皖系军阀得势

的时期，他们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为所欲为。但此时，段祺瑞尽管气歪了鼻子（段绰号歪鼻子）也无可奈何。国务总理钱能训对北京大学恨得要死，坚决要罢免校长蔡元培，也终于挂冠而去。警备司令段芝贵曾恶狠狠地说：“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能一日容此学风！”他终究也没能把学生们怎么样。安福系的头目徐树铮12岁中秀才，被视为神童，他是段祺瑞的灵魂，号称“小扇子军师”。五四时有传言说，徐树铮要在景山上架起大炮轰击北大。徐树铮自己也扬言，要以对付陆建章的办法对付新派人物。然而徐树铮尽管谋杀了直系军阀元老陆建章，却未敢谋杀一个新派知名人物。大总统徐世昌在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阖，他在五四运动中却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陈独秀在箭杆胡同消失

五四运动渐进高潮，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相继辞职离京，滞留北京的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他在上海的朋友函电促其南下，告诫他多留北京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但陈独秀仍然每天执笔撰文，奔走呼号，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悲愤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他果然被逮捕，但并没有处死，1919年9月16日，即拘禁3个多月后被保释，对他实施惩戒法。陈独秀所以未被处死，固然与南方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请释陈独秀的通电有关，因北京政府正与南方谋

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伟大的民气鼓舞起来的群众抗议请愿的巨浪，使北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陈独秀所住的箭杆胡同属中一区警察署管辖，该警署每月都要把监视陈独秀的情况向吴炳湘报告。如1919年9月份的“月记表”中说陈独秀“行为安详，闭门读书”，1920年1月份的“月记表”说“出外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其实陈独秀已于1月下旬秘密离京，并于29日到达上海，2月4日乘船又到汉口，2月5日、6日、7日在武汉三镇均发表演说，《国民新报》和《汉口新闻报》已将陈独秀的演说登载出来。北京当局惊讶不已。吴炳湘（字镜潭）下令处分了监视陈独秀的署员，并接到陈独秀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镜潭总监台鉴：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顿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

陈独秀鞠躬

二月十四日

陈独秀秘密离京，令吴炳湘大为恼怒，他命令中一区警察署在陈

家门前加派警员，待陈独秀归来时即行捕获。

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得知天不怕地不怕的陈独秀又要回北京，非常着急，俟陈独秀在永定门一下火车，没容分说拉上他就往王星拱家跑去。陈独秀在洋车上莫名其妙地问：“干什么？要绑架？”“别出声！”

到了王星拱家，他们才说了陈独秀走后发生的变化。陈独秀从青年时代起，就不相信任何圣言经典，保持着独立卓特的人格和追求，他当然不愿在北京再被监禁。当时就在王星拱家准备一切。雇来一辆骡车，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装作出外讨债的模样。沿途一切交涉由胆大心细的李大钊出面，终于护送陈独秀顺利到达天津，旋即由天津赴上海。

末尾赘语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是一个大事件，但在通行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中多略而不叙，笔者不敢补史书之一章一节，谨草撰此文，聊付阙如。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19年，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逮捕陈独秀后呈报的一份《送案卷》

《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原型是谁？

● 刘秉荣



甄凤山

王平将军多次提到曾在晋察冀三分区与他一起战斗的抗日英雄甄凤山，即为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

甄凤山，1908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城南东朱谷村，凤山13岁时，其父租种了鹿钟麟6亩荒地，不料，是年收成不好，鹿家的管家张伙子依然逼租，其母上树捋树叶时，张令人摇晃树，将其母从树上晃下摔成重伤，数日后身亡。甄凤山只将恨铭记于心，带着弟妹要饭，不久，五弟六弟亦相继饿死。

甄凤山22岁那年闯关东，先是“扛大个儿”、挖参、淘金、当泥瓦匠，后经人介绍，在一家姓马的公馆内学开汽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义勇军四起，甄凤山欲入齐齐哈尔市郊孙家屯王老宏拉杆子的义勇军队伍，王不许。甄想，王老宏必是见自己空手而来，看不起，遂借枪一支，再回王处，王依

然不收，甄疑王嫌枪少，次日，他在齐市一胡同内，将两个日本兵击毙，夺枪两支来见王。王不仅收下甄，且对甄加以赞许。甄加入义勇军后，又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了一支队伍，活跃在哈市周围，后日寇扫荡，义勇军被打散，甄凤山辗转回到家乡。

时定县已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在县城职业学校的教员孙志远即为定县县委书记。与甄凤山同村的甄玉蕃是共产党员。甄凤山在孙志远和甄玉蕃帮助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为1932年6月。就在这年，

甄凤山与王均结了婚。

甄凤山入党后，即以做小买卖为掩护，为党组织传送情报，散发传单，张贴标语。

甄的活动，引起敌人注意。1933年8月24日夜里，军警包围了甄家，甄凤山藏于水缸中躲过，然其父惨遭毒打，天明死去。时党组织通知甄，要其外出隐蔽，免遭敌之毒手。甄凤山遂远离家乡，到了绥远归化一带，一面靠卖针线为业，一面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定县城于1937年9月22日为日军所占。甄凤山回到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计有20余人。他们又挖出二十九军撤退时埋下的30几条枪，甄凤山为大队长。因其长得高大，人们都亲切地呼他为“大老甄”。从此时起，大老甄的名字开始响遍了冀中。

他们在磨屯村打了第一仗。打死鬼子十余名，伤十几名，得大枪

10 余支。

1937 年 9 月，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营等两千余人，在五台地区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下辖一、二、三、四军分区。定县的一部分划为三分区，分区司令员是陈漫远，政委王平。

甄凤山向聂司令员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聂司令员给予了充分的表扬和肯定，并发给“8”字臂章。

游击队被编为第一游击支队第五大队，甄凤山为大队长，钱凤洲为政委。

为壮大队伍，甄凤山身先士卒从敌人手中夺枪，他化装骑车到了定县城门口，见只有一个鬼子站岗，便故意蹲下修车，乘其不备，趁势夺枪后飞车而去。

数天后，甄凤山令三弟甄凤高化装成为鬼子送棉花的百姓，赶着棉花车来到定县城下，时城门未开，有游击队员假装于后面鸣枪追赶。甄凤高和几名化装百姓的战士于城下喊门，谓有八路军抢棉花车。当两名伪军开城门时，战士们一拥上前，夺了枪支，又趁机冲上城门楼，将日伪军十几支枪下了。鬼子悬赏 3 万元买“大老甄”的头。伪县长高现然还让西放村的徐东志和东朱谷村的甄伊意做说和人，向甄凤山劝降，用高官厚禄引诱甄凤山，为甄所拒。敌人见劝降不成，又派一貌美之女子打入游击队，企图以美色诱甄凤山，再为甄识破。

党组织为提高甄凤山的政策水平，1938 年 1 月，调其到三分区军政干校学习，校长是孙毅。

就在甄凤山在干校学习期间，甄凤山的妻子王均被定县的警备队队长韩希梦带人捕走。敌人还同时捕去其 5 岁的女儿大乔和 3 岁女儿小乔。

敌人对王均动用了数种酷刑：吊臂反悬、子弹划肋、板钉毒打、高台平摔、灌水踏腹、硬棍捶背、钢

针刺指、跪铁莲、压杠子等，然王均没有任何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其囚于木笼中。

时党组织和王均父亲闻王均被捕，即花钱运动打点。半年后，敌人放了女儿大乔。后又制造了个假相，枪杀了一些流氓犯罪分子，假意上报说处死了甄凤山妻子等抗日犯。而后将王均更名，和女儿二乔依然关在狱中。

1938 年 11 月，甄凤山奉命返回第五大队，仍任大队长。为震慑定县城中之敌，甄凤山化装成“太君”，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十几名化装的战士大摇大摆进了城，守门的日伪军还给他行了礼。行至南街，甄凤山下马在茶馆里喝了阵茶，又威风地穿过南街至东大街，通过伪县政府门口时，站岗的鬼子也向其敬礼。当其一行出了东关，鬼子才发觉甄凤山进了城。

之后，甄凤山带游击队连连出击，直把个定县城闹了个天翻地覆，搞得敌人胆战心惊。这里，笔者抄录甄凤山生前口述的几段笔录。

“某日（1938 年的某日，下同）我带领战士 10 余名，化装后挑着菜挑子，假装进城卖菜，天晓时到城南门，趁敌人不备，将他们打倒，夺回步枪 4 支。”

“某日我带 20 余人，赶着车假装送棉花，天不明就叫开东门，走到敌人小房处持枪往里冲，将日本人和警备队二十余人全部解决，得枪十六七支。”

“某日，听到鬼子已到西纹村，我就带着甄凤明、甄合顺、王福尔等，背着筐假装去割草，走到西纹村附近，见到有鬼子放哨，我一枪打死一个鬼子，其余鬼子仓皇而逃，这一仗，得枪 3 支。”

“1938 年 12 月 30 日夜，我到定县城内将伪警察局长康翔远的老婆李秀玲和陈香故（伪县府人员）的侄女和敌伪人员拉出东门，并将东门烧毁。”

“某日，我敌工情报员张中怀发现有日本鬼子 5 人，是看巡铁路的，正在高岗上休息，5 支枪架在一起。张急报我，我马上带 8 名战士，化装成到田里干活的，趁机夺了枪。”

“奉上级李济环（定唐支队队长）命令，要我们在定县城敌人心脏建立一个营直属单位，秘密工作。我将城内回民街的白计明、马庆云，东大街的杜连科，马道街的支落虎，刀枪胡同刘锁子等调到队里相商，叫他们在城内秘密建立武装组织，我委马庆云为营长，刘锁子为书记。经过一段工作，秘密组织了 70 余人。后为鬼子发觉，有的被捕，大部分零散出城参了军。”

时《抗敌三日刊》载文道：

“5 月 10 日，日军下乡大扫荡，计 50 名，汽车 4 辆，走到赵村，因为南沙河套松沙一尺多深，汽车不能前进。甄凤山听到此情况，即率队由东、南两面包围了日本汽车。双方激战 3 个小时，将鬼子汽车烧毁，鬼子尽数消灭。此战使日军大怒，集中定县、新乐、深泽、无极、晋县、安国数县日伪军万余名妄想将甄凤山部一网打尽。甄得到消息后，避敌锋芒。鬼子在河南边连续扫荡 7 天，未见八路军一名，只好收兵各回各县去了。”

1939 年的 7 月，甄凤山在掌握定县城敌伪活动规律后，他率 3 个侦察班爬城墙而进，里应外合，活捉了汉奸特务 34 名，鬼子发觉后派兵追赶，甄凤山早已埋伏好人马在叮咛店，又打了鬼子伏击。

韩希梦原在甄凤山大队，后携枪投敌，鬼子重用他为定县警备队队长。韩依靠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杀害抗日人员，百姓恨之入骨。王均即为其所捕，冀中军区要甄凤山除掉他。甄凤山几次设计。均因韩狡猾而未成。甄决定以反奸计借刀杀之。遂授计有敌工关系的阎金生，收买了龟尾的翻译官白云

山，阎把一封离间信交与白。白将信交于龟尾，龟尾大怒，下令杀死韩。后方知中甄之计，后悔不迭。

甄凤山不仅在定县经常神出鬼没地进入敌人严密封锁的据点，他还到保定、望都、唐县、曲阳、新乐等县城去除奸捉特。鬼子、汉奸们听到“大老甄”无不胆寒。

1939年上半年，聂荣臻司令员指示甄凤山：放回抓获的伪警察局长康翔远之妻，换回了些抗属，其中包括王均在内。王均送回后，身体极弱，被送往山区休养。王均自此更名王军，后在三分区做党务工作。

1939年秋末，在晋察冀军民于黄土岭击毙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后，激怒的日军集中2万兵力向晋察冀我军发动进攻，三分区为其扫荡重点。是年12月，甄凤山奉三分区参谋长唐子安的命令，带队阻击定县援高阳之敌。时朔风骤起，阴云四布，甄凤山见天要降雪，认为是埋雷的大好时机，遂带全体战士和各村民兵，在敌必经之路上埋下连环雷等各式地雷。这一仗，不仅阻止了敌之援军，还炸死炸伤许多鬼子和伪军。

为打掉鬼子气焰，甄凤山又带78名战士，组成自行车队，偷袭了保定南关的电灯公司。

敌人抓不住甄凤山，便收买了甄部身边的25岁杜长春，令其趁机下毒，毒死甄。因事偶然，甄未及时食用杜盛好的饭，结果将狗毒死。后杜又下毒而为甄所识破，将杜处以极刑。

百团大战开始前，甄凤山又接到上级命令，消灭土匪头子韩自由。韩原为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卢沟桥事变后当了土匪，依靠日寇，为虎作伥，多次假装“八路”，残害百姓。我军派人送信要他改恶从善，韩竟将送信人杀害。因此，军区首长限甄在百团大战开始前将这股匪徒消灭。甄凤山便亲自出

马，在大苇村将韩匪击毙。

定县之敌伪在甄凤山和他的队员打击下，只能龟缩在城中，政令不能出城门。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

定县的一个汉奸县长曾对汉奸公安局长这样讲：“我只不过是一个城长！”

公安局长更是感慨对之，他说：“我还只是一个门长啊！”

1943年，甄凤山领导的五大队改编为铁道支队，仍由甄任队长。其任务是破坏铁路、炸火车、炸桥梁、割电线，破坏敌之交通线。把敌人“挤”出去，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甄凤山用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术，打得守铁路鬼子胆裂魂飞。甄凤山还以围、逼、攻、袭种种手段，拔除了行唐、曲阳、完县西边山区的30个敌伪碉堡。

1944年12月24日，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群英大会，甄凤山被推举为抗日英雄。

1947年1月20日，保南战役拉开序幕，甄凤山奉命率领6团，与友军一起攻打定县城。1月28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定县城解放。甄凤山被任命为城防司令，旋被任命三分区司令员。

甄凤山于多年征战，操劳过度，终于1948年病倒，只得于家中休养。

1954年，甄凤山被任命骑兵旅副旅长，然因病未到职。组织上决定让他在定县城中病休，甄凤山坚持要回老家。回乡后，他不顾多病，投身于农业生产。他每月到县上领工资后，一路走回家，便所剩无几，缘由是他惦记着那些当年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家属，惦记着五保老人，沿途每路过村庄，他把钱留给了他们。

当时，他在定县挂了个副县长的职务，但他仍保持每天早晨背着粪筐捡粪。他见村西有一块荒地没人耕种，便主动开荒，经过他辛勤

的劳动，荒地上栽了果树，后来成了果园。农村合作化后，他成了一个标准的社员。他除了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外，还和生产队的干部、老农一起研究农业技术。经他手种的白菜一棵达30多斤，能站立一个人。1958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劳动英雄。

建国初，作家邢野、羽山到定县深入生活，决定以甄凤山为原型，撰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我军民共同斗敌的电影文学剧本。邢野、羽山与甄凤山是老战友。战地重游，老友重逢，更激起作家们的创作激情。1954年，《平原游击队》剧本发表了，立时引起极大反响。同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平原游击队》，由著名导演武兆提、苏里执导。主要演员郭振清为演好李向阳这一英雄人物，与甄凤山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平原游击队》上演后引起了轰动，李向阳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中，保定地区产生了严重的派性，甄凤山遭到了造反派的游斗、辱骂、吊打。家多次被抄。1967年腊月，关押在望都县达数月。

1972年4月14日，甄凤山因患肺癌与世长辞，享年69岁。

定县人民给予甄凤山极高评价。定县县委党史办编印的革命回忆录中写道：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甄凤山同志和他率领的部队参加战斗124次，歼敌278人，俘获伪军333名，缴获长短枪426支、轻重机枪9挺，炸毁汽车17辆、坦克5辆，缴获战马13匹，摧毁敌炮台31个，炸唐河、新乐大桥各1座，炸火车头4个，并缴获大批弹药和物资。”“甄凤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责任编辑：刘文）

胡耀邦胞兄探亲记

余振魁

在我国困难时期的1960年12月，胡耀邦同志的胞兄耀福带着他的次子德滋来北京探望母亲和耀邦一家，同行的还有耀邦的堂兄耀简。当时，耀邦老家的群力公社中和大队部顺便托请耀福、耀简为大队购买发电器材，答应他们的往返路费由大队报销。为表示家乡人民对耀邦同志的敬重，大队部筹备了一些冬笋芋头做礼品。大队党总支还特意向耀邦同志写了一封问候信。对这些一般人都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小事，身居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却作了严格的处置。1961年1月14日，他就以上述事情给家乡中和大队党总支写了一封长信，托先行回乡的耀简带回。信中，耀邦同志一再恳求家乡党组织做好他亲属的工作，劝止他们去他那里。特别是就

此次耀福等上京又是由大队出路费一事，耀邦同志严肃指出：“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赔退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对家乡送他冬笋和芋头，耀邦同志表示出异乎寻常

的愤慨，他在信中写道：“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送去24元，交耀简带回，清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胡耀福带德滋上京，原想让德滋留在耀邦身边上学，以后好凭耀邦的面子找个好工作。但耀邦同志好言拒绝了，耀福不服气，叫母亲“开导开导”耀邦。面对母亲和哥哥的“正当”要求，耀邦同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母亲、哥哥、

侄儿心服口服。为帮助侄儿读好书，胡耀邦在1月14日的长信中给家乡党组织表示：“我哥哥带来的德滋，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胡耀邦却热情关注家乡建设。当他从家乡党组织的来信及与哥哥的交谈中了解到家乡的情况时，他在信中写道：“听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收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连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他恳请家乡党组织经常向他通报家乡的情况，“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他对家乡党组织给他的信中所写的一些恭维话很反感，他指出：“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

趁胡耀福回乡的机会，耀邦同志又对1960年7月家乡群力公社领导给他送去的一批土特产作了处置。他让哥哥给公社党委带去便函和现金，将送去的15斤茶油，10斤豆子，60个油饼，20斤火焙鱼一起按当时的市价照付现金，并强调一定要让公社工作组和党委领导都晓得他对这件事的处置。

胡德滋回乡后，遵照叔叔的话在家乡读到初中毕业后，几次找叔叔给安排个工作，可一次次叔叔都是这么说：“当干部得从基层开始，你就安心务农，当好个生产队长

吧！什么时候把生产队办好了，你当了劳动模范，我再考虑。”1981年春节，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领导得知胡德滋仍呆在家里扛锄头，便给他办好了到岳阳去工作的手续。可是不久这事让耀邦同志知道了，他严肃批评了岳阳县的那个领导，硬是把胡德滋退回了家。同年4月，胡耀福去北京问起弟弟这事，耀邦发了脾气：“我早就告诉过你，德安（耀福长子）和德滋应该安心在家务农，可你们就是不听，却要叫他们去当什么领导。你这样干是什么意思？”耀福忙向弟弟解释，说事前他根本不晓得德滋被岳阳调去，他们从没打胡耀邦的牌子托人开过什么后门，可耀邦仍不大相信哥哥的话，着着实实地刮了哥哥一通：“要是谁都不愿在农村，大家都想去当官，那谁来种田？11亿人吃什么？”胡耀福听得不耐烦了，便使出做哥哥的架势冲着弟弟吼起来：“就国家讲，如今就数你大，在家里讲，可我还是比你大些，人家的伢子都能当官，为什么我的就不能？德滋遵照你的话在家读到了初中毕业，又干了这么多年农业，难道他就活该干一辈子这差事？难道就因为叔叔是你胡耀邦？”耀邦见哥哥火了，为消除僵局，便婉言对哥哥说：“当干部得从基层开始嘛，为什么他要利用自己的关系到岳阳去呢？”耀福心烦地回答：“在基层有什么奔头呀？”“要是担心在基层没出息，那就干脆当农民，静下心来呆在家里当个好农民！”耀邦同志夫人李昭见双方都振振有词，就劝耀邦不要先责怪哥哥，还是弄清事情真相再谈。后来，胡耀福又来到北京，耀邦告诉哥哥，他弄清情况，这事并不能怪哥哥和侄儿，责任在岳阳方面，耀邦反省了自己的态度，劝侄儿安心在家务农，好好干，当上劳动模范时再到北京来看他。

（责任编辑：仲文）

霍英东原名霍官泰。祖籍广东番禺。1922年，他诞生在香港一户舢舨之家。父亲靠舢舨驳运为业，终年劳碌不得温饱。因陆上无一立锥之地，被奚落为“水流柴”。他的童年是在极端贫困中度过的。17岁时，他的父亲在一次风暴中舟覆人亡，尸体漂流到荃湾附近才被家人找到。母亲将他安葬在青衣岛上。他的两个哥哥和母亲在风浪中曾被掀入大海，两兄死亡，母亲有幸被救起。这年他的大姐19岁，妹妹15岁，全家4口人的重担，统统压在母亲的双肩上。

贫困无依、居无定所的霍家，后来流落到香港一个叫做湾仔的棚户区。霍官泰母亲没有文化，只能靠缝补洗衣维持全家生活。

霍官泰年龄稍长，母亲让他去上学。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中文、英文。12岁时，小官泰考上了立皇仁书院，成为该校的免费生。他将原来的官泰，改名英东。他不负母亲的苦心，学习认真，成绩优异。白天他在校勤奋读书，晚上替做船工的母亲记账、送发票，由于营养不良和日夜奔忙，每天累得精疲力竭。

他喜爱运动，课余举重、打网球、踢足球。他在足球队中担任中锋，他所在的“有荣”少年足球队，曾闻名港澳。

抗日战争爆发，霍家生活更加艰难。霍英东辍学，靠打短工补充家用。18岁这年，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轮渡上当加煤工。后来到日本人的机场上去当苦力，一天给一碗粥和一块丝糕，所得报酬，很难糊口，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一天，搬运一个50加仑的油桶时砸断了一个手指。工头动了恻隐之心，给他安排了较轻松的修理货车的工作。此后，他到船上做过铆钉工，还漂洋过海到东沙群岛捞海藻。坎坷的生活煎熬，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培养了他自强不息

霍英东是怎

的奋斗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英国重新统治香港，复苏的劳苦大众，开始了和平的生活。市面渐趋繁荣，运输业也日渐忙碌。霍英东开始以驳运为业，驾舟为远洋货轮卸货。他负责把大船上的货物用小船运到码头仓库。他还参与转卖日军战余物资，白手起家，积累资本。这是他艰难奋斗而入商界的开始。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大陆的海岸线被封锁，香港的各种物资，特别是可作军用的物资，被禁止运入内地，国内不少厂家急需无缝钢管，英国人怕中国用钢管制造枪炮，一概列入禁运货单。霍英东意识到，中国之强大，影响海外华人地位的上升，他筹集资金买各种无缝高强度钢管，从枪炮用的，到原子能加速器上应用的，都在他采购之列。他把这些钢材、部件用转卖的方式弄到澳门，再从澳门运入大陆。霍英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一些方面协助加强了中国武器的现代化，做了有助于满足国内厂家的急需的工作，支援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

朝鲜战争结束，霍氏慧眼独具看出香港的发展将受楼宇不足的影响，住房和商店商场的建设刻不容缓。他将经营重点转到楼宇住宅建设上。1954年，他创办立信建筑置业公司。

样从底层搏出来的?

● 纪 流

霍英东没有雄厚的资金。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价房价昂贵,他那些资金凑在一起,买不了几块地皮。霍英东琢磨:如果一边建房一边分层预收售金,资金周转不是大大加快了吗!他大胆探索,果然成功。不但资金周转加快,利润也丰厚。这种做法,在香港建筑业中实属首创。他大力扩展房地产业,拆旧楼,建新厦,勤买快卖,足迹遍及港九。几年工夫,他的建筑公司大大兴旺发达起来,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的纪录。霍英东一步登天成了香港房地产业的巨擘。

六十年代初,霍英东敏锐地发现,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必然造成河沙、海沙的短缺;然而这种行当用工多,获利少,赚钱难,行家们都不肯涉足。他想:越是没人肯干,越说明此道得天独厚。1961年底,霍去英国考察教育及建筑、商务,途经曼谷时,向泰国政府港口部以120万港币买了一艘长280英尺、载重2890吨、命名“哈克顿”号的大挖泥船,每分钟可入海挖泥沙2000吨。买回编入他创办的有荣公司船队序列。他努力建设自己的挖沙船队,收买钢木机帆船近90艘,其中挖泥船20艘以上,建立了香港最大的挖沙公司。霍英东进一步同广东省订立外贸专买协定,取得专挖专卖河沙向港澳进口的执照。这样,港澳建筑所需主要材料海沙河沙,都由有荣公司供应。

霍英东经常驱车或驾船考察沙源产地及出沙质量,了解淘沙和沙出的堆积情况。他曾说:“一个企业家,要从经验中成熟,吃苦耐劳要占了百分之九十五。”他的沙材料供应,对香港的填海工程、改造海床、大厦修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大促进了香港建筑业的发展。不久,他获得香港海沙供应的专利权,成为港澳淘沙业的头号大亨。

霍英东在香港、澳门经营的行业,包括地产、建造、娱乐场等8大行业,他掌握着“有荣”、“立信”、“信德”等60多家公司,可见其经济实力之雄厚。他是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是当代香港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远见卓识的霍氏认为:“香港是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资金自由进出,绝大部分商品免税入口,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更大的贸易自由。因此,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成为举世瞩目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香港繁荣的重要支柱仍然是工业。香港制造的产品出口量大幅度增长,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他以为香港工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走多元化的道路,并努力开拓外贸市场。”他号召香港企业家要为祖国四化建设出力。他强调:“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盼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在引进资金加强内地建设方面,香港应该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近年来,霍氏在大陆的投资连年增加,投资项目已超过60项,是最早投资内地、最有成就的名人之一。如中山温泉宾馆、番禺宾馆、北京饭店西楼。还捐资给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体育馆、教学楼和修筑广东高速公路等。他捐资10亿港元立“霍英东基金会”,每年用这笔巨款的利息、股息和投资收益一亿元左右,用作兴办各项利国利民利港利乡的事业。目前,霍氏以极高的兴趣关注着大陆旅游业,他帮助规划海南岛雅龙湾(琅琅湾)的开发,并同彭国珍合伙建立了广州白天鹅宾馆。

为了修建这座高102.75米共34层的宾馆,在白鹅潭水域填江筑地近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计客房1000间。白天鹅宾馆已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第一流的酒店,被评为五星级最佳宾馆之一。

1979年夏天,白天鹅开工的时候,霍英东在工地日夜指挥不下“火线”长达13天,受到工地全体工作人员的崇敬。

霍英东先生是企业界的巨人,政界的名人,也是体育界的领袖。他是国际足联执委和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经他在德黑兰大力促进,1974年亚洲足联正式接纳中国为亚洲足联会员国。中国运动员在香港的重大比赛,他都亲临助威。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实现零的突破,首次获得金牌,使他心花怒放。为了表达对中国体育界的关心,他在北京参加国庆35周年时,宣布捐款一亿港元,作为发展祖国体育事业的基金。现在,这笔钱正在培养体育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仲文)

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

● 丁人卜

“风”从天上来

无为，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解放初期，人口为943 397人，1 369 302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过去沿江是一望无边的荒湖，湖内杂草丛生，曹操率领83万人马下江南时，到此望而却步，叹曰：“此乃无为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七师常驻这里与日寇周旋。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邓大军从这里千帆竞发。

1954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冲破长江大堤，淹没百万亩农田，在党的关怀下，放贷款、送口粮、捐寒衣，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在如此的大灾年景下，竟无一人因缺衣少吃而丧生，因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毛主席、共产党再一次体现了伟大救星的光辉形象。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

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茆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收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要退社了。这就是无为县农业合作化的一段历史，也是后来大跃进、共产风的先奏。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整天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那边的干部和农民对逃去的“灾”民，寄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处于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百般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 假、大、空

1958年9月间，公社化运动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已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

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

主义性质,当时县委仅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谁知不到10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给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当年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县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箩、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据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这股风推动下面的“共产风”,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3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非正常死亡几万人,1960年又死亡十几万人……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件,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

1959年为4.4亿斤,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

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

从衣食父母 嘴里夺粮

姚奎甲是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他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了气,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

无为县响山社三年来采用“供给制”的办法处理社员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响山社的供给制同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有所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按劳取酬,计算社员的劳动日。粗看起来,这种供给制同现在一般农业社的分配办法,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可是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响山社的实践过程,就可以看出,这里明显地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在若干地方已突破了按劳取酬的框框,超出了社会主义的范围。

响山社的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因素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减少了商品供给环节,缩小了商品流通范围,堵住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漏洞。响山社社员的主要生活必需品,由社的供给部根据社员的需要,统一进货,统一配给。有些非供给用品,社员也可以用配给方法,向社的供给部领取,年终结算。社员手中掌握的进入市场流通的货币也很少。所以在社的范围内,生活资料的分配,主要方面已不通过商品流通,而是通过计划分配;这样商品和货币流通范围就大大缩小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956年冬和1957年春,当农村出现一股社会主义的逆流,响山社周围各社富裕中农兴风作浪,而这里却风平浪静。可以想见,随着生产的无限发展,随着供给制办法的日趋完善,供给品的范围将日趋扩大,商品和货币流通范围将进一步缩小以至将来完全消灭。

第二,具有一定程度的按需要分配的因素,体现了“各取所需”的方向,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进一步削弱了。响山社社员的劳动收入,所有权属于社员个人,但是全部存放在社里,社员可以统一调配使用,可以对社员的消费进行合理安排。这样,产品所有权和使用权就有了某种程度的分离,个人的所有权就不是完全的所有权了。在响山社里,多劳多得,多得可以多用,这一原则还是坚决执行的。劳动力强与劳动弱、人口少与人口多,生活上事实



可貴的共产主义幼芽

論响山社的「供給制」

《人民日报》社论

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姚一

见面就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死后，姚奎甲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女人结婚，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宜宽说：“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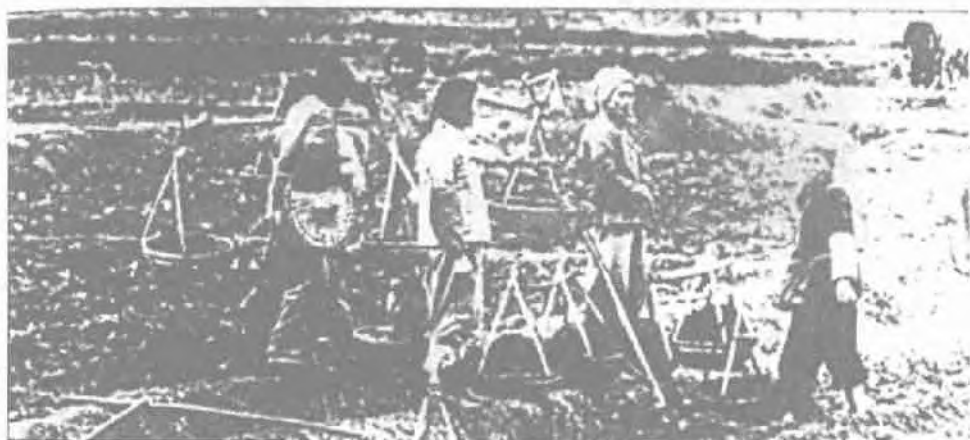
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由于浮夸，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而我不顾实情，仍布置打闸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也是弄虚作假……”

用专政手段镇压 反映实情的人

“县委来信办公室，1959、1960



无为县神塘公社（现泥义镇）赵墩生产队，在刮过“共产风”后，幸存的男女劳力在参加劳动的情景

年共收人民来信 1173 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着情况下，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收到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恺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因所谓的右倾错误，在遭到错误的斗争之后，姚奎甲对和张有过接触的人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并进行秘密搜查、严格监督、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 3 人写信给毛主席，并

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 级降为 25 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一年零 8 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 1959 年 7 月至 10 月 3 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文教局在斗争陈英期间，姚曾找陈英到县委小楼谈过话，并两次亲临会场作指示。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

“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后来这个人被吓得逃走了。”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被他骂的就有 75 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常委，公社书记，以至小队干部。

“有一次，县委第二书记吕奋志到合毛公社，发现郑河大队断粮，要求县委解决两万斤粮食，姚马上发火说：‘你不能干就回来，后面跟的尽是鬼’。

“一次姚奎甲因怀疑传说的

‘小轿车是姚政委一个人坐的，别的书记没有哪一个敢坐’的话是张云副县长说的，就把张喊到小楼上骂道：‘你可知自由主义有多少条，你这样混蛋，给我反省。’

“一次，三官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汇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骂他：‘猪死掉了，你怎么不死。’

“县农业局长胡志被斗争后，因病要求住院，姚说：‘你是思想病’，并骂：‘张恺帆是你亲爸、陆学斌是你干爸爸，现在他们垮台了，娘卖×的，你去告状吧！’。

“黄洛七圪大队副书记郭胜凯（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被姚找来问道：‘你那里产量怎样？’郭如实回报：‘早稻单产只有六七十斤。’姚骂道：‘你混蛋，你死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你是瞒产私分头子，你是地主思想，我开除你的党籍，开除你回家还要同你算账’。

“一次姚奎甲通知牛埠区委书记包世安到蜀山区参加会议。姚在这个会议上骂道：‘牛埠区包世安刮低产风，是白旗、是右倾，不和县县委穿一条裤子，你这个老东西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立即斥令包退出会场，并将包放在一间小房子里关了 3 个小时后，宣布撤职，要其反省。

“姚对一些干部处分后，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劳改。如姚亲自在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 90 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其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 21 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里劳改的干部和社员，是作为罪犯看待的，强迫干重活，有的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姚奎甲在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凶神恶鬼的面孔。干部、群众怕他如怕虎。

“一次姚奎甲在得胜大队骂大队书记。在场的人都吓得低着头，不敢望他。待姚走后好一会时间，



张恺帆遗像

三益大队书记王之道才抬起头来问人家：“姚政委什么时候走了？我耳朵都被吓闭了气，我如再参加这样的会命也没有了”。后来该大队干部因怕与姚奎甲见面，专门开了一个边门，一看见小黑车来，干部们就从边门溜走。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都竖了旗子，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躲开了。”

“高沟公社一次正在开党委会议，听说政委来了，立刻党委散会，章大好、肖寿山、业显能等几个党委委员骑着自行车就跑。”

共产党里有说真话的好首长

历史上的海瑞，在官持身廉介，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疏浚吴淞江，兴修水利……卒于官，贫至无以敛。

但是当代的海瑞是谁呢？他就

是在那共产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青天”的张恺帆。当时他曾被一些人诬为“大闹无为20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无为的“田園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毅然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他是1959年7月4日到无为的，后因得悉一些难测风声，于7月23日便返回省城。他在无为

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通过耳闻目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民受难之际，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情景，使张恺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主宰无为人生死存亡的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恺帆刚性秉

直，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砸碎群众的锅，张恺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全县人民对他在无为察访，喊喊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

但是，由于姚奎甲只顾个人名利，不顾人民死活，对张恺帆在无为的所言所行，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其时正值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万言书”受到了谴责。姚奎甲窥探形势对他有利，觉得张恺帆言行与彭德怀的观点相似，便搜集张恺帆的材料报省，省又转报庐山为毛泽东主席所阅。毛即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安徽有个张恺帆……”安徽省委于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指责的罪过主要是张恺帆在无为的20天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其中最主要的、最具体的就是他在无为所提倡的“三还原”、“两开放”。“三还原”即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两开放”指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摘摘鱼虾），就这样，把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恺帆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说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责任编辑：仲文）

李汉俊的功与过 中共『一大』代表

● 姚松蛟

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又名李人杰，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县一个穷教书先生之家。当他12岁时，就在二哥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资助下留学日本，此时马克思主义正在日本传播，他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8年秋，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纷纷回国，李汉俊也带着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回到上海，正巧董必武、詹大悲、张国思

等同乡也在上海，李汉俊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9年，他在一篇文章里鼓动大家学习俄文，直接研究俄国的革命经验。他在致董必武信中，指出当时盛行一时的“教育救国”论是不能救国的，只有彻底改造现行政治制度才能救国，才能改变教育现状。在《怎样进化？》一文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人类进化与生产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罪恶本源，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1920年，他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他还热心帮助和鼓励志同道合

的人一道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就是应李汉俊任编辑的《星期评论》之要求，着手译《共产党宣言》的。书译毕又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李达1921年5月在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的附言中写道：“译者现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说的那些补译的地方，大都经过我的朋友李汉俊的帮助，我特意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

李汉俊在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逐渐明确地提出了建党思想，1919年9月5日至7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苏联共产党前身）式的政党，并提出“我们应该在这一点上有切实的打算”。这一年年底，他参加了星期评论社。通过他和沈玄庐、俞秀松、陈望道等人的努力，使该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细胞”（瞿秋白语）。1920年5月，他和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等10余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又和陈独秀等发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他和陈独秀创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刊物——《劳动界》。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陈炯明之邀，离开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遂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负起全面领导的责任。他和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他介绍了董必武入党，并具体帮助湖北建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他和李书城先生的寓所举行，他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30日晚上在举行第



李汉俊

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撞进一位不速之客，代表们在马林的建议下，立即中止会议，迅速离去，李汉俊为了掩护大家，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应付局面，几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蜂拥而至。

一个巡捕问道：“你们开什么会？”李汉俊从容答道：“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开会。”他们是什么人？”“北大的教授。”“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北大的教授，趁暑假之便来上海谈谈。”

巡捕见问不出什么，便指着书架问道：“你们家为什么要藏这么多宣传社会主义的书？”李汉俊说：“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巡捕只好悻悻离去。李汉俊临大危而镇定自若地与巡捕周旋，赢得了代表们的赞扬。随后，“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后，李汉俊和董必武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份向共产国际报告的文

件。“一大”后李汉俊留在党中央工作。1922年1月28日，他与上海地区的党、团员和工人群众一百余人，走上街头，散发写有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贺年贴”。此举震动了上海，扩大了党的影响。

艰难曲折的道路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离开上海返回桑梓。在武汉，他公开

的职务是汉口特别区商场督办处工程师，国立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实际上他参加了这一地区党的领导工作。

10月，全国第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省一级的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告成立，李汉俊当选为教育委员会主任。他除积极参加该工会的活动外，还经常鼓励青年学生不要在书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应该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锻炼，作到言行一致。1923年1月30日晚，他带领武昌高师学生任开国、赵春珊等4人，随同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搭车北上参加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会期间，他又在斗争口号和策略上，与张国焘发生争执。“二·七”惨案发生后，李汉俊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被迫离汉赴京躲避李书城处。在北京，他因李书城

的关系，曾在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为此党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李汉俊没有出席大会，但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月25日，共产国际致函李汉俊，指出自“一大”以来，党组织对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宣布关于他在北京接受官职问题的通告已经收回，热烈要求他回到组织内来，“立即参加工作”。

李汉俊响应党的召唤，立即辞去了在北京担任的一切职务，谢绝了上海大学要他去当系主任的高薪聘请，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武汉参加党的工作。他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利用报刊和讲台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卅”运动爆发后，李汉俊又以火一般的激情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再次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

在此前后，李汉俊被中国共产党除名了。从客观上看，他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屡遭打击，以致消极而自动脱党；主观方面，李汉俊组织观念薄弱，性格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痼癖（李汉俊语），与陈、张意见不合，又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先负气擅自离开党中央，后又不参加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生活，以致被党除名。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李汉俊离开了党，但从“未反对党”，“社会活动也尽量作”（董必武语），大革命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国家主义派，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成为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左派。这当中董必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诚恳地批评李汉俊在政治上错误，另一方面鼓励他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在挚友的支持和鼓励下，李汉俊振作起来，积极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决策,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并成为省党部的执行委员。1926年8月,他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董必武赶到长沙。8月22日,国民党在湘中央委员、鄂、湘两省党部执行委员举行联席会议,李汉俊和董必武、邓演达、郭亮、李维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政治经济委员会,李汉俊被推举担任该会秘书。

这一年年底,鉴于李汉俊的政治表现和本人的要求,中共湖北省区决定恢复李汉俊的党籍,上报中央请求批准,但无下文。于是李汉俊失去了回到党组织的最后机会。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董必武、李汉俊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詹大悲等为委员,李兼教育厅厅长。他坚定支持日益兴起的农工运动,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热情称颂:“农工是世界解放的钥匙,无农工世界不能存在,无农工世界亦不能解放。”

当蒋介石叛迹显露时,李汉俊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进行斗争。1月24日,他参加省、市党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在会上响亮地提出“打倒新军阀!”、“反对军事独裁!”等口号。2月24日,陈公博奉蒋介石之令窜到武汉“刺探”情况,李汉俊和詹大悲与他辩论至深夜。李、詹历数蒋介石的叛变行为,最后不欢而散。3月11日,李汉俊参加了省党部第21次执委会,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免去蒋介石的职务,公开揭露其反革命罪行。蒋介石公开举起叛旗后,李汉俊和武汉民众一道,愤怒声讨蒋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随着蒋介石的反动,武汉局势日益恶化,夏斗寅在鄂西,许克祥在长沙相继叛变;6月,汪精卫也在策划“分共”的阴谋,在国民

党第一次省县市联席会议上,汪公开谴责董必武领导的省党部,并对湖北农民运动横加指责,李汉俊挺身而出,以会议总主席的身份,热情赞颂省党部的光辉业绩,赞颂湖北农民运动,警告一切反动势力。

7月,汪精卫终于撕下“左派”的面具,发动了政变,大革命完全失败了。李汉俊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一度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曾想与詹大悲一起去日本。已转入地下斗争的董必武秘密会晤了他们,叮嘱他们不要轻易离开革命阵线,要留下做点工作。他们遵照董必武的意见,团结国民党左派李书城、孔庚、孔初民等,利用其特殊身份,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为革命做了许多好事,在桂系军阀(西征军)到武汉之前,他们从狱中释放了20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使之免遭杀戮,随后他们隐匿在汉口日租界。

1927年12月17日,桂系军阀与日本领事勾结,将詹大悲、李汉俊逮捕,未加审讯,便于当晚将他俩杀害。

第二天,董必武从报上看到噩耗,悲痛万分。翌年4月,他噙着热泪写下了上万言的材料,缅怀这对亡友。1937年斯诺前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董必武时,他深情地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52年4月,董必武在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复函中写道,李汉俊和詹大悲“都实际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工作,为国民革命而牺牲了生命,我认为他们二人是可以称为烈士的”。据此,中南民政部上报中央,追认李汉俊为烈士,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第11号烈士证,上写:“李汉俊同志在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刘文)

讲话结结巴巴

真痛苦呀!

口吃

矫正器

——矫正口吃效果好

口吃矫正器是按照生物反馈原理,由传统口吃疗法与现代电子技术相结合研制而成的,它借助电子技术引导患者排除心理因素的困扰,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再指挥患者缓慢、轻柔、有节奏地发音吐字,正常掌握语速,改变讲话结结巴巴的坏习惯,养成流畅自如讲话的好习惯,建立新的条件反射,达到矫正口吃的目的。它是治疗口吃的一种新方法。荣获国家专利(家用新型86202341.6号)。适合个人购买使用,已生产了10多年,深受口吃患者的欢迎。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免费赠送资料,欢迎来信联系购买

(附邮费2元)我厂长年办理邮购

来信请寄:浙江省天台医疗仪器厂邮购

邮编:317203 电话:(0576)3661388

光耀太平洋两岸的史迪威将军

● 张文苑
张星星

八十年代,胡耀邦有一次接见美国客人,深情地称赞了为发展中美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史迪威将军有远见”。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仍很怀念抗日战争年代,在中印缅战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今年是史迪威将军辞世50周年,特发表此文以资纪念。

—

1943年4月28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奉召回国。

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老上司陆军部长马歇尔告诉他,5月中旬将在华盛顿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将研究同盟国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中缅印战区的任务。

4月30日,史迪威会见了罗斯福,他提出,中国战区的首要问题应当是整训和装备陆军部队,并通过反攻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这样才能向中国运送充足的物资,挫败日军的地面进攻。但是,罗斯福已决心支持蒋介石和陈纳德的“空战第一”理论,他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任何意见和解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围绕着中国战区“空战第一”还是“陆军优先”的问题,也分成了两种意见。支持陈纳德的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罗斯福的私人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而陆军的马歇尔、空军的阿诺德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都支持史迪威。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拒绝了多数人的意见。

罗斯福对马歇尔表示,他决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再延误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认为:“蒋介石的处境非常危急,他的政府有彻底垮台的可能。”而“空战计划”对提高中国的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5月12日,有美英两国首脑和他们的三军参谋长参加的“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开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会议提出了一份建议,主张把中国作为打击日本的主要基地,要求加强对华援助和对日空战,并对缅甸北部发动一次有限度的地面攻势。英国人对中国战场

毫无兴趣,他们宁愿支持罗斯福的空战计划,也不愿参加一场规模已大大缩小的缅甸战役。在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史迪威的极力争辩下,他们才作出了让步。

会议结束后,史迪威返回重庆。此次美国之行,他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反攻缅甸战役被限制在北部一隅,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被放在第一位,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被划给了空军……但是,他心中的希望和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相信,事实终将证明那些把陈纳德当成救世主的人是多么愚蠢!总有一天他能完成对中国军队的整训,这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必将给日军以致命的打击。

6月16日,史迪威会见了蒋介石,向他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蒋介石的答复,但是,迟迟没有回音。

7月12日,蒋介石约见史迪威,正式作出参加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时史迪威着手整训的中国军队,已进入第二批30个师的计划。他向蒋介石建议,联合共产党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进攻,并要求向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

然而,正在史迪威满怀热情地为中国战场出谋献策的时候,一场新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

8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率领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再次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会上,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要求成立一个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美国方面表示赞同。会议决定,

以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副统帅。这样的安排，史迪威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向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他要向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为本国政府负责。史迪威认为，这简直是“中国式的九连环”。

宋子文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华盛顿大肆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子文的要求，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搞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告诉宋子文，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子文表示，如果委员长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官后门放出来的这股风，宋子文在新德里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对蒙巴顿蛊惑说，史迪威和中国军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10月15日，索默维尔飞抵重庆会见蒋介石时，一场酝酿了许久的疾风暴雨突然向史迪威袭来，蒋介石在宋子文的鼓动下，明确地向这位信使表示，史迪威必须被解除职务。

出人意料的是，宋美龄和宋霭龄找到蒋介石，反对撤换史迪威。她们认为：“如果你使这位美国英雄失去在中国的指挥权，那么你在

美国就会非常不得人心，那就可能得不到他们的飞机大炮或其他任何东西。”原来，从9月中旬开始，宋美龄和宋霭龄多次主动找史迪威密谈，表示支持他的军事改革方案。她们围绕的一个中心话题是搞掉何应钦。史迪威曾在9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

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认为：“她们站在史迪威一边，也许是对涉足重大政治问题的渴望……”

10月18日至20日，史迪威、蒙巴顿、索默维尔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黄山召开会议，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问题。会议出现了新的气氛：“快乐的家庭式会议”。

11月22日，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等人一道出席了开罗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问题，而反攻缅甸则成为三方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蒋介石终于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接受蒙巴顿方案，同意参加1944年春对缅甸北部的反攻。

11月2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飞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关于欧洲战场问题的首脑会谈。蒋介石夫妇起程回国，史迪威被留在开罗，等候德黑兰会议的结果。

史迪威留在开罗苦苦地等待了10天，但却两手空空，一无所



1942年，史迪威与蒋介石、宋美龄在重庆

获。罗斯福决定将这一战役推迟到1944年秋季以后。12月6日，罗斯福还和霍普金斯一起约见了史迪威。

罗斯福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开始了他们的谈话。他坦率地承认：“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史迪威认为，如果日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可能就难以支撑。罗斯福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好吧，那我们就该寻找另外一些人物或集团，以便继续把战争坚持下去。”史迪威告诉他：“这些人也许正在找我们。”罗斯福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事实上，罗斯福和史迪威对“另外的力量”都了如指掌，其中包括已发展到近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史迪威回到重庆，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缅甸战役问题。结果是史迪威已经预料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要等待时机”等等。“这小畜性根本不想打”，愤怒的史迪威又一次在

日记中写下了骂人的话。

宋氏姐妹也出面帮助史迪威做工作。宋美龄曾沮丧地告诉史迪威：“我苦苦哀求了他，什么办法都用了，就差杀了他。”

12月19日，蒋介石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同意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利多方面的投入战斗。但是，“不要为了英国人的利益牺牲这支部队”。根据宋美龄的要求，蒋介石把对史迪威的授权写成了正式文书，并盖上了委员长的印章。

蒋介石的让步和授权，使史迪威燃起了胜利的希望，一个军人的热血在周身沸腾。第二天，史迪威急不可待地飞往前线。

在整个反攻缅北的进程中，凡到战斗激烈之时，史迪威总会出现在第一线的指挥所里，一位曾在新三十八师任营长的王及人先生回忆说：“总指挥史迪威……常亲临前线督战，方法很特别。如果敌人阵地久攻不下，他就独自开着小吉普车到团部，他表面上从容不迫，说是到前方来看你们打仗。团长心中明白，只好让副团长陪着他，不让他乱跑，自己到前线去指挥作战。如果等了一两天还不见攻下来，他就蹲着不走，弄得人们为他提心吊胆。师长也不得到前线来陪着他。等到敌阵地攻下来了，他讲几句奖励的话才高高兴兴离去。”

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经过6天的激战，全部夺占了于邦的日军阵地。日军第56联队丢下300多具尸体，仓皇退却。

于邦战斗初战告捷，充分显示了中国军队的战力，给日军以巨大的震撼。日军战史记载：“过去，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

战斗的胜利，使史迪威感到快

慰；可蒙巴顿却提出一项新的“战役计划”。

对这位“全球战略专家”的计划，史迪威认为：那是“漂亮的图表，虚假的数字，肮脏的意图”。

英国佬的“肮脏意图”十分清楚，虽然缅甸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但打通中印公路，对他们没有直接利益可图，而东南亚尤其是香港，则是英国的主要殖民利益所在。他提出了一项“公理战役计划”，要求放弃缅甸作战，实行以夺取马来亚、苏门答腊和香港为目标的海上战略。史迪威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但蒙巴顿毕竟是战区最高统帅，他决定派战区副参谋长魏德迈率代表团去华盛顿，将这一计划提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讨论。

史迪威为避免被动，立即派他的参谋长博特纳准将和政治顾问戴维斯，先期返回美国。博特纳和戴维斯在华盛顿晋见了罗斯福，向他汇报了上述情况。罗斯福马上致电丘吉尔，坚持夺取缅甸的战役行动，反对进攻东南亚的“海上战略”。5天以后，当魏德迈率领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公理战役计划”时，当即遭到正式否定。蒙巴顿为此气愤至极，火冒三丈。

史迪威和蒙巴顿在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处世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了鲜明对比。蒙巴顿穿一身剪裁考究的棕黄色热带军服，戴着金光灿灿的大肩章，挂了3根绶带，胸前的勋章五颜六色，闪闪夺目；史迪威则身着宽大的野战服，戴一顶钢盔，没有佩带军衔和各种勋章、奖章，肩上扛了支卡宾枪。蒙巴顿此次入缅，调来了16架战斗机护航；史迪威往返于中缅印之间，从来是单人单机。看到蒙巴顿如此兴师动众，史迪威认为，这一下消耗的燃料“够我们打一个星期的仗”。

尽管两人战略不同，行为方式各异，但他们的个人关系还是比较

融洽的。蒙巴顿称赞史迪威：“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老战士。”

史迪威根据日军已受重创和仓促布防的情况，采取了更大胆的包抄迂回战术。他命令，以新二十二师担任坚布山隘口的正面进攻；以新三十八师一部向坚布山右侧后迂回，将敌前后斩断。

第二天，史迪威亲自赶到担任主攻的新二十二师第66团督战。19日这一天恰好是史迪威的61岁生日，几位工作人员为他做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还做出了“乔大叔生日快乐”的字样。

史迪威已经61岁，连续的战斗，使他紧张、失眠，精疲力竭，瘦削的脸上皱褶更多、更深了。有些士兵见他那张“老火鸡脸”，以为他有70岁了。一次，一位美军黑人士兵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没戴军衔的史迪威，然后哀怜地摇摇头说：“征兵局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怎么能让这么个老头干这种事呢？”

缅北反攻作战，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

二

3月8日，驻缅甸日军向英帕尔发动进攻，阿萨姆邦的形势岌岌可危。史迪威从缅北战场赶到重庆，试图说服蒋介石出兵。可是，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给罗斯福发去了回电，断然拒绝出动远征军。

史迪威的电报一封封地飞向华盛顿，“乌克兰陷落”，“英帕尔被围”，“科希马危急”……

不能再让蒋介石拖延下去了。4月3日，罗斯福亲自口授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几乎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愤怒和警告：

“日军对英帕尔的进攻，直接目标就是切断向中国运送物资的交通线。如果日本人的这一企图得逞，他们下一步就能集中力量对付利多的驻印军，而后就会轻松地转

向你的远征军。……我认为，不要再拖延了，立即出动你的第七十一军部队，夺取腾冲——龙陵地区……如果这支部队不用于共同的事业，我们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教练人员所付出的最热情而广泛的努力，就不能证明是有意义的。……我切望你能行动起来。”

当罗斯福的电报传到重庆时，蒋介石奇怪地“病了”。一切事情由宋美龄出面周旋。

为了使总统的要求迅速得以实现，马歇尔于4月7日致电史迪威：如果远征军还不采取行动，就停止提供租借物资。

4月10日，参谋长赫恩正式通知中国军政部，由于中国远征军不能投入对日作战，决定停止向该部队供应物资。

这一举动着实刺痛了蒋介石，但他继续“生病”，4月12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会见赫恩，保证在48小时之内就出动远征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要求暂缓发布停止供应租借物资的命令。

5月11日，远征军主力分两路向龙陵和腾冲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催促蒋介石出动远征军的艰难过程中，蒋介石反复推托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强调所谓“共产党的威胁”。关于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也确实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而史迪威也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这方面的每一个细微动向。

早在1935年至1939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史迪威就注意收集关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活动情况。1936年，斯诺从北平赴陕北采访之前，曾与史迪威作过交谈，他发现对共产党和红军，史迪威比他知道的还要多。1938年初，史迪威在武汉与史沫特莱一同讨论和研究了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同时，还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对蒋

介石和国民党将领缺乏进攻意识感到恼怒，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要是能请那些共产党部队到这里来作战就好了。”

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

从4月中旬开始，日军出动15万人首先对河南发动了进攻。在日军的攻势面前，国民党的43个师一触即溃。仅1个多月，日军便占领了郑州、许昌、洛阳等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南段。6月中旬，日军占领长沙，并包围了衡阳，当地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严重威胁。

日军的凶猛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使同盟国感到十分震惊。这一危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将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国占领了日本，中国大陆的日军仍将是一支强大的抵抗力量。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单凭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不仅无法击败日本，甚至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而经过史迪威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却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中显示了重大的作用。两相比较，美国最高统帅部不难对挽救中国战场危机的办法作出新的决断。

6月30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司的托马斯·汉迪将军给马歇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史迪威提升为上将，并由他指挥中国军队作战。

7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

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我们授权于一个人，来协调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军队。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的心情，不过我认为，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和在组织训练，特别是指挥你的中国军队作战方面的才能……灾难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我们战胜日本的整个计划。我准备晋升史

迪威为四星上将，并建议你立即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中国，置于你的直接领导之下，让他指挥所有的中国和美国军队。你应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与权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势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采取大胆而适当的实际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我向你保证，就我来说，丝毫没有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向你发号施令的意思；不过，整个亚洲的未来，以及美国在那个地区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有理由对这个问题表示严重关注……

蒋介石权衡着利弊，决心以“缓和”处之。他复电罗斯福，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议”，但接着又提出，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需要有一个“准备阶段”；并要求罗斯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以调解他和史迪威的关系。

罗斯福没有看透蒋介石的“缓和”企图，而对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满意。

8月10日，美国方面通知蒋介石，将由赫尔利将军担任总统的全权代表赴华。

8月12日，美国正式公布了晋升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的任命。

三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并给他以充分的信任。

史迪威立即起草了发给各战区及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倾吐了他对中国军队的肺腑之言：“我希望你们把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自由，跻

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个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与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当史迪威巡视战区后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

第二天下午,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宋子文举行了会谈。宋向他介绍了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的规定:必须按照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也就是没有命令权;共产党的部队在“内政”未解决之前,不列入指挥范围;人事行政由中国军队行政系统按中国法规办理,也就是没有任免、奖惩权。史迪威气愤地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他向宋子文表示:“蒋介石的想法办不到,如果我没有权力,我就不能承担责任。”

当天,罗斯福便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

近几个月来,我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抵御一直在向中国和你逼近的灾难。由于你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在华军队,致使我们面临着华东要地的失陷,面临着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我确信,现在你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唯一办法,……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

蒋介石在黄山别墅,却是满心的沮丧和愤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今日实为余生最大之耻辱也。”

史迪威在胜利的喜悦中产生了错觉,罗斯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

坚决支持,似乎总统已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张,乘胜前进,蒋介石就不得不退缩。

9月23日,他找到了一套自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办法,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派他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说服他们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他本人的指挥。他设想了5个条件:1. 共产党承认元帅的最高权力,通过史迪威本人接受命令;2. 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的部队,不与中央政府的军队接触;3. 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4. 使这些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5. 国共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问题。

史迪威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基于两点想法。首先,他确实对共产党人有好感,而共产党人也向他表示过愿接受他的指挥。他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来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玩忽职守,混乱,经济崩溃,苛捐杂税,言行不一。……共产党的纲领则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加管理,实践诺言。”……

9月24日,当赫尔利拿着史迪威的建议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以十分坚决的态度,要求美国方面召回史迪威。他对赫尔利说,我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产党赤化中国。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头脑,我已经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不能让他担负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蒋介石交给赫尔利一封给罗斯福的电报,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谊合作精神”的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并保证“竭诚欢迎”和“全力支持”继任者。第二天,赫尔利将电报转给了罗斯福。

华盛顿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10月11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他

告诉罗斯福:“你和蒋介石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除了关于对史迪威的任命外,蒋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 and 任何建议。”并且危言耸听地说:“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我谨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

史迪威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喉咙。”

10月19日,“斧子砍下来了。”乔治·马歇尔来电告诉他,罗斯福已致电蒋介石,同意把他从中国召回。

在随后的一天半时间里,史迪威怀着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别。

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将军,表示“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他看望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哭了,很苦恼。”

他给陈纳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对他取得的显著战绩和中国人对他的爱慕而感到骄傲。

蒋介石派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下级军官,给史迪威送来一枚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大绶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级别的美国军官去谢绝了。蒋介石还是彬彬有礼地约见了史迪威。

史迪威对蒋介石说:“无论你对我怎样看待,请记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重庆。

在飞赴印度的途中,他在昆明、保山、密支那、兰姆加尔稍事停留,看望了那些一起战斗过的部队和军官们,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迹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但他不能向他们正式告别,华盛顿命令他必须对他的部队和军官严守秘密。



史迪威在缅甸前线和中国将军一起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四

10月27日，史迪威离开了中缅印战区最西端的卡拉奇。“黎明时离开机场。8点，最后看了一眼中缅印战区。”他满怀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的经历，在广阔的世界和战争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他已是名声显赫的四星上将，可美国总统更需要中国。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就是中国。同蒋介石的中国相比，他宁肯牺牲一位“无足轻重”的将军。

11月一天下午，史迪威乘坐的飞机在华盛顿降落。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威妮和马歇尔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仿佛他是一个从前线溜回来的逃兵。

史迪威由于在缅北特别是在密支那的杰出战绩，被美国人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这样一位英雄不明不白地被解职，无疑是很难对公众作出交代的。因此，这一消息在

美国国内仍然秘而不宣。为了避免麻烦，政府决定对史迪威采取“保护”措施。

吃晚饭时，麦卡锡突然问道：“将军，您什么时间离开华盛顿？”“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史迪威反问了一句，“这就是说华盛顿不希望我呆在这儿，是吗？”麦卡锡点了点头。史迪威接着说：“好吧！我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话就离开。”

晚上，马歇尔来了，告诫他：“要一言不发，这可是有爆炸性的。”原来大选的日子定在11月7日，罗斯福担心此事会影响他的选票。

第二天，史迪威夫妇便离开华盛顿，准备经过拉斯返回他们在卡梅尔的家。

但是，事实是封锁不住的。史迪威在重庆就找去了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爱金生），向他介绍了被召回的内幕经过。阿特金森决定立即赶回国内，向公众宣布这些情况。

10月31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了阿特金森的报道。这篇报道尖锐地指出：“史迪威的决裂，起因于蒋介石拒绝全力进行战争。”这一事件意味着美国默认“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胜利。这个政权更关心的是维持其

政治特权，而不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美国现在至少是在消极地支持着一个日益不得人心并在中国失去信任的政权，一个拥有3种秘密警察机构和关押政治犯集中营的政权，一个压制言论自由、反对民主势力的政权”。

阿特金森的文章像在平静的水潭里扔进了一块石头，立即激起了一层层涟漪。《时代》、《新闻周刊》、《生活》、《星期六晚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民族》、《新共和》等报刊纷纷发表报道或评论，斥责国民党政权，为史迪威鸣不平，批评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面对强烈的舆论反应，罗斯福不得不就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一再声称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完全是性格不合造成的，不涉及政治、战略和政策问题。

1945年1月，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负责国内部队的训练工作。

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1945年1月，太平洋西南战区的美军部队，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进攻吕宋岛，随即向马尼拉进军。

4月，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5月，马歇尔安排史迪威到麦克阿瑟的太平洋前线视察，麦克阿瑟与他亲切交谈，他问史迪威是否愿意担任他的参谋长，史迪威摇了摇头，对他说：“我认为我适合当一名前线司令官。”麦克阿瑟又问他，作为一名四星上将是否可以担任集团军司令。史迪威答道：“只要让我带兵打仗，哪怕指挥一个师也行。”

6月23日，史迪威正式就任第十集团军司令。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8月8日，苏联远东方面军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史迪威带着喜悦和无奈的复杂心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

9月2日,史迪威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7日,他又亲自主持了琉球群岛日军的受降仪式。

史迪威隔海望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他太想回那里去看看了,尤其是想念北京。9月26日,他给马歇尔发去一封电报,希望准许他到北京去看看老朋友。马歇尔询问了蒋介石。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声称史迪威的访问会被共产党所利用。

听到这一消息,史迪威非常气愤:“蒋介石以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我也真想那样干一番。”

北京,这座城市寄托了史迪威太多的感情,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1945年10月18日,史迪威回到美国,战争结束了,部队没有了,他也62岁了,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

当史迪威听到杜鲁门对马歇尔赴华使命的指示时,他明确地断言,马歇尔的使命不可能成功,一旦蒋介石知道美国的基本政策绝不会抛弃他时,他就绝不会对共产党人作任何让步,而只会变得更加强硬。

马歇尔的中国之行,最初的停战协定成了一张废纸。局势首先激烈起来的是东北。史迪威在一封信中写道:“满洲难道不是一个奇观吗?这真使我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

夏天,他的身体渐渐出现不适,头晕目眩,体力不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作了手术检查,发现胃部的癌变已到晚期,并且已扩散到了肝部。

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将军与世长辞,走完了他63岁的人

生路程。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没有为他举行葬礼,没有保留骨灰,尸体火化后撒进了太平洋。

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刚强、坚韧的将军。

美国的许多报纸、杂志发表社论或评论,颂扬了他的品德和功绩。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忠诚的朋友。

正在美国访问的冯玉祥将军专程赶到卡梅尔,对威妮夫人说:“我是来和你们一起悼念我的朋友史迪威的。”

朱德在发出的唁电中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

周恩来的唁电指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

南京,国民党方面也召开了追悼会,气氛十分冷淡。蒋介石写了一副挽联,上面说:“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谟资筹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

史迪威将军一直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重庆市于1991年10月将史迪威旧居辟为纪念馆,成立了史迪威中心,先后召开了两次史迪威研讨会。

史迪威将军的子女也没有忘记中国,史迪威学院基金会与四川有关方面合作,先后建立了史迪威国际文理学院、史迪威国际护理专业、史迪威外国语学校、史迪威图书馆等等,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家驹)



史迪威在缅甸丛林中行军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 舒 芜

一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竟然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地改造老旧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平等,行新政,用新人,开新课。蔡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同乡前辈,民国元年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鲁迅招入教育部门工作,现在又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来教希腊文学和古英文,都是他的知人善任。

周作人幼年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但是他对正统的东西没有兴趣,喜欢涉猎传说传奇,笑话谣谚,风土民情,草木虫鱼等,而且一生都坚持不懈的探索,甚至他的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大都是以这种杂学为背景的,因此他有着一般文学家难以企及的开放性和深厚性。

周作人15岁在南京上学时,便从英文本《天方夜谭》中翻译了《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改题为《侠女奴》,在杂志上发表后,又出版了单行本。

日本留学期间,他同他哥哥鲁迅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

其中大部分是周作人译的。周作人来北京以前,已经译出了外国短篇小说34篇,中篇小说7部,并且出版了一本介绍古希腊文字的论集《异域文谈》。

周作人还在中国留学生办的几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时事、社会、文化评论,其中《论文章之意义》,是关于文学文化问题的煌煌大文,可与同时期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比美。他还结合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儿童学和儿童文学研究,写了一系列论文,翻译介绍了安徒生等人的著名童话作品,又从民间和古籍中蒐集整理了大量的童谣、谜语等儿童文学资料。这些工作,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了中国现代儿童学和儿童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终生关注儿童文学,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刮到他家的前几天,他还重录了他的自己的《儿童杂事诗》,此为他最后写定的一部著作。

周作人从19岁译《侠女奴》发表后,他一直关切同情妇女命运的表现。后来,他成为中国现代妇女学的奠基人,性心理学的最早和并一贯热情的介绍者,一生坚持“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社会责任,他总结自己一生思想的中心就是“嘉儒子而哀妇人”7个字。

周作人与鲁迅一同听过当时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家和学术大师章炳麟授《说文解字》,他们终身尊章氏为师。周作人还从欧洲和日本思想界各方面汲取,形成初具规模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超过了当时一般先进青年的水平。后来,他一生的思想,都是这一套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充实。

周作人从日本回国,鲁迅正从事辑佚之学,其成果有《会稽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这中间周作人是鲁迅的得力助手。

二

周作人来到北京这年一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是文学革命进军的号角。周作人积极参加了新文学运动,自1918年1月起,他在《新青年》和其他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评价文章。所译的欧洲、非洲和日本的小说、诗歌、散文,当时都成为文学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和看向外界的窗口。周作人对异域文艺新声有锐敏的感受,他认为,多读世界各国各族文学作品,能够看到人类共同的命运。

当时,中国新文学运动需要理

论指导,周作人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理论。在他出场之前,胡适、陈独秀两篇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社会上的反响、争论得最热烈的,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问题。周作人出来了,1918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新文学的新,尤其要把女人当人;不要把人(尤其是女人)当成人以下的兽,也不应要求人(尤其是女人)成为人以上的神。此文一出,倾倒一世,新文学的作者和读者对新文学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继《人的文学》之后,周作人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圣书与中国文学》等一系列文章,把他的人文主义个性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为完整的一套,使他成为新文学理论的第一位权威。他的文艺评论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谈论集》,论者认为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基础。

中国新文学运动在理论的提倡鼓吹之后,需要拿出实绩,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小说方面的第一个实绩,而周作人的《小河》则是新诗方面的第一个实绩。1919年2月,《新青年》以第一篇的位置,发表了这一新颖的长篇新诗,它的音律、风格和意境上完全摆脱了旧诗词的影响,是散文诗而又有甚深的韵味。后来胡适推许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还有论者说,有了这首诗,“新诗乃正式成立”。

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文学革命必然要进为思想革命,第一个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的,是周作人。1919年3月,《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此文甚短,影响却大,它指出思想革命的对象是封建的纲常名教、忠孝节烈思想,并且指出这种荒谬思想会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冒充民主。

这就给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出了近期和远期的前进目标。周作人自己当时和后来也一直不懈地为此奋斗。综合他后来发表的大量文章来看,他号召的思想革命,中心要求是人的解放,分为3个方面:一是反对礼教束缚和思想专制,以求人的解放;二是反对野蛮的性观念和残酷的性道德,以求妇女的解放;三是反对祖先崇拜和成人本位,以求儿童的解放。这中间内容非常丰富,周作人则以这些思想成为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型的文学家。

三

周作人,还从事多方面的社会活动:

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想从国外传来,有志之士都在为中国探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有很大影响。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运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他们选一个地方建立新村,聚集一群人,过着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要用这种实验示范,逐步推广,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周作人早就欣赏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和思想,对于他领导的新村运动,非常赞同,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介绍《日本的新村》文章。同年7月,他去日本,访问了新村,加入了新村还缴了会费,以后他的日记上还不间断有汇缴会费的记录。周作人还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溪、东京4处的新村支部。1919年末,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部分成员,受了新村主义和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的支持。周作人捐了款,参加了建团的一系列会议,为它发表了文章和讲演。1920年2月,周作人公开刊登启事,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由他主持一切,即以他的北

京住宅为支部地址,他定期亲自接待来访者,答复有关询问,有意前往日本考察新村者,他可以介绍,甚至代办旅行手续。启事刊出以后,究竟有多少来访者,现已不详。但这年4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上记有“毛泽东君来访”。其时,27岁的毛泽东刚刚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他很可能是为新村运动而来的访者之一。工读互助团很快失败了。新村北京支部似乎也仅是一个空名。周作人自己不久也在一场大病之后,消失了对于政治社会运动的热情,包括对新村运动的热情。但是,他一度大力提倡新村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一页。

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青年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等新式的会社,在文化上都很活跃,其活动或多或少都包括文学方面,但都不是纯粹的文学团体。直到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中国才有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他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写实的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周作人被推举在12个发起人中列名第一,《文学研究会宣言》也推他起草。宣言中明确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件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当时,这是对于文学的性质和任务、文学家和社会使命和社会角色的崭新的观念。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人物沈雁冰(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接编《小说月报》,彻底革新,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变成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中国由此有了第一个纯粹的新文学杂志。《小说月报》革新号上的作者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署名文章的第一篇就是周作人的著名论文《圣书与中国文学》。后来,周作

人经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起来,接着不断发展扩大。6月3日,学生重上街头讲演,北洋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有一部分就关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法科那里。周作人即以北京大学教授的身份,与刘半农、陈伯年、王星拱三教授一起前往法科,自称是北京大学代表,来慰问被捕学生,被守门军警拒绝,自下午交涉到晚7时半,终于不得进去而回。6月5日,周作人又在街上遇着学生讲演,群众聚听声援,军警马队来驱逐,周作人也身受马队的冲击,他回来写了《前门遇马队记》,怒斥反动政府是“无知的畜生”,“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宣布“我不悔此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他将此文送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后来,李大钊告诉周作人,警察所曾经到《每周评论》编辑部来查问这篇文章。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他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14日,周作人与李辛白、王星拱等5人以北京大学代表名义,前往警察厅探监,被拒不得见。9月1日,陈独秀在全国热烈声援中出狱,18日,周作人去陈独秀家慰问。

四

1917—1921年这一段时期的“五四时期”,这是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来潮期。周作人在这个时期内,即以上述每方面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当时他的声名甚至超过鲁迅。最近有人回顾五四时期的历史,把胡适、鲁迅、周作人并称为“五四文化三巨人”,倒是比较客观的。

这3人的关系,后来变化很复杂。1923年7月,周作人、鲁迅因兄弟间矛盾决裂,终生未恢复和好。三十年代初,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被推为左翼作家的领袖;周作人则以

自由主义作家代表的身份,与左翼作家多所争论;兄弟两人的矛盾成了思想对立。而胡适则从不谈政治到热心政治,后来同蒋介石完全合作。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以后,主要从事小品文写作,被称为小品文之王,这个名声甚至掩盖了他五四时期理论家、诗人、翻译家的盛名。他的小品文,极“阴柔”之美,鲁迅的杂文则极“阳刚”之美,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并峙的两个高峰。周作人后来还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中国文学史、日本研究、古希腊研究方面,继续进行了广泛的涉猎,融学识为思想,注入小品文中,这又使他与鲁迅一样成为大思想家型的文学家。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之久,北平沦陷,周作人留在北平没有走,全国文化界为他的安危和大节担心。不多久,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之下,他公然附敌,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忿怒声讨;他没有回头,进一步出任伪职,官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0年。解放后,他回到北京。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中,勤奋地做了大量工作,最有价值的是在鲁迅研究和鲁迅资料提供方面,其次在古希腊和日本古典文学名著翻译方面,但所有这些著作翻译都不得署周作人这个名字,而只能署周遐寿、周启明或以其他笔名发表。1967年5月6日在北京八道湾家中去世。

解放后,在“左”的文艺路线之下,周作人一生的成就统统被当作“汉奸文学”,一笔抹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周作人方能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现在他的作品,也才得以周作人之名公开出版。

(责任编辑:仲文)

鲁迅日记

几则

(1917年)

周作人应聘从绍兴来京任教,鲁迅十分关切:

3月7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60……

4月1日,夜二弟自越至……谈自深夜方睡。

2日,同二弟至益昌午饭。

7日,同二弟游留黎(琉璃)厂。

9日,夜与二弟同往伯德先生寓……

15日,……至青云阁饮茶归。

22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

5月6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

5月12日,上午就首善医院。

此时,周作人出麻疹。

5月13日,延D,Crimm诊,云是瘡子。

这期间,鲁迅连续数日告假陪周作人看病,并给作人妻羽太信子去信报告病情,待作人病情好转后……

6月10日,下午同二弟往升平园浴。

7月16日,同二弟往升平园理发并浴。

29日,同二弟至广和居饭。

8月5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茶并午饭。

9月1日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

23日,晚同二弟访季市不遇。

10月7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已。游故宫并观文华殿所刊书画,复游公园饮茶归。

日记虽简略,清晰可见当年鲁迅兄弟的友爱之情。

唐纳与我

● 夏其言



唐 纳

唐纳是我最早的引路人

我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华，一切

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奋起抗日救亡的年头。我那时在一家银行做事，与他的弟弟马继善同事，因而结识了唐纳。唐纳本名马季良，唐纳是他写文章用的笔名。

当时他已是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士，我还只是一个浅薄的银行小职员。但是忧国之心，救亡之忧，使我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告诉我，他有个青年朋友，是个

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他，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我愿不愿，敢不敢接受。我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式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是他的苏州同乡与同学。史枚来后即

同我一起住在原先我单身住的亭子间里。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还具有很深的造诣，我尊他为师长。唐纳三日两头来我家，给史枚带来外面的许多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这样出来了。

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上海版《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我家亭子间里的产品。我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

唐纳玉成我的美满婚姻

我和我的太太这段婚姻，唐纳也起了大作用。

当年我与我的太太在银行的一个群众团体中相识，一见倾心。十分遗憾的是中间有一个大障碍。原来她在早年已与一名富豪子弟订了婚。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认识我以后，认为做“少奶奶”

太没出息，因此坚决要求解除婚约。那时离预订婚期只有半年光景，对方已积极准备，连新房装修、全套家具都已办妥。因此，听说要解除婚约，那名富家子弟当然不答应。我是个穷职员，势难抗衡，一筹莫展之际，只得商诸唐纳。

唐纳真有办法。只见他俯首微思，一拍大腿说：“有了。”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个大公文包，里面塞满旧报纸，把皮包装得鼓鼓的，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自称是受某小姐委托的某大律师，跑去找那富豪子弟谈判。先后去了三次，前两次对方坚持不同意，第三次终于解决了问题。

事后我问唐纳，怎么能使对方改变初衷，同意解除婚约的？他说，无非是晓以利害，告诉他强求的婚姻注定不会美满，还不如大度一些，成全别人，凭他的条件完全可以另觅更理想的佳偶，对己对人俱有益而无害，如此等等。

这还不算，唐纳还想得非常周到，说对方虽然口头同意解除婚约，但在还未正式登报公告之前，要我俩疏远一段时间，勿一起上街，勿一起看电影，勿一起逛公园等等。理由是对方有财有势，为了“出口气”，可能找人对我俩做些报复性的“小动作”伤害我们。

当时他住在圣母院路（现瑞金一路）的一个公寓里。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俩把他的家当作“防空洞”，直到对方公开登报解除婚约，甚至时隔一两个月我俩在报上登了订婚启事之后，上街也是一前一后，相隔10来尺，乘电车，往往她坐头等，我坐三等。这以后不久，唐纳了解到那富家子弟也有了对象，订了婚，他对我俩开玩笑说：“本大律师现在宣布，警报解除。”

1979年，唐纳在远居异域30年后首次回国探望，老友重逢，感慨万千。他拉着我和我太太的手说：“你俩现在都已年逾花甲。”可

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白头偕老了。我当即回答说：“是啊！我俩能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你这位‘大律师’！”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唐纳拉我进入报界

我在银行干了十多年，但后来却成了新闻记者，并将它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这也完全得力于唐纳。

唐纳是个名记者。抗战初起，他成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总主笔和《文汇报》总编辑。

唐纳知道我平时就喜欢给报纸副刊写点小文章，弄点稿费贴补家用。他鼓励我，说我可以成为一块“做文字工作的料子”。

就在他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之初，有次他来我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南京跑一趟，看看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首都情况，市民生活如何，据说也有灯红酒绿的场所，走走玩玩，全部费用由他请客。但有个条件，就是用“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为《时事新报》写两篇通讯，稿费从优。当时我正闲着没有事，就一口答应了。

孔祥熙在上海有个新闻托拉斯，除了《时事新报》外，还有《大晚报》、英文版《大陆报》和一个申时通讯社。我从南京回来后，唐纳告诉我，这个托拉斯的总经理要设宴为我洗尘，包括唐纳在内的报纸、通讯社的几个负责人作陪。

席间，酒酣耳热之际，他们突然提出，说读了我的通讯报道，他们非常欣赏，虽然是客串性质，但完全可以当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唐纳开玩笑说，他们恳切希望我从“玩票”到正式“下海”，去《时事新报》工作。我与几位朋友和家里商量后，我告诉唐纳，就试试看吧，这样一试就是几十年。

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老板是孔祥熙，因而被视为官报。但就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和骨干力量而言，则与国民党御用报纸显然不同。据唐纳告诉我，他进《时事新报》是经过“夏公”（人们对夏衍的尊称）同意的。夏衍是当年地下文委负责人，他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分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以宣传进步主张。唐纳上任后，团结了一批进步新闻工作者，把我这个门外汉也拉去。我就这样正式投身新闻界。

唐纳曾向我透露，夏公对《时事新报》非常关心，不仅帮助修改重要社论，有时还亲自动手撰写社论。一次发生国民党军警双方不买票还争好位子，在戏院互殴的事件，《时事新报》登了一篇题为《看白戏的爹，饶命！》的报道，国民党军方和警方大为震怒，扬言如不交出作者，就要把报社砸个稀巴烂。经唐纳通过孔令侃（孔祥熙的儿子，唐纳和他是圣约翰大学的先后同学）设法周旋，始告平息。

据说夏公得知后，风趣地对唐纳说：“这篇报道矛头不对，要是改为同情国民党军警生活清苦，连戏也看不起，那么敌人就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听从夏衍“不要杀鸡取蛋，应该细水长流”的告诫，报纸的面孔越来越“红”；半年后，孔祥熙终于派了一个老牌特务来坐镇编辑部“加强领导”，唐纳发现难有作为，遂偕同我与女记者麦少楣退出《时事新报》，应邀去《文汇报》工作。

我那时已参加了中共。在《文汇报》期间，把主要精力用来办一个半公开的刊物《评论报》。我不知道唐纳是否知道我的底细，但这位总编辑对我这个部下的“不务正业”，写的新闻比较马虎，眼开眼闭，从未训斥，则是事实。

1947年夏，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封闭，我奉命隐蔽起来。唐



唐纳假扮律师使作者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婚礼上作者向唐纳致谢辞

纳则于次年去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大陆解放后，他去美国，以后在巴黎定居。从此天各一方。

唐纳与蓝苹(江青)

唐纳当年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新闻界颇负盛名。出国后，国内很少有人再在报刊上再公开提到他。倒是“文革”开始后，突然又成为“热点人物”，完全是由于他与“旗手”江青有过一段“姻缘”的关系。

江青原名李维芬，别名李云鹤，来上海后改名蓝苹，从事戏剧工作，偶尔也拍电影，但主要是演话剧。不论她的容貌、外型、演技水平，在当时不过是二三流的演员，但她野心不小，不论上演什么剧本，她都要当主角。

最令人齿冷的就是她撒泼、吵闹，要与王莹争当话剧《赛金花》的女主角。这在当年上海戏剧文化界是人所共知的。

限于条件和水平，她光凭撒泼、吵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赛金花》仍由王莹当主角）。于是，她就“硬”的不行来“软”的，想方

设法拉拢导演等演出负责人。

当时唐纳已是颇有影响的戏剧电影评论家。特别是他手里掌握着好几个报刊影剧评论的阵地，对于渴想成名的蓝苹来说，唐纳当然地成为她最理想的“猎物”了。

我记得清楚，当年蓝苹竭力向唐纳进攻，以至同唐纳打得火热时，史枚曾当着我的面，提醒过唐纳：蓝苹这个女人不简单，恋爱可谈，但头脑要清醒，要冷静，不要唱“小热昏”。但唐纳是个极重感情的人，甚至不无“恋爱至上”的味道，对史枚的忠告是姑妄听之，事后已置之脑后了。

就这样，唐纳与赵丹、顾而已他们3对，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了集体结婚仪式。

事情竟被史枚不幸而言中，果然，前后不过3个月的时间，唐蓝终于分手了。一个是戏剧电影评论家，一个是女演员，双方闹离婚，一些小报当然不肯放过，大肆渲染。这就是当年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所谓“唐蓝婚变”。

几年以后，蓝苹去了延安（改名江青），其后唐纳远去国外，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人们早已淡忘

了。怎么事隔数十年之久，忽然又提起唐纳来了呢？问题出在江青“文革”中当了“旗手”之后，唐纳的这段人生小插曲竟然一“嵌”而成为“防扩散”的黑材料。

1956年，中央某部门持正式介绍信前来外调（向我了解有关唐纳的情况）时，我曾如实提到过这件往事。想不到十多年后这份书面外调材料竟落入江青、张春桥一伙手中，成为所谓的“两大箱黑材料”中的一件，我因此被打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伟大旗

手”的“现行反革命”，坐了18个半月的牢，还被“清除”出党，送干校监督劳动，差点送掉老命。

“四人帮”粉碎后，我得到平反，但唐纳却被套上了另一种精神枷锁。有关唐纳的流言越传越多，仿佛江青既是坏人，那么30多年前与她一起生活过3个月的唐纳也一定不是好东西。

有关唐纳的种种流言，尽管光怪陆离，难以置信，但言之凿凿，活灵活现，而且愈传愈烈，愈传愈广，好像煞有其事似的。

譬如传闻他在巴黎开设的餐馆二楼辟有精室，内悬当年蓝苹与他的各种照片，借以招徕顾客，收费比下面餐厅要贵一倍。1979年他来上海，我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唐纳说：“我吃饱饭也没这么空。”

又有一条“消息”说，他在“文革”中曾经特地跑到香港去放映蓝苹主演的电影《王老五》，因为在那部片子里蓝苹饰演“王老五”的老婆，扮相难看，形象丑恶，说唐纳为了发泄对江青的积怨，故意出出她的丑。我问：“这是真的？”他反问我一句：“你说呢？可能吗？”他说：“根本没有的事，我这几年从未

去过香港。”又传说他与《红都女皇》作者、美国作家维特克，合写过一部关于他与蓝草从相识、恋爱、结婚到“婚变”的书，并因此发了洋财。唐纳说，维特克确曾专程去巴黎找过他，但被他严词拒绝了。他对我说：“这不仅太无聊，简直是无赖了。我马季良不是这种人！”谈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激动。事实上他听到的流言，远比我听到的多，正如他在1988年6月19日给我的信中所说：“港、台、美等地刊物，至少在十多年来经常刊载有关我个人的文章，不是捕风捉影，便是无中生有……就像《争鸣》曾说我逝世一样。”

那么唐纳的态度如何呢？他在信中说：“我不断地收到，买到，看到，也许是正因为‘材料’太多，时间太长，使我变得‘盲目’了，只有一笑置之！”

就在收到此信之前不久，中国大陆某家刊物又发表了一篇涉及三十年代唐、蓝婚事的文章，后来他在法国看到了，当时已在病中，头晕目眩，喘咳终日，“执笔颇感困难”，但仍于7月31日给我来信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只有小报记者才会把我年轻时那很短的一段私生活紧抓不放，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卑鄙，下流，黄色，肉麻而已。若是你要去一一声明，更正，抗议，那你就别想再过安静的日子，

而且更帮助他们起宣传和广告的作用。”

唐纳为人，一如玉树临风，他的“一笑置之”、“不屑一理”，显示了他高洁自许、坦坦荡荡的心态。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上面引的那些话，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愤激之情，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对新闻事业 唐纳一往深情

唐纳定居巴黎后，晚年一度经营餐馆。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新闻工作，始终关注着国内的新闻事业。

1986年，上海的一些老报人开始筹建“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是年冬，我在信函中曾提了一笔，他当即复信表示赞成。“老记协”成立后，我忝任会长，他特地来信向我致贺。1987年，上海美影厂导演章剑萍女士随一个电影代表团访法，在巴黎，中国新闻社驻法记者站设宴招待，唐纳夫妇也应邀出席了晚宴。

席间，章剑萍与他邻座，当他得知章过去曾在《解放日报》工作过，就问她：“《解放日报》有个夏其言先生你认识吗？”章说：“怎么不认识，我的老领导嘛！”唐说：“那好，据说上海成立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我也是个道地的老新闻工作者，可以做个理所当然的会员吧！”当场掏出一张500法郎的钞票，请章转交给我，作为加入“老记协”的会费。

章剑萍回国后，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记述此事，当时我在香港旅次，返沪后即提交会长办公会议讨论，会上一致通过接纳唐纳为“老记协”特别会员。1988年3月，任嘉尧兄访法，我特地托他带去“老记协”送给会员的两本书、会刊《新闻老战士》和我自己的一枚“老新闻工作者”纪念章。任嘉尧回来告诉我，唐纳非常高兴，当即把纪念章别在西装衣领上。

唐纳并没有当挂名会员，信中不时为“老记协”的活动出主意。1988年4月3日来信，建议“老记协”可以开一个专门买卖旧书刊的



1936年，唐纳与蓝草（箭头所指，蓝草后改名江青）、赵丹与叶露茜（右边一对），加上顾而已的一对（左一、左二），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结婚仪式。中为证婚人沈钧儒。

书店。因为“经过‘文革’浩劫后，书籍文件散失“难以计数；也因此寻找失落了书籍者为数必多，既为大众服务，又照顾到经济效益。巴黎有一家这样的书店，门庭若市”。

他说的巴黎那家书店“门庭若市”是有根据的。因此1983年北京《中国日报》的金铿然先生出访法国，我曾请他持信去巴黎找唐纳，托其为我的一位朋友代购一本绝版多年的法国小说原著。他跑遍巴黎所有书店都没有，结果是花昂贵的代价在那家旧书店买到的。

唐纳对国内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改革也很关注。1988年6月19日信中说：“关于新闻自由问题，当然绝对赞成，只是目前时机尚未完全成熟耳！”这使我想起，早在1985年北京饭店一起吃大闸蟹时，他同我说的那几句话，大意是：光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不行。

永远不会实现 的一个愿望—— 写自传

唐纳晚年最大的宿愿是写一本自传。

我最初听到唐纳想写自传是1985年，那是他羁留海外40年的第二次回国，在上海、在北京都同我谈起写自传的打算。他说，那么多的流言蜚语和造谣文字，要一桩桩、一件件都写文章辟谣，那非但写不胜写，而且也毫无意义；写一本自传或者回忆录就可以了。他说正在动手搜集资料，必要时请我帮忙。

唐纳最重视的是他在三十年代后期四十年代初写的3个剧本：《中国万岁》、《陈圆圆》、《生路》。这3个剧本都是以鼓吹抗战为主题的。信中告诉我，1979年老友叶露茜女士已帮他每本影印了一份，当时未及翻阅，不久前发现《中国万岁》缺印第81和第101两页。

他托我再请叶露茜设法补印两页寄给他。信中还说：“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她能代我找到这3个原本，即使登报高价收买也在所不惜。”不久，友人任嘉尧兄访法回来，告我唐纳也托他办这件事。过了3个月，剧作家杜宣、叶露茜夫妇找到了其中《中国万岁》和《陈圆圆》两个原本，《生路》原本则始终未见。直至1988年10月，任嘉尧兄才从友人处觅得了《生路》，可是已无法寄达唐纳本人了。

唐纳还要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蓝苹（江青）的一封长信。据他信中说，蓝苹给他的信有两封曾公开发表，他都已收集保存。他也有一封给蓝苹的公开信，大约是1936年6至7月间发表于济南的一张大报上，几天后由上海《新闻报·本埠增刊》转载。

他信上说：“我这封信可以说明若干的问题，也可以使后人对江青多一点了解。像现在这样，光有她的一面之辞是不完善的。”托我代为寻找。过了两个月，6月19日来信说，国内有人寄去1936年7月10日出版的《沪光》杂志上刊登的一封信，但是“内容莫名其妙，实非真函”。正当我在托人代找真本，尚无消息，却非常意外地传来了他突然病逝的噩耗。

自传或者回忆是永远不会有。但是可以告慰唐纳于地下的，是唐遗孀陈润琼女士花费了两年多时间，搜集了唐纳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遗作，编成《马季良（唐纳）作品选》，已在中国大陆付梓。

这部著作的问世，将为现代中国戏剧电影史和中国新闻史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料，其中不少材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也是颇有教育意义的。

（夏其言：上海老新闻工作协会会长，《解放日报》顾问，上海老年报社社长）

（责任编辑：刘文）

姓名趣谈

● 史文贵

宋宰相寇准下乡巡视旱情，遇一饱学隐者，吟一联语要他作对，“旱高地田禾必干”，意很浅显，其中用谐音隐藏3人姓名：汉高帝、田何、比干”（汉高帝即刘邦，田何是西汉文学家，比干是商代名臣），有道是：会者不难，寇准思索片刻，说出了下联：“下大雨麦子管种”！那隐者不禁拍手叫绝。原来，联语不仅对得规范工整，而且其中也用谐音隐藏3人姓名：夏大禹、墨子、管仲。

人的姓名，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称符号。既为符号，似乎总是枯燥无味的。例如，十九世纪时，美国底特律市有一对叫史汀克的夫妇，生了3男3女，名字分别叫“儿子1”、“儿子2”、“儿子3”、“女儿1”、“女儿2”、“女儿3”这不就是道地的符号了么？另有一对夫妇，给3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约瑟夫”、“再是”、“又是”。他们的父亲说，如果再生男孩的话，就依次取名叫“还是”、“总是”、“怎么又是”。这就有点幽默感了。

中国人的姓名，不同他国，若要考究起来，则更是趣味良多。

“姓”究竟起源于何时？大约可推到母系社会。那时的姓，是氏族（或部落）的标记，它标志着一个人是由哪个氏族出生的，故称为“生”。由于母系制度，知母不知父，所以加女字边，这便是“姓”的由来。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由氏族的标记逐渐演变成为家族和具体人的称号，但仅限于首领人物，一般平民是没有“姓”的资格的，如《左传》中的灵辄，《庄子》中的庖丁、匠石等“基层人物”都是有名无姓。到了后来，大家都有姓了，但姓的本身又有了尊卑贵贱之分。汉代是刘家的天下，刘备就因为一个“刘”字，而在当时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得了不少便宜。封建皇帝为了收买心腹，还把得宠的别姓大臣赐为己姓。如唐开国元勋李勣原徐姓，那个“李”字就是皇帝赐给他的。而一经皇上赐姓，那就是无尚殊荣、高人一等了。再到后来，腰里没有几个“子儿”的穷人，甚至无法与有钱的同姓了。如住在未庄土谷祠里的阿Q，“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赵太爷的儿子）长三辈呢。”但他这么一说，第二天，就被地保叫到赵太爷家，赵太爷气得“满脸涨朱”，“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本家？’”接着，“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名字的由来也同样久远！上古时，婴儿出生3月即由父命名，男子20岁举行冠礼时取“字”。那时候，名、字的意义有相互呼应的联系，例如为我们所熟知的孔夫子，名丘，字仲尼，就是以曲阜之东的尼山取义的。从发展趋势来看，有“字”的人已逐渐少了。

然而，在古代，这“字”却是等级森严，尊对卑称名，卑者自称

也称名，对平辈或对尊辈则称“字”，称字表现尊卑关系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在古代交往和书写中，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则要“避讳”——用改字或缺笔的办法回避。

秦庄襄王名子楚，秦朝就把“楚”改为“荆”；汉文帝名恒，恒山就成了“常山”；唐太宗名“世民”，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就只好把“民风”这个熟透了的词改为“人风”了，虽然拗口难读，却也无可如何。更为冤枉的是，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想考中进士，不幸的是，就因为他的父名“晋肃”。“晋”、“进”同音，有人就一口咬定：不避父讳，不得应举。当时的另一名人韩愈知道后，很为他鸣不平，特地为之作《讳辩》，大声疾呼：“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为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的辩解可谓入木三分，但终究没有发生作用，李贺后来还是被迫放弃了考试，27岁就郁悒而亡。

李贺因为避父亲的名讳而不得为官，有人却已经捞到了一官半职，又因“自讳其名”而丢了官的。宋仁宗至和年间，有一个叫田登的做了应天知府，这个官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高干”（相当今天的省辖市市长），但他却“自尊自重”，因官而自讳其名，不许下属称“登”和一切与“登”同音的字，这下祸事就来了。这年元宵节前，府吏把历年放灯的旧例具文上呈，请他批示，此公大笔一挥，竟然批了这么几个大字：“依例放火三日！”——真令人啼笑皆非！但田老兄万万没有想到，他把“火”，却因此烧掉了自己的乌纱帽！直到现在，还因为他留下了这么一句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贻笑千古。

但也有因为姓得好而官运亨通的。据说，慈禧太后某次作寿时

恰逢科举殿试，慈禧首先浏览了一下贡士名单，见其中有个名叫“王万寿”，“龙颜大悦”，这不是给自己祝寿来了吗？“老佛爷”心里一高兴，哪里还顾得再按惯例考什么“时务策”之类，朱笔一点，王万寿就成了状元！这真是糊涂时代出糊涂官，文章写得好，倒不如名字起得巧。

在明代，也有个在姓名上碰得巧的故事：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李梦阳，有一次主持考试，碰到一个年轻考生，恰恰也叫“李梦阳”，被人犯了忌讳，文学家老大不快，于是就出一联向那个“小李梦阳”索对，意欲以此相难，逼其改名。他这上联出得委实厉害：“藁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能和我同姓同名！然而，这“小李梦阳”虽是后生小辈，却非等闲之人，他略一思索，立即扬眉应对：“魏无忌，长孙无忌，尔无忌，吾亦无忌”！同样借两个名人的姓名生发开去，朗朗地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姓名问题上，你没有什么忌讳，我也没有什么忌讳！一语惊人，不卑不亢！小伙子非凡的才具学识，使原先颇为自负的文学家为之倾倒，他后来不但没有让其改名换姓，而且向皇上保荐了这位与己同姓同名者做了官。

在大千世界中，有意借同姓同名大做文章，希图从中渔利的，却也不乏其人。黑旋风李逵名声显赫，就有个李鬼借“逵、鬼”音近而在黑松林中冒充李逵剪径害人，就是其中一例。但真假李逵的故事也许是施耐庵的妙笔虚构，不足为凭。然而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李鬼式”的人物确实不少。纵观一部社会史，无有一页无姓名，有的姓名香千古，流芳百世；有的千古落骂名，遗臭万年。而人之名好名坏，绝非天然，究其原因，无不取决于自我！（责任编辑：刘文）

为“恶毒攻击”罪冤死者李九莲昭雪

● 戴 煌

1980年秋天，拨乱反正的急鼓仍在冬冬响，江西鄱阳湖畔的监狱中有人托可靠人士，向新华社邮来一封挂号信。信中透露：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的青年女工李九莲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毙。12名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

我当时在新华社国内部任记者。收到了这封信，不禁愕然。如果所言属实，这是又一桩张志新式的骇人听闻的大冤案！1980年11月下旬，我奉命飞往南昌进行调查。

到达南昌后，在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和省高级法院办公室的支持下，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读完了约二百多万字的案卷。我又去了赣南、赣北，察看了李九莲求学、工作、拘禁、劳改以及被处死的场所，访问了有关人士，历时共一个多月。所获材料证明，那封狱中来信所说基本属实。

这位被冤杀的女青年，1946年出生于赣州一工人家庭。其父是老共产党员，母亲为家庭妇女。李九莲在读书时十分刻苦，先后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在赣州市第三中学，被选为校团委宣传股长和学生会学习部长。由于善于钻研问题

和独立思考，在同学中有很高威望。

1966年，出于无限信仰和崇拜毛泽东，她满腔激情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的唯一女生副团长。她参加过武斗、绝食和静坐示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被选为赣州市、赣州地区、江西省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一度对“批判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达到十分狂热的地步。

1968年，她与同时高中毕业的少数出身较好的同学，被分到赣州市的一些工厂当徒工。真正地接触到社会实际，她很快就发现很多问题 and 现象，与自己“造反”时想象的不一樣。正是在这个时候，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又刮起了一场“三查”风。

这场“三查”风，就是所谓的“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在“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的口号下，捉拿“叛徒、特务、反革命”战斗队来去匆匆，私设的公堂和牢门比比皆是。刑讯逼供成了“最最革命”的主要手段。全省各地成千累万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夜之间就定为“反革命”。这一切，更啞痛着李九莲的心。她不时扪心自问：为什么要搞

“文化大革命”？

1969年春天，她为此写下了七千多字的30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她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师老将们，深表不平，说这是“中央不是按历史来决定问题的，而是按你对××的态度而定的”。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也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对毛泽东也有攻击性的言论。

她时而悲愤厌世，时而又亢奋探索，并表示“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

1969年2月29日，她给高中时的同学、在福州部队当兵的恋爱对象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经过半年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时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

李九莲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

强附会”，“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

最后她告诫对方：“此信万勿给予他人”；下署“你明白的人”。

然而这个应该“明白”的人却把这封信交给了上级，“上级”如获至宝。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紧急侦查，在1969年4月30日深夜，李九莲被抓进了赣州市公安局。李九莲无所畏惧。在为她举办的“单人学习班”上，她坦然地复述了自己的许多“活思想”，并交出了信件底稿和日记。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支左”部队的负责人认定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矛头是“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是直指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在刘少奇的罪状公布以后为刘少奇进行辩护的……按毛主席的《公安六条》，她全都够格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畏罪潜逃，摔死于温都尔汗，按说，李九莲应该无罪开释了，但是她继续被关押，直到1972年7月，才被开释出狱。中共赣州地委给她做的结论是：“性质是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罪，但交代态度好，出身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外县安排工作，拘留期间不补发工资。”他们并派人告知李九莲：你还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还可以革命。

瘦小孱弱的李九莲信以为真，欣然走出牢门，回家辞别了父母，到了毛泽东当年搞过农村调查的兴国县画眉岗钨矿挑矿砂，每月“工资”16元。

三年零三个月的拘禁、拷打、虐待，摧残了她的健康，使她有心而无力从事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附近一所中学因为没有英语教师，孩子们都上不了英语课，她要求去补这个缺，可有关人员回答说：宁可废孩子们的外文课，也不能答应她的请求。



李九莲

李九莲这时痛感赣州地委和公检法部门欺骗了她、损害了她。她接连向赣州地区、江西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到北京上访，1973年11月，公安部和江西省公安厅，把李九莲的申诉状转到赣州地区公安局，要求对她的问题必须进行复查。地区公安局拖延了3个多月，一位负责人才在这份申诉状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上面批了四个字：“此信暂存”，然后束之高阁。

1974年春天，李九莲把一张《反林彪无罪》的大字报，张贴在赣州公园的围墙外，要求赣州地委和公检法机关为其修改“现行反革命”、“敌我矛盾”的结论，为她的3年冤狱彻底平反。

这一举动，立即涌起广泛的同情与声援的热浪。赣州市和赣州地

区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学生、市民、知识分子，自发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下简称“李调会”，纷纷集会和张贴大字报支持李九莲。但地县不但断然拒绝了这一情理兼备的要求，反而以“反革命翻案”、“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等新加的罪名，于1974年4月，再次拘捕了李九莲，将其押往兴国县，由兴国县县委及县法院审理处置。

很多人都明白：这是个大冤案。兴国县委领导拒绝受理。他们推辞说，李九莲在赣州市张贴大字报，她的家又在赣州市，这理应由赣州市研究处理。两地互相推诿，“李调会”的众多群众又涌向拘禁李九莲的所在地，强烈呼吁释放李九莲，但是在江西临时掌权的省军区某负责人，再次以省委名义下令：不准释放李九莲！

这样，赣州地委随之派人去兴国把李九莲押回赣州。但在1975年5月，赣州地区“公检法”仍以兴国县人民法院名义，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至此，李九莲与赣州地委及地区“公检法”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他们认为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法西斯专政，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并立即绝食以求一死。从赣州市的第二监狱，到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她断断续续地绝食73天。每当她生病垂死，人们对她强行鼻饲牛奶米汤时，她总含糊不清地吐出一些隐隐可辨的话语：“让我死！”“给我一粒子弹吧！”

1977年1月底，劳改农场的犯人们按照一年一度的惯例，进行对上一年度的“年终评审鉴定”。李九莲在她的自我鉴定草稿上这样写道——

“毛主席历来提倡党的集体领导……华国锋却把党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无视党的领导作用，妄图用暴力的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借口批判‘四人帮’，把党搞乱了……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损害了‘大官们’的利益，在他们心里积下了怨仇。现在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黜的人物，被批判过的东西，又在华国锋的招幡下粉墨登场……”

很显然，李九莲的这份尚未写完的鉴定草稿所持的观点，与她第一次被捕前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与否定的认识是截然对立的。她为什么会这样，本是不难明辨的。

1977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7]”6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

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1977年4月，珠湖农场党委，就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给上级领导单位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历数了李九莲的一切“罪行”，强调了李九莲“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其罪恶达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份报告，依次得到了波阳县法院和波阳县委、上饶地区中级法院和上饶地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的认可。

但在省委常委会讨论是否作同样批复时，发生了一场争论。省委常委、秘书长王泽民、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认为，对李九莲的本质及其思想言论，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应该说，这位女青年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忧国忧民、勤于思考、要求上进的。但她不成熟，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或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有所反复。这是很自然的，应该予以谅解宽容。王泽民、张力雄等不同意见判处李九莲死刑。

但是，讨论到最后，到会的省委常委中的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九莲被押到赣州得知如此判决，却漠然视之。她既不上诉，也拒不签字，只在一小片粗劣的手纸上，草草留下了一首题为《真理的花环》的小诗：“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武装自己，同时也得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她又在另一小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

1977年12月14日上午9时，赣州市体育场举行了三万余人的公审宣判大会。主席台下先站了一排戴着手铐的“李调会”主要成员。

最后押进会场的，是五花大绑的死囚犯李九莲。对她的《判决书》一念完，就在她背上插上亡命牌，咽喉紧勒，口塞毛巾，架上死囚车游街示众之后，被枪杀于赣州市西郊一座小松林中。她的亲属不敢前往收尸。

一个月后，即1978年1月，曾是“李调会”的广播车广播员、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也在南昌郊区被处以极刑。

1978年6月至10月，又有一批“李调会”人员被当作“四人帮”余党的重点人物被抓进牢房。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以上，其中被判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60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机关、学校、厂矿、科研部门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级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600人；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还被迫自杀，终于形成一个殃及广大民众的大冤案。

1978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结束。全会决定全面复查和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9年4月，面对这份已经传达到基层法院的中央文件，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再催促下，赣州中级法院才不得不复查李九莲大案。但地区中级法院仍拒不执行上级法院的指示，仍然“维持原判”。

1980年1月29日，在与李九莲案有关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等人的不断申诉下，江西省高级法院再

次指示赣州地区中级法院进行复查。法院于当年3月15日,写出了《关于李九莲现行反革命一案的复查报告》,坚持认为李九莲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应予维持原判”。赣州地委常委会“讨论”地区法院的这个《复查报告》时,作出决定:“同意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维持原判不变。”

面对赣州方面的这种态度,江西省高级法院调李九莲案的全部案卷,进行全面复查,结论认为,1969年和1974、1975年对李九莲的处理是错拘、错捕、错判,1977年的处理是“轻罪重判,错杀。但李确实又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9月17日,江西省委研究后决定:“同意法院意见,属犯罪活动,错杀。撤销原判。李有罪,但不另行判刑。”

鉴于如此现实,我决定到赣州去进一步采访。

在赣州,李九莲当年学习过的学校、当学徒工和第一次出狱后劳动过的厂矿,以及她被关押过的看守所、监狱的人员,都积极协助我调查并提供我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对李九莲问题的分析,与王泽民、张力雄等在省委常委会上的阐述几乎完全一致。但赣州地委和赣州法院的有关同志,仍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即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因为“谁当领导她就反对谁”。对于李九莲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张贴《反林彪无罪》大字报以及要求平反活动,由此引发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给地委造成的种种不快,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他们甚至说,“如果她想一死了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骂毛主席呢?”

我在采访提纲中,列出了李九莲案卷中出现的几个案情不明的人名,其中有的已死于狱中,我想弄明白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但他们以转达地区法院对采访提纲

有意见的口气说:“法院同志认为记者屁股坐在什么地方,是来干什么的”?

看来,这个大冤案的彻底平复,非尚方宝剑不行。

1980年除夕夜晚,我飞返北京。对所得素材经数日梳理,写出一篇《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这篇《内参》经领导审阅后,送往印厂发排。

1月25日,那篇《内参》稿一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作了这样的批示:

彭冲、江华、赵苍登同志:

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效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

彭冲当即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

沉重的铁盖终被掀开了。

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遵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彻底复查李九莲案,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3月18日,省委常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作出了对李九莲案进行平反纠正的决定。

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1981年秋天,为彻底处理好李九莲一案受牵连的众多人员的善后事宜,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刘复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冤案。李九莲在那样的时候就开始反林彪,不简单!后来她批华国锋,是

因为绝对相信毛主席的缘故。她身陷囹圄多年,不了解外面的实际情况。这当中有些错误,完全应该谅解她……她对小平同志的认识有错误,说了一句不恭的话,这也不算犯法。这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算反动思想。她长期接受的是“左”倾思想的熏陶,后来又是长期被无理关押,这种思想没有来得及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她没罪。

刘复之接着说:“这个案子大,株连多,牵涉面广,这个案件的处理中犯了错误而今天仍在台上的人,要多做工作,促使他们自己去彻底改正。对受害的同志,也要多做工作。另外,骨子里并不同意中央和省委对李九莲本质的看法,仍然坚持认为李九莲是什么‘现行’或‘铁杆’的人;还有明知自己错,但为了保持‘永远正确’的面子,不得不强拉硬拽、胡拼乱凑一些理由,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待机报复的人,都还有一些。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刘复之的这种分析,很有预见性。1983年,在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赣州地区果然出现了“继续打肿脸充胖子以待机报复的人”,把已经恢复工作的原“李调会”的一些成员重新抓了起来,与那些真正的刑事犯混杂在一起,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这些人被新加的罪名是:不服从妥善处理,上访闹事,漫骂领导,传阅有关“李案”处理和调整工资的“机密”文件,等等。

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李九莲的冤魂将得以告慰,“李调会”的案子被翻了过来,受牵连的千百人也总算喘了一口大气,随后全国当时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被处死的其他冤案,也由此一一得到了平反纠正。

(责任编辑:萧 徐)

人祖伏羲考略

● 段向群

东方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华夏乃至华民族的根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我国原始先哲的智慧依据又溯源何处?历史犹如一道道沉淀淤积的河床,各种图腾说、神仙说、山经海纬,无不残存着神文化色彩,这使人类学及人类发展史陷入一种神秘的虚幻之中;非神化的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在哪里?有否与人类自然规律相吻合的所谓的“三皇五帝”?人祖伏羲是神还是人?应该有其科学的定论,这是确立和拥有文明的基本点。

伏羲与大地湾遗址

伏羲氏被先民奉为三皇五帝

之首。“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说,伏羲同时又算是“医祖”。

《史记·三皇本纪》载:“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德于地,傍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创嫁娶,以偁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戏氏。”

成纪,今甘肃秦安,位于渭河支流葫芦河,属秦岭南麓气候温宜的丘陵地带,新石器晚期古文化大地湾遗址氏族社会(距今4900至

7800年),就在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分布在清水河与阎家沟水交汇处的第一、二、三台地上,总面积约达32万多平方米,共发掘清理房址200余座,窑址30多座。这是西北伏羲故里出土的具有仰韶文化时期特征的史前人群部落的地域,8000余件出土器物明显地反映当时生产工具中出现了加工精细的复合石器以及精小的骨制品,也出现了红陶、灰陶和彩陶,特别是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圆底鱼纹彩陶盆,三人浮雕器等工艺品。那个时期已出现彩绘图案和刻划符号,可以说这样一种史前文化氛围给中国最早的大发明家伏羲



伏羲庙先天殿

氏奠定了理论与物质的基础。

伏羲出生年代有两种具有代表的说法,一是史记的共和元年纪法(即周厉王被逐,周召二公行政号曰共和之年),伏羲生年约在共和元年前1897年至1981年(西历纪元前4200年或4284年),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时期据安特生的推测为西历纪元前3500年,可以推断大地湾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及建筑,应是伏羲氏早年及创造发明的活动场所,从考古学及地质学角度,这种文明的吻合是符合某种生态规律。大地湾伏羲氏部落的衰落与毁灭,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气候变异,二是外族入侵,三是举族南迁。其中举族南迁,因与前两种原因互为因果。

从原始史料考证,伏羲氏之母华胥氏应是四川阆中人氏,她与部落同往秦岭迁徙,途经甘肃天水秦安县大地湾风姓部落,与风姓部落首领野合,华胥氏受孕于仲夏,故伏羲生于第二年春。

华胥氏临产在大地湾第二台地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址,面积约直径四至五米之间,室内有小火塘,此时,氏族社会,经缝人氏到有巢氏的早期文明发展已有了长足进步,室内已出现了缸罐、盆、瓶、尊之类的家用器皿。也出现了弧线、三角、条纹、蛙纹、宽带纹并有几何图形,有黑色、白色和朱色彩纹图案。

伏羲氏的创造发明 及贡献

伏羲氏所处的环境是仰韶时期的氏族社会高度发展和初期原始耕作的收获期,他是风姓氏族首领之子,自然享有许多生存特权。他从小就较系统地接受巫士的教育和行医疗疾的家传,他知晓先人在岩石或桦皮的载述,也持之以恒

地在那林海茫茫的秦岭丘脊,仰观着日复一日的日月星辰与白昼的瞬息变化。根据日出月落的自然规律,渐渐衍生出一种后人称为“八卦”的演绎图,男乾女坤,阴阳雌雄,那轮回旋转,生生相息的太极图腾,由此而繁衍拓展了近五千年,这种中国古代第一哲学的易学便诞于伏羲之头脑。

伏羲经常代其父替族人疗伤,自己发明了9种极细和极锐利的磨制石针和青铜针、竹针,并开设了仰韶时期大地湾氏族社会第一家针灸诊所,而且,人类最早的经络穴位也是伏羲从观察人象所总结出来的,其后的“三皇五帝”皆为名医或名巫,亦受百代之王伏羲的影响。

伏羲是第一位了解病从口入的医学哲人,当时,火的发现大地湾的先民已常进食熟食,但,仍多用手撕把抓,食垢不堪。伏羲便根据地方天圆的物种规律,用石刀割制了竹箸,也就是今天华人使用的筷子。

伏羲精通天象地理,也擅长岩画,当时人们把结绳记事用于法政管理。但,因其方法过简,常有疏漏,伏羲便由鸟兽花木造形绘画形式,总结出许多极富观察力或表达的象形文字,并统一其文字的作用和含义。

有了象形文字,便有了书契的记事方式,伏羲教会先民用象形文



伏羲像

字在桦皮或兽皮上书写文字以表达或记述人及事物,人们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流传。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 社会的文明纽带

伏羲与其后的神农氏、轩辕氏不同,他是一位推崇王道的和平使者,从传略考证,伏羲时代男耕女织,狩猎制陶,游牧迁徙,礼尚往来,而他作为西部渭水流域包括马家窑氏族和半坡氏族共计北方37个氏族社会的精神领袖,他是从不以武力征伐杀戮,涂炭苍生的伟人,而他由刻符记事衍化而成的八卦标志,《离》卦,造鱼网,《益》卦,造农具,《涣》卦,造舟船之类,无不是由伏羲的发明创造。

伏羲氏的诸多创造发明和贡献是父系氏族社会崛起的因素之一,男性部落民从狩猎到鱼耕,对



生物物质和财富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因此,氏族意识由对女性生殖膜拜嬗变为对男性力量的崇尚。

人因生存而有经济的组织,因生殖而有社交的组织,原始部落群就起萌于这两种凝聚作用。同居群婚,使母系氏族社会根深蒂固地陷入一种荒谬绝伦的群居放纵之中。女娲氏是最早的婚姻介绍所所长,却对群婚群居熟视无睹,乃至成为母氏社会强有力的庇护者。在异性氏族权力的转换同时,伏羲首倡一夫一妻制,即同族同姓不同婚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最早的优生学。伏羲还根据一夫一妻婚配的严肃性与重要性,开创了人类婚丧嫁娶的礼节,并法定礼品为婚嫁的信物,改变了先民们因循守旧的观念。伏羲还用八卦推演为占卜,使人类有了决策咨询的工具。伏羲还擅长烹饪,是位极有创新的厨师长,是最早让人们用野蕮山姜和树椒以及盐等烹制美食的美食家。

伏羲有感于人们对生活时间观念的模糊,便身体力行地设置了元旦这个溯源古老的节日,开创人类的第一个历法。伏羲从燧人氏的钻木取火演变出用石镰取火的先进方法,还发明了五音六律,发明

了5弦的琴瑟,他经常随身携带曲尺,用以度量方位与尺寸。而最早的围棋亦始于伏羲,他创造围棋还不仅是为了娱乐,更重要的是他用围棋的法则,作为各部落间分配利益和权力范围的仲裁手段,以此消弥或平息了大动干戈的纷争,使人类首次有了和平共处的手段。

播火者、跋涉者、 以贝行钱的始商

伏羲成为西北流域父系氏族部落首领后,他的创造发明使渭河流域的先民部落的生产力产生巨大飞跃,尤其是“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鱼”,使极原始落后的鱼耕作业,得到质的改观,从而大大推动了原始部落初级农业的发展,使原先的狩猎漂泊的唯一生存形式大为改善。

伏羲还教会当地先民学会驯养羊、猪、牛、狗和马,并运用八卦原理,发明了最早一辆轮状大车。在伏羲以前的祖辈已发明了石斧、石铲、石衣、石锄和陶刀、骨锥、及骨凿等,这对伏羲的创造发明奠定了较优越的物质基础。那时,先民

们已普遍种植和食用一种由狗尾草培植驯化的粟谷,即今天的小米。

中国的货币起于何时?年限很难断定,只有一句捕风捉影的说法:“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此种提法是不妥的,因仰韶时代的冶炼术还未出现。黄帝时代虽已出现冶炼红铜,铜的造价和价值极为昂贵,还不足以作为制钱。而玉的开采因其质地坚强,也数量有限,都无法成为当时理想的流通货币。而极有观赏和保留价值的贝币,作为父系社会主要的流通货币还是较为理想。贝币的出现,其轻灵,极富装饰的特点便渐显其优越性了。伏羲并不限于自己的发明创造所取得的区域性氏族社会的局部利益,并勇于进取与开拓,他考虑当时渭河流域人口增殖的密度和气候变异的客观生存影响,以及周围的强大的母系氏族的攻击和骚扰,他决定举族南迁,如同播火种一般,沿着渭河流域经古老而漫长曲折的黄河,翻越崇山峻岭,义无反顾地去寻找更富庶更辽阔的生殖地,去那里繁衍人口,传播文明,创造社会。伏羲氏的平凡而伟大,正是在于他决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或吃老本,他追求大公无私的氏族社会的道德范畴。

长期以来,贡奉人祖伏羲为神仙的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不敢肯定伏羲的存在,因为神仙列宗是野史,而确立其为人物,便没有哪个正史愿意使这位空前的文明大帝伏羲走下神坛了。

伏羲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特异的想象力,但他的思维并没有脱离或超越那个时代环境。

史前社会的原始部族时代造就这位终生不倦创造的伟人,他的功绩在于坚毅地改造和推动了氏族社会的拓展。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中国制造金属管形火器始于何时？

● 朱润轩

1132年，宋朝陈规在守卫德安时，发明了用竹子制造的管形发射火器，武器史家认为：管形火器是现代枪炮的鼻祖。继陈规之后的1259年，寿春府也制造了用竹子能发子窠的突火枪。那么，中国用金属材料制造的管形火器始于何时呢？

据《光明日报》报道：武威出土西夏制造的世界上最早的铜火铳，这尊铜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炮内还遗存有0.1公斤火药和一枚直径为8厘米的铁弹丸。

元代蒙古族灭了西夏，金属材料制造的铜管形火器就成了蒙古族的战利品，当时蒙古族进军中亚时就使用过这种管形火器。1220年，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都城马尔干，城破之时，城内53万军民被杀。当地有一幅历史画：一尊火炮

的形状接近现代火炮，火炮的旁边还有两个轮子，是牵引火炮用的。这尊火炮有力地说明了在马背上作战的蒙古军已吸取西夏火器的先进技术。

到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进攻日本时，都使用过铁火炮。这种铁火炮是一种什么样的火器呢？

日本人称元军侵略日本为“文永之役”。参加这次战役的有一个叫做竹崎季长的日本军人，曾目睹元军使用这种“铁火炮”，战后他让一个画家将这次战场情况画下来，画名叫《元军袭来图》。图中清楚地画着铁火炮。由于不懂美术的兵器史家冯家升的误解以及现代军事部门又照搬冯家升的错误，使这一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近来通过阅读日本这一历史问题才得到解决。《日本通史》云：“20日，元军占领博多西的赤坂，并在博多东的笥崎登陆，使用了一种每次能发出数十枚球状铁丸的新式武器，日本骑兵勇猛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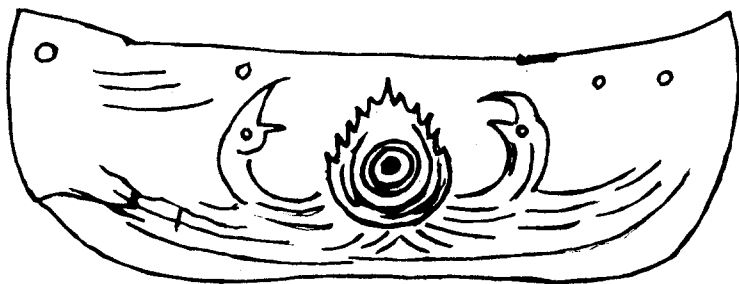
这种“每次能发出数十枚球状铁丸的新式武器”不正是管形火器吗？因此，我们断定，元军进犯日本时使用的“铁火炮”是用铸铁材料铸造的管形火器（它的形状见图）。说明了中国自公元1220年前就使用金属材料制造管形火器，比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代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的铜火铳要早110年以上。

（朱润轩：铸造工程师，中国铸造史专题委员会委员，著有《兵器史》。）



元军攻战图

华夏文明和龙凤文化



● 谢世俊

华夏文明,或称炎黄文化、龙凤文化,它是中华各民族祖先的共同创造,历史上曾对人类文明有过极其辉煌的贡献。在东西文明加速融合为地球人类文明的今天,也是人口最多、希望很大、正再度走向辉煌的一种文明。

华夏文明的几个重要特点

一、华夏文明最本质的特点是适宜气候下产生的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肥沃的土地,适宜的雨量、温度、光照,具有分明的种植季候。最主要的成就是对植物的驯化。按照卡尔·奥·索尔对文化发源地的追寻,世界上有这样一些文化兴起的中心:东南亚、中国北方、印度西部、非洲东部以及美洲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各地主栽农作物的品种不同,中国北方是粟,东南亚是稻,印度西部和东非是麦,美洲是玉米。从许多考古发掘证明,驯化稻的中心实际是在中国南方。我国北方种粟南方种稻的格局,大约距今 0.6—1.2 万年之间就已确定了,而且规模很大。如在距今 0.7—0.8 万年的河北磁山

遗址,88 处窖贮粮能达 13.82 万斤。浙江河姆渡遗址产稻也很具规模。可见那时就是“南人食米,北人食粟(小米)”。后来“南人食米,北人食麦”,麦是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后从西亚引进来的。

二、华夏文明是众多民族以征战并逐适宜气候而居。

华夏民族在历史上何止千百计。在距今 0.6—1.2 万年间,他们在华夏大地流动不定,民族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争夺气象环境条件最好的地盘,包括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江淮河汉之间的土地,即所谓“逐鹿中原”。农业发达之后,华夏民族形成了,以后虽然曾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最终还是同化于汉族。这是由于华夏文明宏涵万汇,汉民族人口众多,同时农业民族的生存环境远远优越于游牧民族。

三、华夏文明地域辽阔并以东亚季风气候区为中心。

中原地带具有雨热同步、四季分明的优点。春耕时温度上升,雨水增多,有利于苗齐苗壮;夏耘时农作物生长旺盛需水量大,正好处在一年中高温多雨季节;秋收时温度下降雨水减少,气温日差较大,最能使果实籽粒甘美;冬藏时低温

干燥,最利于仓储。为了能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生存与发展,历史要求把无数的小氏族联合成部落,进而结成庞大的部落联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最后达到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直到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龙凤图腾的形成发展史

近万年历史上“逐鹿中原”,最早发达起来入踞中原的是东海岱族,即秦族,他们是后来汉、韩、东夷等族的祖先。这个氏族姓风。神话史里的燧人、女娲、伏羲(太昊)、祝融、有济(少昊)这些氏族都姓风。他们的图腾是人首蛇身。他们尚处于以采集、渔猎为主业的时代。但这样的生产已经十分需要掌握季节。他们很重视“它”,即蛇。蛇结束冬眠而出蛰,天气就暖和起来;蛇进入冬眠,天气就寒冷起来。它就成了第一个最好的物候指标,用了几千年,人们把它视为祖先,视为神,蛇也就成了他们的图腾。于是留下了“伏羲氏人首蛇身有盛德”的神话史。

第二个发达起来入踞中原的是南方的江汉族,即炎族,他们是

后来汉族以及古代南方的神农、祝融、蚩尤、三苗、九黎、百濮、巴、蛮、荆、楚、庸、越、吴等众多氏族的祖先。他们以鸟为图腾。各地也出土了很多鸟。少昊时代鸟儿满天飞。江汉族以“飞鸟知四时”，最典型的物证是河姆渡的双鸟朝阳牙雕。这个时代农业发达了，他们已经会用候鸟迁飞和太阳角度来把一年分为四季。从《山海经》里“东方荀芒，鸟身人面，乘两蛇”的形象来看，他们是把蛇物候、鸟物候和太阳物候综合运用的，这表明不同氏族的融合，已反映到更高阶段的图腾上。

第三个发达起来入踞中原的是西方的河洛族，即黄族，他们是后来汉族和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他们以兽为图腾，用兽类换毛、发情、孳乳等作物候指标来划分季节。黄帝称为有熊氏，他的氏族与炎帝逐鹿中原时，参战各族的旗帜上绘的是熊、黑、虎、豹、貔、貅。这时农业已经发展到更高水平。

炎黄大战于涿鹿之野的阪泉，血流百里，是华夏各民族完成大融合的最后一战，是首次使用了金属武器的空前酷烈的战争。从此，汉族形成并居于中原，华夏文明从此定型了。以后几千年，多次逐鹿中原的战争，只是大融合后的余波，不能改变总的文明特征和民族分布的格局。

神话史和传说史中的以“某”纪，就是以某种物候现象来划定季节。伏羲氏以龙纪，是以蛇的出入蛰为物候；共工氏以水纪，是以雨雪、露霜、河流结冰化冻为物候；炎帝以火纪，是以太阳和大火（心宿二）为物候；黄帝以云纪，是以云彩为物候；少昊以鸟纪，是以候鸟为物候。

黄帝以云纪，放弃兽图腾，表明这时图腾崇拜已经达到顶峰，这个时代已不满足于用物候定季节，

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天上。黄帝派了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衷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人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合这6个方面的科研成果来创造历法。这就可以不用动物作物候指标来定季节了。地上四方的图腾苍龙、朱雀、白虎、玄武被搬到天上去命名星空，把有熊氏的名字放在天的中央，大熊星座被称为帝车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天上的大统一反映的是地上民族大融合的完成。这样，集四象于一身的龙凤就定型了。

龙凤是万年以来所有民族不断融合的最后结果，它代表每个民族。

龙凤、四象不再是图腾，而是皇权的象征。但在民间，它是吉祥物。龙的职能仍在气象方面，它源于物候的本质未曾泯灭。它春分而升天，秋分而潜渊，仍保持万年之前人们用“它”定季节的意义。它兴云致雨，在人们心目中仍然要它解决旱涝等气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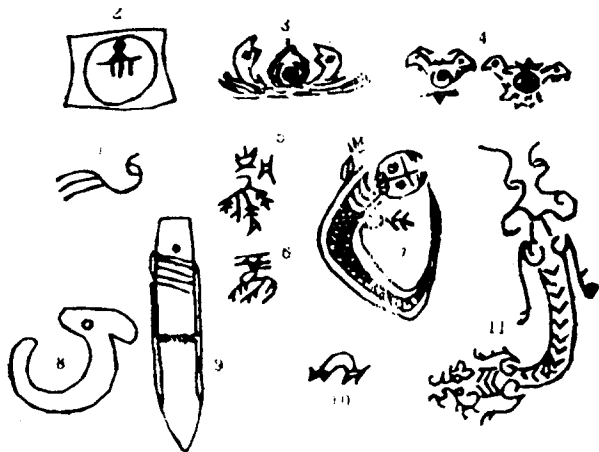
龙文化的奥秘就在于：农业是

靠天吃饭的，人们把赖以掌握天时的物候指标视为图腾来崇拜。华夏文明最本质的经验教训是处理好天人关系，有系统的天道观，由此引出哲学和伦理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众多问题。

华夏文明完成与定型

从气象史角度看，华夏文明形成的时间就是在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不能是更早，因为更早还没能把四象综合为龙，各方强大的部落联盟还没能统一起来。五帝传说史时代已经结束了图腾崇拜，进入了更高级的文明，龙凤、四象都已形成，只能是作加工完善。中原大地民族差异已经不复存在，汉族已经综合了各个民族的特征。这种加工完善，不是对一种文明的定型，而是对定型的文明的水平的提高。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综合四方，成于中原。



龙凤几千年的演变

1. 甘肃秦安黑陶
2. 河南庙底沟彩陶
3. 浙江河姆渡彩陶
4. 河姆渡骨匕
5. 甲骨文凤与龙

7. 河南仰韶彩陶
8. 辽宁红山玉龙
9. 夏代玉龙
10. 甲骨文龙
11. 湖北曾侯乙墓青龙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派代表 专程赴沪 看望 周谷城



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萧克执行会长和常务办公会议的委托，代秘书长鲁諄、常务副秘书长宋文茂于新年前夕，专程由北京到上海，看望住在华东医院的周谷城会长。

鲁諄、宋文茂首先向97岁高龄的周谷老敬献了花篮。红黄两色的康乃馨象征着身体健康，鲜艳繁茂的玫瑰等代表着吉祥安宁，这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对周谷老的衷心祝愿。窗外寒风凛冽，病房里暖意融融。周谷老安坐在靠椅上，看来气色精神都好。李冰伯大姐（我会理事，周谷老的夫人）认真看过常务副会长李宝光给两位老人的信，并念给周谷老听。周谷老说：“开始办研究会，宝光就来找我。那是个大好人！”

当周谷老接过一件刻有“爱我中华”四个字的金光闪闪的小巧纪念品时，细心观赏。鲁諄介绍说，这是香港爱国企业家简祖扬先生前不久捐助我会人民币200万元时，一同赠予的。周谷老兴奋地提起，江泽民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赠送给联合国50周年大庆的珍贵礼品“世纪宝鼎”，铸造“世纪宝鼎”的上海嘉丰特艺公司特意制造了同样造型、同样材料的“小宝鼎”，赠送给有突出贡献的文化名人。前些时，当有关部门将一尊“小宝鼎”赠予他时，他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这次带给周谷老的，还有一套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炎黄文化漫游》丛书。鲁諄说，这是一套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而编写的通俗读物，周谷老称赞说：“好！通俗读物好！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不光是专家研究，还要让普通群众知道中国的灿烂文化。”

周谷老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鲁諄、宋文茂关于近年来会里工作的简要汇报。主要提到的有近几年与湖北、山东、河北联合主办的学术讨论会和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等活动。周谷老不时点头，表示肯定。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拟举行包括召开学术讨论会在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萧克执行会长和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陈沂会长，对这些活动都十分重视。周谷老在听取了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欣然签下了笔力依然苍劲的“周谷城”三个字。李冰伯大姐在旁高兴地说：“他写字千不抖。”

告别时，鲁諄、宋文茂祝愿周谷老健康长寿。周谷老紧握着他们的手说，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病非常关心，他很感激，祝愿中央领导同志身体健康，并祝愿研究会的同志们身体健康，会务发达。





海外赤子關注中華聖地炎黃城

第三屆世界華商大會掀起了一陣“炎黃風潮”。

一篇《告炎黃子孫書》，激發了與會代表的聯合簽名和題詞熱潮，“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攜手共建中華聖地炎黃城”。

一個“中華聖地會員證書”方案的推出，引起華商世界的強烈共鳴。紛紛表示：不僅願做中華聖地會員證書的海外代理，而且願和炎黃事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道參與并投入中華聖地炎黃城建設，為振興中華奉獻赤子之心！

華商大會專輯《二》

通訊地址：中國·鄭州市文化路11號任翔大酒店6樓
Tel: 0371-3845622 Fax: 0371-3842360
郵編：450003 聯系人：侯先生 李小姐

炎黄春秋



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3月28日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右正为林彪）



陈昌浩、孙震前指挥的西路军一部

三位南沙老人说南沙
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
杨至成上将的
五次坎坷婚恋

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
人祖伏羲考略

ISSN 1003-1170



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